

79.03

36

東北軍政大學政治部編

現中國內的

社會主義

行發店書北東

現中國的兩種社會

軍大政治部編
東北書店發行

會社種兩的國中現

編輯者 軍大政治部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分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每冊定價 八〇〇元

民國卅六年十二月 初版 5000。

前言

在這偉大的歷史轉換關頭，每一個中國人民特別是每一個現代的中國青年，都擔負着改造中國、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重大責任。但是改造中國、必須首先認識中國現在的實際情況。現中國的國民黨統治區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社會，各走着絕對不同的兩條道路。而這兩種社會兩條道路，那一個是合理的進步的光明的有前途的代表廣大人民福利的，那一個是不合理的反動而黑暗的沒有前途的危害廣大人民福利的，是我們必須判別清楚的一個重大問題。之後，自己才能認清自己正確的方向，確定自己奮鬥的目標，而開始負起改造中國、推進社會的重任。因此，這裡就將這兩種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主要是抗戰以後的），分別作簡要的介紹。

一九四六，八月脫稿

目錄

第一章 政治

國民黨統治區

- 第一節 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一
- 第二節 皇部的特務統治……………一六
- 第三節 黑暗的保甲制度……………二八
- 第四節 官吏的貪污腐化營私舞弊……………三五
- 第五節 人民的反抗運動與民主運動……………四二
- 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
- 第六節 解放區的民選政府……………五二

第七節 中共的三三制政策.....	六八
第八節 一切爲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七六

第二章 經濟

國民黨統治區

第一節 帝國主義對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侵略.....	九七
第二節 官僚資本的壟斷統治結合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絞殺着民族工業.....	一〇四
一、官營金融資本的壟斷性、買辦性、投機性和高利貸性.....	一〇四
二、官營企業的壟斷統治.....	一〇八
三、壟斷統治下民營生產者的破產和民族生產力的破壞.....	一〇九
四、官營企業的封建腐敗性和買辦性.....	一一二
五、民族資本家的呼聲.....	一一四
六、極少數人的幸福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破產、飢餓、死亡的痛苦之上.....	一一五
第三節 國民黨統治區農村經濟的破產.....	一一八

一、農村的土地問題和封建的地租剝削·····	一一八
二、吃人的高利貸·····	一二三
三、吸血的商業資本·····	一二五
四、帝國主義對中國農村的經濟侵略·····	一二六
五、苛捐雜稅橫徵暴斂·····	一二七
六、農民飢餓死亡農村生產萎縮災荒遍地民變蜂起·····	一三〇
七、結語·····	一三五

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

第四節 解放區的工商業·····	一三六
一、解放區的工商業蓬勃發展·····	一三六
二、中共的工商業政策·····	一三九
三、中共的勞動政策·····	一四五
四、新民主主義政治造成經濟生產力順暢發展的條件·····	一五〇
第五節 解放區的農村經濟·····	一五〇

一、減租減息增資政策和農民減租鬭爭的勝利……………一五〇

二、減租減息增資後大大地提高了農民生產抗戰與建設的積極性鞏固了農村中各階層的

團結……………一九七

三、減租減息增資後農村階級關係的變化……………一六〇

四、解放後的冀北分區敵偽土地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一六三

五、解放區農村的生產運動……………一六四

六、解放區人民負擔輕微並且逐年減少……………一六五

七、合作社和農業勞動集體互助……………一六六

八、解放區農村欣欣向榮……………一七一

第三章 軍事

第一節 八年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戰場與解放區戰場的戰績對比……………一七五

第二節 兩條不同的軍事路線……………一八三

第三節 兩種軍隊……………一八五

第四節	兩種兵役制度	一八六
第五節	兩種不同的養兵方法	一九〇
第六節	兩種不同的軍民關係	一九七
第七節	兩種不同的帶兵方法	二〇一
第八節	兩種不同的練兵方法	二〇四
第九節	兩種不同的用兵方法	二〇六
第二〇節	兩種不同的政治工作	二一〇
第二一節	兩種不同的優待政策	二一一
第二二節	結語	二一三

第四章 文 化

國民黨統治區

第一節	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化上實行愚民政策與統制政策	二一五
第二節	國民黨統治區的教育	二二〇

第三節 國民黨統治區的文化出版新聞事業……………二二九

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

第四節 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政策……………二三四

第五節 解放區的教育……………二三七

第六節 解放區的出版文藝與醫藥衛生事業……………二四四

第一章 政治

國民黨統治區

第一節 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

一 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

中華民國雖然已成立了三十五年，但却徒有『民國』之名，而沒有『民國』之實，中國人民在這三十五年中，受盡了專制統治的剝削和壓迫。自從民國十六年國民黨當局背叛革命，背叛孫中山的革命之三民主義，竊取中國人民的革命果實，實行法西斯的一黨專政以後，中國人民更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國家的大政方針，各種政策，官吏的任用，完全由國民黨一黨專權，來維護他們少數統治階級的私利，壓迫與剝削廣大人民，廣大人民是沒有絲毫參與政權的權利的。民國二十年五月發佈的訓政時期約法，規定了『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制權。』『中國國

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約法第三十條）更赤裸裸的從『法律上』確定了一黨專政。據根這個約法制定的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五條規定：『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副院長，由國民政府主席於國民政府委員中提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國民政府主席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五院院長對國民政府主席負責。』在這裏，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只是一個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黨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只要對他們少數統治階級有利，不管老百姓反對不反對。這就是說把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國家變成他們少數人的私產，變成他們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壓迫和統治的工具了。在國民黨統治區，上自國民黨政府主席，下至縣長，鄉長，保甲長，沒有一個不是經過人民選舉出來的，沒有一個是真正代表廣大老百姓的利益的，都是通過親戚故舊，賄賂鑽營，『營營苟苟』而後由國民黨的黨部決定，再經過上級官府的形式委派的。因此，國民黨的黨部就有無上的權勢，包攬政權，濫用私人，一人做官，雞犬升天。少數有錢有勢的買辦官僚，土豪劣紳，黨長期的居於統治的地位，騎在人民的頭上，廣大的勞苦人民就長期的被壓迫，被奴役，就連共產黨以外的各進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進步人士不願與其同流合污即一概被拒絕於政府之外，而且加以摧殘。抗戰以來，國民黨提出『全國黨化』的口號，於是各級政府，軍隊，機關中的官吏，公務員都成了國民黨員，原來不是的都得要加入，不願加入的就用威脅的辦法強迫其加入，說甚麼『中國人都有加入國民黨的權利與義務』，『中國青年都有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權利與義

務」。非國民黨員就不能任用。自此以後全國各地的國民黨機關，部隊，學校都大批的舉行稀奇古怪的強迫入黨，參加入黨，舉手入黨……，許許多多純潔的青年，都不待已的和糊裡糊糊的成了國民黨員或三青團員了。請看民主同盟領袖張瀾先生的話：「這十幾年來，我們的政治是什麼政治，是一黨專政的黨治。政府機關的官吏，或鄉鎮保甲長，非國民黨員不用。」（見四四年十月三十日解放日報），因為在他們想來，只要中國很多人都參加國民黨，他們就可以用黨紀和欺騙的宣傳強制和迷惑一部份人，也就去說擠去黨羽爪牙，來作他們壓迫廣大人民的工具，或者那被大部份被壓迫入國民黨的人民，也就不敢批評反對苛政了。也就去說對這些廣大人民除了用專制政權的統治以外，還加上層黨內的統治，以便更加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而除了少數走狗爪牙以外，大多數被迫參加國民黨的人民，他們在黨內也是受到少數上層主要統治份子的壓迫的，他們除了受一層法西斯黨紀的束縛以外，並沒有得到其他的好處，他們在黨政上都一樣是毫無地位的。

這些國民黨反動派又學習希特勒，墨索里尼，叫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口號，實行法西斯的黨頭專裁政治，用專制獨裁來壓制人民，不讓人民起來。他們歌頌德、意法西斯主義，甚至就在這次反法西劫掠戰爭中，全世界都罵亂德法法西斯份子手的時候，國民黨法西斯出版物竟公開登着這樣的句子：「我們高度讚美德國人民和德國士兵，他們在戰場的英勇，他們對領袖及自己事業的忠誠。」（重慶民族論壇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蘇聯政治家阿瓦林在「中國向那裏去」一文

中說：「我們在虛偽地題名為「民主」的雜誌上發現對德國國家制度的公開稱頌，這是偶然的麼？說在這些出版物上反映着某些德國法西斯的中國同胞與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底思想的相類和政治的相同，這種推斷不是更正確些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蘇聯「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第八號）他們對法西斯主義歌頌之不足，還會派了大批的黨羽爪牙連蔣介石自己的兒子在內，到德國、意大利去當學徒，學徒之不足，又請來了德國國防軍領袖塞克特，柏林警察總監布隆保，以及其他大批的德意顧問，教官，師傅來親自傳授。復興社在『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一書中直接了當的說：「國民黨應採取法西斯蒂的技術，表揚法西斯蒂的精神，灌輸充分的法西斯蒂新血液！」而CC丁默村的『社會新聞』即從正面立論：「只有國民黨才可以負起這極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運動的使命！無論從國民黨的立場或它的歷史上我們都找不出一點與法西斯蒂衝突的地方，恰恰相反，無論是三民主義或國民黨的歷史，到處充滿法西斯蒂的精神。」（編者註：他詆辱了孫中山的革命的三大政策精神的真三民主義和國民黨，只有民國十六年背叛革命後的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三大政策精神的假三民主義才是充滿法西斯蒂精神的。）民國二十年五月蔣介石曾在傀儡「國民會議」的開幕詞中，公開鼓吹法西斯主義，反對民主主義，他說：「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國家集體學說為根據，以工團主義為運用，認定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統治權乃與社會並存而無後先，操之者，即係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陳立夫，葉楚傖主編的『莫索里尼傳』說：

「我們確需要一個和莫索里尼同樣的人物來領導一切民黨政府。」我們中國政治舞台上也早已出現了像莫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這個所謂「像莫索里尼那樣的人物」（莫索里尼是專指蔣介石，鄧文儀的『領袖言行』比這更進一步：『或曰領袖與莫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因為世界之偉大人物（？）希氏統治下的德國，……自然易於統治，莫氏統治下的意大利，亦和德國相似。……我領袖豐功偉烈，實非希莫二氏所可比擬者』。這就是說蔣介石奴役人民屠殺人民的『豐功偉烈』，比希莫二氏還要厲害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教授薩孟武在其所著『古今中外立法制度的比較』一文中公開提出（一）趕快加強一黨專政，（二）絕對的領袖制度，必須全國敬奉一個絕對的領袖，……」（以上俱見解放日報四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社論『請重慶看羅馬』和四六年四月六日社論『駁蔣介石』二文）。在獨裁政治之下國民黨的所謂『蔣總裁』就自封為人民的最高領袖了。於是這個『最高領袖』就自封為國民黨政府的主席，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最高國防委員會的委員長，四大銀行聯合辦事處的主席，全國童子的軍的總司令，新生活運動委員會的董事長，中央軍官學校的校長，中國農民銀行的理事長……等等，一共幾十個大官銜，全國的黨政軍財政經濟等各種大權都獨攬在他一人之手，連國民黨的中央委員都要向他宣誓，『誓以至誠，服從總裁命令，如有違背誓言，願受本黨最嚴厲之處分。』（見四五年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一個政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向其領袖作如此的宣誓，世界上除了法西斯政黨以外，那裡曾聽見過。這樣一來，全國人民都要依『法律』服從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政府要服從蔣介石

主席。主席蔣介石要服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每個委員又都要『誓以至誠』『服從總裁蔣介石』，也就是說，全國人民都要做蔣介石個人獨裁的第四級奴隸。他們提倡『信仰主義要到迷信的地步，服從領袖要到盲從的程度。』他們抬着『領袖』使之偶像化，要人民盲目的崇拜他，絕對的服從他，『領袖』怎樣說就是怎樣對，不要起來反抗以便獨裁者像封建皇帝一樣，企圖永遠坐在人民的頭上。

但這種專制的暴政只有使人民更受壓迫更無自由，中國人民堅決反對這個秦始皇袁世凱一類的專制魔王。民主同盟領袖張瀾先生也說：『某一黨獲得政權之後，就高唱『以黨治國』，實行一黨專政，視國家爲一黨的私有物。而且黨權竟至高於國權，黨治也變成獨裁政治，因此，領袖也出現了，特務組織也產生了，結果弄得國家本來團結的，反而不團結，地方本來安定的，反而不安定。』（見張瀾著『中國需要民主政治』一書）

二 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參政會

抗戰以後，國民黨當局在共產黨積極一貫的民主主義號召下，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政治民主，這樣偉大的壓力下，它爲了裝飾門面，才被迫成立了一個國民參政會，吸收了一些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共同參加。這個組織，名義上雖是民意機關，實際上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因此參政會實際

上也是爲國民黨反對派所操縱。所有參政員都是國民黨政府圈定指定，而不是經過人民選舉的，絕大多數是國民黨員，佔壓倒的優勢。非國民黨員中雖有不少主張或贊同民主正義的人士，也會提出過許多重大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主張，但得不到通過，或勉強通過也絕不爲國民黨政府所採納，更談不上實行。他們在會議上所發表的一些有關國家存亡興革的重大主張與具體政策，常常被封鎖，連報上也不能登出，有時登出也往往遭到刪削。如四五年七月九日參政員周炳琳代表國民黨參政會對蔣介石演說答詞，在報紙上只刊出了一部份，剩下的一部份被新聞檢查官扣下了。至於在開會期間，國民黨法西斯份子更是利用政治權力蠻橫控制會議，用挑撥離間，造謠誹謗，搗亂會場，威脅利誘，製造糾紛等卑鄙手段，阻止或打擊進步的意見。茲引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之一羅隆基教授的一段話來看：『現在國民黨政會不過是國民黨政府用來掩飾國際視聽的一種工具，對於國內黨派團結，實不能起任何作用，而且絕不能引起社會上任何良好印象。我們對參政會本身的效用有了很大的懷疑。參政員人選，政府宣傳民選多於指派。打開天窗說亮話，實際選也派也，都是政府完全圈定支配。國民黨與其他黨派人數的比例不及十與一，在野黨，在參政會佔如此少數，當然不能發生任何作用。』（見四五年五月三日昆明民主週刊一卷十九期圈定的參政員名單發表一文）

雖然如此，中國共產黨爲了表達人民的意見，團結進步的人士，指陳國民黨當局病症所在，免其貽誤國家，貽誤自己，還是參加參政會（但爲國民黨限制只有七個人參加），爲人民的要求而作種種

努力。但當國民黨當局在參政會開會前已經決心釀斷會議，想用它達到破壞抗戰，發動內戰，反對人民的陰謀時，中共則嚴正拒絕參加會議，以此表達人民對反動措施的嚴重抗議引起全國人民的嚴重注意與警惕。

四六年三月間繼國民黨二中全会後召開的四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中，二一二名圈定的參政員名額中，國民黨員佔一五八名，即四分之三，其他黨派各六名，無黨派人士六名。在一五八名國民黨參政員中有八十五名是國民黨反動派CC份子，佔國民黨參政員出席人數的一半以上，只有五名國民黨參政員為開明的國民黨員。中共代表拒絕參加此次會議，民主同盟代表多人也未出席。國民黨法西斯派對於此次國參會的操縱包辦可謂無微不至。會議尚未結束，但一切「決議」已全部決定，只待在会上逐一舉行通過的形式。所謂「決議」內容，他們規定「不得超過國民黨二中全会決議範圍以外，某些決議不妨帶點伸縮性，以便有機會時可以便於作文章，反對中共。」此外在會議過程中，法西斯派會規定對共產黨可以盡量批評，但須以民意機關的姿態出現。「由此更加證明國參會開幕以來，某些法西斯參政員在會議中狂吠反蘇反共，反民主及力圖推翻政協決議，事前均有陰謀佈置。」（新華社重慶四六年四月一日電，見四六年四月二日東北日報）因此這個所謂國民參政會，已為國民黨法西斯派一手包辦，完全成爲法西斯一黨專政下的一個御用的工具了。這種參政會與一般民主國家的議會無絲毫

三 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階級實質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

國民黨既實行一黨專政，那麼是不是一切國民黨員都同意國民黨最高當局反動的作法，或都參與反動的專政呢？不是的，實際上所謂「一黨專政」是國民黨內主要統治集團的專政。國民黨是一個複雜的政黨，他是被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反動集團所統治所領導，但是整個國民黨並不等於這個反動集團。他有許多領導人物如宋慶齡、馮玉祥、何香凝等等都不屬於這個集團，而且被這個集團所打擊，排斥或輕視，它有許多的幹部與黨員群眾及三青團團員群眾並不滿意這個集團領導，而且有些在明瞭了國民黨內的腐敗與反動以後甚至覺悔誤入其組織，反對它的領導的，因此這種情形，在被這個反動集團所統治的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政府機關，國民黨的經濟機關與國民黨的文化機關中都是存在着。在這些軍隊及機關裡，因而包藏着許多進步的民主份子。最近他們已有一部分人組織起來，成立了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誼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等，從其內部的矛盾，進而起來反對其法西斯反動派的國民黨領導。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集團，其中又分為幾派，如CC團，復興社，政學系等等，一直是爭權奪利，互相鬥爭，並不是一個嚴密的嚴肅的統一體。這個集團所代表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雖在全國人口中佔極端少數，但却掌握着全國最大多數的銀行，土地，工廠等等和國家的全部財富，掌握着國家的全部政權，掌握着國民黨的黨務、政治、軍事，經

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最高權力機關。所以說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也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這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是建築在剝削壓榨廣大工農群眾中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人民群眾上面的，他們全靠吸吮中國人民的血汗來滋養自己，因此他們就有反人民的本性。他們高唱『民族至上』，但是他們的行爲却不符合於民族中絕大多數人民的要求，而是摧殘民族的元氣，破壞與出賣民族的利益。他們叫囂『國家至上』，但是他們所指的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買辦、法西斯的獨裁國家，並不是人民大眾的民主國家。他們把『國家』當作壓迫剝削人民的工具，而且要千千萬萬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俯首帖耳的承認它擁護它，這就是『國家至上』的全部意思。

三 『壓』和『騙』是反動派對付人民的兩件法寶

國民黨反動派對於人民的民主要求除了殘酷的鎮壓以外，還用無恥的欺騙辦法。全國人民連國民黨內真正孫中山的信徒在內，要求實行孫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的三民主義，要求實現孫中山所說的『召開國民大會，實行全國普選』、『實施憲政』、『還政於民』。孫中山臨死的遺囑中明明叮囑了『最近主張開國民大會，……務須於最短期間使其實現。』可是這些反動派，孫中山的不肖子孫們，却於二十年來都未實現，他們根本不顧其實現，他們說現在還是訓政時期，中國人民還要繼續受他們的

「調」下去。美國記者金生於西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一篇通訊中說，「一個著名的國民黨員」在我今天訪問他的時候說道，「我想十六年以來的生命來度量，是多麼長久的時間，十六年內，一個小孩子從開始入學起，也可以由小學生變為大學畢業生了。但是經過十六年的一調政」之後，我們還說人民不適宜且無準備來實行自治。」世界上如蘇聯和其他所有民主國家的經驗及中國解放區民主政治的經驗，完全證明了人民是有充分力量管理自己的國家的，而且管理得最好，完全不需要這些反動的夫人先生們來「調」他們，這種「調政」的謬言是早被打得粉碎了的。但中國的法西斯反動派却硬抱於這個屍體來作為擋箭牌。他們還會一再的對人民發出無恥的欺騙，民國二十一年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決議，說要在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召開制憲的國民大會，但到了二十三年三月蔣介石又說，「現在已經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了，中央預定明年四月開全國國民大會，就要縮更調政，開始憲政。」到二十四年十二月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又延期到二十五年十一月，結果還是不兌現。到二十八年十一月國民黨六中全會宣言又說，「本會議今特鄭重決議，限於民國二十九年召集國民大會，以期早日制定憲法。」然而到了二十九年九月却又宣佈這個大會的延期。直到今年民國三十五年尚未召開，這種欺騙成性的無恥手段，在今天以前早已為全國人民看穿了，最近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又再施其欺騙故技，說什麼要準備召開國大了。同時也扮裝抹粉的在各地製造偽選，企圖造成一個國民黨操縱包辦下的有名無實的國民大會，以淆亂視聽，竊奪民意，企圖掩蓋其永遠不變的一黨專政的實

質，在國內外民主力量要求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的壓力下不得不召開的政協會議上所通過了的各項決議案，和平建國綱領，及以後的停戰協定，整軍方案等又被國民黨的二中全會及反動內戰行動，推翻得一乾二淨，至今仍是音踪毫無。『壓』和『騙』就是這些反動派對付人民民主要求的二件法寶。可是中國人民已看得很清楚，國民黨反動派是不會願意實行民主改革的，民主是只能用鬥爭來爭取到的，中國人民決不會受他們的欺騙了。

四 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權也是帝國主義統治半殖民地中國的代理機關

中國這種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是依附外國帝國主義，給帝國主義剝削中國人民作幫手，是爲帝國主義所豢養長大的，他們專替外國資本家在中國廉價收買原料又高價出賣商品，經營投資借款的事業，早已從中賺了錢，發了財就成了大買辦，大銀行家，再和軍閥官僚，流氓劣紳一勾搭即躍上了奴隸總管的位置。跟帝國主義有密切不可分離的從屬關係。在政治上是受到帝國主義的竭力支持，作帝國主義統治半殖民地中國的代理人，奴役與壓迫中國人民的代理人，也就是說給帝國主義當奴才。這批奴隸總管的臉譜是在外國帝國主義主子面前卑躬曲膝，言聽計從，不惜把中國的主權支配在外國主子的手中。而在中國老百姓前面則趾高氣揚，胡作胡爲，自稱爲『高等華人』，依靠外國主子的力量儘量壓迫與榨取着中國人民。當人民起來反抗的時候，他們便擺起奴隸總管的

架子，靠着後台老板的武力幫助，無情的屠殺鎮壓中國人民。抗戰前他們的主子有英美日等，其中因主子的不同，又有歐美派大資產階級和親日派大資產階級之別，他們都沒有什麼國家民族觀念，只要能夠保持他們繼續對中國人民的壓榨，能夠保持他們繼續過那種窮奢極侈，荒淫無恥的生活，只要還能給他們保留一定的地位，那他們就不管那個帝國主義來統治中國，也是可以隨便過去的。就拿事實來看吧，當『九一八』事變時，日寇已開始了對我國的軍事進攻，國家民族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然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怎樣呢？他們絲毫不顧國家民族的存亡人民的死活，先來一個『不抵抗』簽訂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賣國條約，再來一個『先安內後攘外』的清道政策和投降日寇的政策集中全國的力量來圍剿號召抗日的工農紅軍，鎮壓一切抗日愛國運動，下令『侈言抗日者殺無赦』替日寇滅亡中國，掃清道路。他們當時最露骨的口號就是：『寧可把南京武漢送給日本，絕不能把南昌九江送給紅軍』。這和滿清專制政府的『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方針，絲毫沒有二樣，這就是一例。又如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在全國人民要求立即實行抗戰的逼迫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不能不抗戰了，因此便在『八一三』上海戰爭發生時，發表了全國抗戰的宣言。抗日戰爭中，大資產階級中的親日派，以汪精衛爲代表，已經投降日寇變爲天字第一號的大漢奸，其餘留在抗日營壘內的，也不斷策動着投降，做隱藏的漢奸工作。歐美派大資產階級雖然留在抗日營壘內，但是採取一面抗日，一面反共反人民的兩面派方針，即『在抗日方面，他們也是兩面的，一面抵抗日寇的進攻，一面則抵抗得很

消極，並且還時常和日汪秘使勾勾搭搭，非常動搖。」『在對共對人民方面，也有其兩面性，即是從內戰時期的單一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蛻化爲抗日時期一面利用共產黨與人民，一面又打擊共產黨與人民的兩面政策。』這又是一例。這種當權的歐美派大資產階級，在抗戰期間，所以採取這種兩面政策的原因，主要的也是由於他們的階級利益決定的。這就是說：在日寇的瘋狂進攻之下，他們雖然對日本也有矛盾，怕日本獨吞了他們的全部統治權，剝削權，不能不要抵抗一下，但就是抗日了，他們也決不肯就把人民發動起來的，他們的唯一計劃，就是從國際關係中投機，依賴英美以至蘇聯代他們打倒日本，收復失地。同時他們也知道，萬一無機可投，就是日本滅亡了中國，他們也還是有出路的，日本人總還得利用他們來辦事，給他們做大官。像偽滿的溥儀，張景惠，偽北平政務委員會的王克敏，偽南京政府的汪精衛之流一樣，不都是當了漢奸還做大官嗎？不都是當了漢奸還威風凜凜，繼續喝中國人的血嗎？可是，對中國人民，他們就一點不能放鬆，因爲他們知道，要是中國人民得到了解放的話，他們怎樣還能夠繼續爲非作惡，無法無天，把中國弄得烏烟瘴氣來安享其荒淫無恥的生活呢？因此，他自然就要採取，『一面抗日，一面反共反人民』的兩面政策，而且在武漢失守以後還把反共反人民提到第一位，把抗日降到第二位。甚至如果在和日寇討價還價當中，投降對他們爲有利時，那他們就索性收起抗日旗幟，投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懷抱裡去，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從抗戰後期起，他們的外國主子最主要的是美帝國主義。到了抗戰勝利後的現在，他們就完全投

向美帝國主義的懷抱，而蔣介石也就作起美帝國主義的兒皇帝來了。他們出賣中國主權給美國，依靠美帝國主義的幫助來屠殺中國人民，幹着漢奸賣國賊的勾當。而美帝國主義之所以來控制中國的主權，幫助他的奴才，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屠殺中國人民，就是爲的奴役和榨取中國人民，使中國從半殖民地狀態更加走向殖民地位。現在蔣記的『中國』與美記的『中國』越來越分不開了。例如國民黨的軍隊完全是由美國的『軍事顧問團』整編，訓練，裝備的，軍官學校的教官是由美國人充任的，海軍和空軍是由美訓練裝備贈送的，國民黨殘殺人民的法西斯特務人員，是由美國參加訓練『中美特工訓練班』的，工業交通是由美國的專家設計的，財政是由美國借款支持的，經濟命脈是由美國操縱的，大都市和經濟中心重要礦山是由美國的軍隊駐紮的，交通線是由美國的軍隊保護的，軍隊是由美軍艦運來打內戰的，還讓美軍在中國建立海空軍基地，在中國到處設立特務機關，情報網，美人在中國境內用『統治者』的態度橫行不法，欺壓中國人民，如天津美軍當局規定華人民美軍肇禍而致死者一律賠償十萬元，致死的駝子賠償十三萬元，（四六年四月十六日在重慶商務日報載）把中國人常做牲口都不如，又還任意凌辱我女同胞。最近國民黨政府又將自己國家的內河航行權出賣給帝國主義，使美國政治經濟勢力更深入中國內地。出賣了全國沿海港口的修建建築權給美帝國主義，使沿海各重要軍港商港完全在美國控制之中。又答應美國要求將沿海五公里外的漁業權出賣給日本。美國國務院還向國會宣佈對蔣軍事援助法案。公開的表示要更多的幫助他。最近國民黨政府又想要把中國開

題的最後決定權交給馬歇爾遭到中共的嚴詞拒絕。在借款五萬萬至廿萬萬美元中，又附有什麼秘密條件，那邊誰也不知道了。種種喪權辱國的行為，已使中國日益走上殖民地化。再進一步喪失了國家的主權獨立，這種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猙獰的屠殺和奴役行為，蔣介石之流却厚顏無恥地稱之爲『友邦對我國的衷心援助』還表示無限的感謝呢，當然，對於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漢奸賣國賊蔣介石之流來說，確是給了『衷心的援助』，但却不是爲了別的，正是爲了奴役與屠殺中國人民。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民即受着外國帝國主義的兇殘壓迫，至今已一百餘年了。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壓迫剛剛被擺脫，而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兇殘奴役却又加重到空前嚴重的程度，前門拒了虎，後門却進了狼。

中國人民要求解放，要求民族獨立，要求有一個自己做主人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起來反對這些漢奸賣國賊出賣祖國的行為，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侵略行為，起來廢除封建買辦法西斯的國民黨一黨專政及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因爲國民黨反動派漢奸、賣國賊、帝國主義的奴才頭子蔣介石及其一夥，從來沒有爲人民辦過一件好事，相反的盡幹一些違背人民意志殘害人民出賣人民的壞事。現在更變本加厲地出賣着國家民族瘋狂地殘殺着中國人民。

第二節 卑鄙的特務統治

國民黨反動派爲了保護非法西斯的一黨專政，專制獨裁，爲了統治與奴役人民，屠殺與鎮壓人民的革命運動，實行法西斯的恐怖統治，亦就是特務統治。他們提出『全黨特務化』的口號。他們設立了中央調查統計局和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兩個龐大的特務組織。每年支出浩大的特務費，豢養大批的狗腿爪牙。又在全國各地舉辦許多特務機關，聘請美國特工專家，（抗戰前則以德國意大利的特務頭子爲多）來訓練特務，如『中美特工訓練班』等。還用逼騙誘等卑鄙毒辣的手段，強迫青年加入『復興社』『CC團』『三青團』等法西斯所掌握的的反革命組織。加入以後許多人都被威逼去做喪盡天良的特務工作，如不加入，或加入了以後不願做卑鄙罪惡的特務活動，身家性命則立地發生危險。他們在機關、軍隊、學校、工廠、社會及職業團體中建立特務組織，特務網，全國各地都有集中營，勞動營。這班特務，在國民黨統治區，不是去對付漢奸敵探，而是對付人民，對付抗日愛國的青年學生，進步份子，民主人士。對付堅決爲人民利益不惜流血犧牲忠誠服務的共產黨員，還對付國民黨內的民主派，甚至連一些主張民主的國民黨元老如宋慶齡，何香濤，柳亞子，等等也都被監視，恐嚇，軟禁，給壓迫得喘不過氣來。這些無人性的傢伙，具有着吞噬人民的一切特權，每人都帶有手槍，短刀，無法無天，任意捕殺人民，無人敢干涉，無人敢過問。造成黑暗世界。

這裡摘取一些關於特務殘害人民的具體材料：

記一個青年的憶述：『我本在西安做無線電工作，在一個深夜裏，被國民黨特務莫明其妙的逮捕了。他們用布包了我的頭，禁止我出聲，被拉到廣場上，逼我旋轉，使我不辨方向。當我被帶到一個地方，他們把布取下時，我才知道已被囚禁在一間小黑房裏了。同囚的一間房裏，九個人被鎖在一條鐵鏈上，大小便睡覺都得一起行動。常常有人叫去刑審，又被擡着回來，有的隔二三天就死了。在一次刑審中，他們脫了我的衣服，用浸了水的粗麻繩抽打，把我打昏過去。以後又被審了兩次，毒打了兩次。這期間我親自經歷了許多慘無人道的事：有一個孕婦被抓進來，他要求出去分娩未被准許，那一天晚上囚徒們七手八腳的幫她接了生。鐵窗中的嬰孩當夜就死了。另外有八個陝甘寧邊區的農民從慶陽到涼州去，路上被捉，特務們用燒紅的鐵絲，在人背上烙了一條條烙痕。我親眼看到傷痕的潰爛，無辜的皮肉發出一種難聞的焦腥。從寧夏送來的囚人中，有一個姓李的說：他們是被裝在木籠裏，駱駝載來的。沿途不准出來，屎尿全拉在裏面。每天從洞口塞進兩個饅頭來。這個姓李的後來神經失常，每夜狂笑痛哭！此外有受十個指頭被插進十根竹籤的酷刑的，有被敲詐成罪，賄以幾十萬巨款才獲得釋放的。有一次抓來三個年輕回民，是因爲稅捐太重，回民反抗，被刺殺了一個回民村，引起這一帶回民發生暴動後被捕的。』（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解放日報）

『一九四〇年在四川大學，H是一個無黨無派的青年。他看不慣學校的黑暗，看不慣三青團的惡

提們。他發議論，他激烈反對，他當面譏諷，並且他又打緊了勸他加入三青團的來使。他是正直剛毅的。是奉假的時候，日到嘉定去看一個武漢大學的同學。竟在一個深夜，他的房間裏闖進了兩個兇漢，用手槍威逼着他出去，他徒手空拳，無法抵抗，只得一路走一路喊救命，可是，「月黑殺人夜」誰也不敢來冒險。於是H被兇手們挾持着，在嘉定城牆上被慘殺了，並且把他從城牆上推了下去，而兇手們逍遙去了。然而H還沒有死，他由苦痛的昏迷裏又醒了，還掙扎着扯下一塊衣服，浸了自己流出來邊的鮮血，滾到城牆，伸着手，咬緊牙關，在城牆上寫了七個大字：「中國人爲我報仇，」終於死了。」

「另一個冬天的黑夜，地點是在曠野的坟穴旁，執槍的甲：「你答應不答應作特務，答應就放你，不答應就活埋！」這個被網綁的青年，已經被他們抽打得遍體鱗傷的青年，仍然像在法庭上一樣沒有回答，抬起頭來望着那寒無月星的天，執槍的乙：「你答應吧！何苦呢，只要你答應，一切的事情不是都好辦了嗎？你的父親也可以馬上放出來的，而且你以後的生活也有保障了。」這青年仍然僵立着不作聲。執槍的甲命令他：「快說呀，不答應就死，答應就活。」青年無所聞似的，偶然望見下邊的那個黝黑的深墳穴，執槍的丙兇惡的把這青年一推：「你說呀！誰跟你老站着吃西北風。」青年仍然望着無星月的天，執槍的甲猙獰的瞪着他：「你不答應，是吧？好，你有本事我也懶多說了。」於是這青年被推下墳穴去了，三個兇手用鐵鍬剷土，往墳穴裏急速的拋下去。「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青年在墳穴裏寫的喊出來，像暴雷一樣突破了夜的沉寂，使兇手們大吃了一驚。土漸漸的高了，兇手們回狗窩去了，只有北風陪着這青年的新墳怒吼着。」（「月黑殺人夜，」一九四三年八月十日解放日報。）

我們再舉江西上饒集中營的例子來看：

「這個集中營，在一九四二年六七月浙贛路戰事以前，裡面關着許多有名人物，除新四軍軍長葉挺以外，新聞記者有三個，一個是國新社的計證英，一個是創辦豫東大眾報的徐師梁，一個是浙江民主日報的編輯。華僑青年有遲遲的陳治國，安南的阮甄飛，皖南事變後新四軍有幾百幹部被囚禁在這裡。還有一部份是浙贛路一帶教育，文化機關中被國民黨特務認為思想上有問題的人物，如玉山縣某中學的教員，上饒民衆教育館的藝術主任等。也有不少是由國民黨部隊機關提來的思想犯，這其中有一些是國民黨軍隊裡服務團的團員，有一些是國民黨的政工人員。這一點和四川綦江縣的集中營不同，那裡是專門囚禁重慶國民黨高級黨政軍機關中被認為思想犯的。」

「囚犯們先到七峯岩集中營，一律帶腳鐐。第二步調到周田村集中營，腳鐐一律不要了。這裡的人都關在有鐵絲網的大圍牆中，每天都是繁重的苦工，抬木料，打土牆，修房子，開馬路，平操場，挑水煮飯等，凡是能想得出的苦工，總讓你一天到晚不能絲毫休息。飯也不能讓你吃飽，飯裡的蒼蠅屎不知多少，弄得大家生病，又不給你醫藥，使你疲憊不堪，日斬病弱。馮雪峯肚子上生了一個大瘡

愈爛愈深，每日流淚不止，他們也不許他醫治，一定要「自首」了才可以請醫生。還常常實行毒打並佈置內線，偵察「囚犯」思想行動，仍不能達到「自首」之目的時，他們最後的手段是送上「活地獄」毛家嶺。被他們判定爲「頑固不化」的份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殘酷的杖刑，由幾個彪形大漢對手無寸鐵的青年瘋狂的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後，然後用糞薰，或者由幾個人挾到荒山古廟的毛家嶺。

「到了毛家嶺又上腳鐐，一三十人關在一間屋子裡，完全成了待決之囚，再出去的希望就很少了。但是他們也不把這些人槍決，只讓他們長期受罪，有些人被「站鐵籠」，鐵籠內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過毒打的人，站到二十四小時就不能維持了，好人也站不過三天。有些人被「針刺肚皮」弄得人全身是孔，叫苦連天。有些被坐「老虎凳」，有的被剝光衣服去吃風，夏天跪在太陽地裏硬晒，有的經常拖出來毒打，至於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說了。有些特務團的士兵也看不過，他們說：「你們如果有罪就應該槍決，如果無罪又何必弄得半死半活呢？」」（解放日報四四年十月一日通訊，「人間地獄上饒集中營。」）

四五年二月重慶會發生一件群眾抗議特務行兇的事件，著名「特工」「九妖十八怪」之一，平日倚仗槍桿，到處橫行，動輒殺人的田凱，槍殺重慶電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引起大後方人民高度憤慨與嚴重抗議，平日壓抑着的對特務橫行的憤怒再也按捺不下。重慶各工廠工人，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一

致要求懲兇，並保障工人生命。市內群眾舉行了八萬人的盛大公祭。在被准許掛出的輓聯中，深刻透露出了群眾對國民黨特務統治仇恨與憤怒，如『這是什麼世界，人當狗屠，且看如此社會，狗把人吃。』『特務橫行何處去，民主自由幾時來，』『仗勢力暴徒行兇，我看你橫行幾時？』在群眾公憤下，社會正義的輿論一致猛烈抨擊下，國民黨當局，爲暫掩飾自己的醜惡罪行，不得不忍痛將自己的忠實特務走狗田凱執行槍決，以暫平衆怒，可是正如成都華西日報短評所指『要是這樣殺人償命，那些成千成萬莫明其妙失蹤了的，莫明其妙死了的，都一一找出兇手來，又一一拿來抵命，請問要死上多少人？』被殺的老百姓多得很，豈止一個胡世合。殺一個田凱，除了和緩一下群眾的公憤外，並沒有解決什麼問題，特務統治的實質並沒有絲毫改變，特務殺人還不斷出現，甚至變本加厲，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還是毫無保障。

二 人民的各種自由被剝奪淨盡

在這種特務統治之下，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身體，居住，信仰等基本自由都被剝奪盡了。中外著名的經濟學者馬寅初因爲反對孔祥熙等官僚資本壟斷操縱，寫了一篇文章，稍加指責，即遭逮捕監禁。浙江大學教授黃羣，因爲發表了一文反對一黨專政專制獨裁，要求改革政治，遂告失蹤。國民黨統治區各報紙雜誌稍有涉及反對蔣介石法西斯專制獨裁的字句，有要求民主改革的，就會

遭到檢扣剝削，被迫停刊以至被搗毀，群眾團體則不准組織，或被非法解散，或者派入特務搗亂破壞，或者成立什麼御用的「工會」「農會」以裝飾門面。在重慶，成都，昆明及其他全國各地，各大中學學生，社會進步人士，大學教授，爲了反對國民黨法西斯一黨專制獨裁，要求開放民主，改革政治，取消特務統治，舉行小高集會或群眾大會，被特務份子破壞搗亂的事情經常發生，並且時常釀成流血慘案。特務頭子們竟公開的說：「你們有開會的自由，我就有打槍的自由啊。」青年學生中有不滿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思想者即遭監視逮捕，暗害或送入集中營裏去。共產黨員及無黨無派的民主愛國人士成千成萬的被屠殺，或至今還關在牢裏。人民的身體毫無保障，居處被檢查的則常常發生。政協會議開會時民主同盟代表黃炎培和張申府兩先生的住所亦被特務非法檢查，其他可想而知。較場口血案中郭沫若先生等亦遭到特務毆打。前東北抗日聯軍領袖之一共產黨員李兆麟將軍在哈爾濱遭國特暗殺。北平國大代表選舉問題講演會上名教授陳瑾昆，江紹原，被特務打得頭破血流。南通慘案中新聞記者，男女教員，學生及文藝界，孫凡夫，錢素凡等數十人被捕並慘遭暗殺，挖眼割鼻，拋浮江面。西安新聞界血案，秦風工商日報被搗毀停刊，名律師龐玉任被處死，民衆導報主編李敷仁被槍殺。全國各地的新華日報，解放報，民主報及其他進步報社，被搗毀，報社人員被毆打等等事件不一，而最近如轟動全國的北平「四三」事件，國民黨當局非法命令大批軍警，憲兵便衣特務，荷槍實彈，深夜搜查中共在北平的機關報，平市銷路最大，萬人搶閱，爲人民喉舌的解放報社新華分社，逮捕全體

人員四十餘人，捆綁、侮辱、監禁、毆打，經中共當局提出嚴重抗議，全國輿論界和平民主同盟人士群起指責，始獲釋放。而以後又將北平經合法登記的解放報新華社等七十七家報刊通信社非法查禁，引起中外輿論的沸騰。六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各界代表馬叙倫、閻寶航等一行赴京請願要求停止內戰，又被國民黨當局指揮特務毆打造成流血慘案。蔣介石對人民民主自由的四項諾言簡直就等於放屁。這種暴虐橫行的特務統治之下，國民黨統治區簡直成了一個黑暗的地獄世界了。

三 勾結日特漢奸破壞解放區

抗戰中，在敵後方，國民黨特務不是去對日寇進行反漢奸日特鬥爭，不去破壞日偽的統治，反而和日偽配合，專門進行破壞堅決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一切建設工作。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調查統計局和日偽特務機關的人員經常交流，互相來來去去，以至國特兼日特，日特兼國特之事，則在在皆是。

如四月二十八日太行左權縣麻田鎮破獲大的國民黨特務案，在群眾反奸鬥爭和中共寬大政策的感化下，特務們紛紛悔過了。在他們的自白中揭露了種種卑鄙的罪惡行爲：「宣傳抗戰勝利不了，中國必然失敗。不讓老百姓了解政策、法令。宣傳不要看現在書店出版新書。」（閻克昌聲明書）「製造謠言，說日本來了不殺人」（范乃林聲明書）「破壞村裏的減租減息工作」（趙小六聲明書）「在井裏下毒

藥」(張寬，郝玉珠，吳章紹等聲明書)「毒死一人賞一百元，完成一次投毒任務賞洋八十元，完不成任務的殺頭」「破壞根據地的一切建設和生產，在軍寨村破壞紡織廠和水渠，偵察存放器材的密洞」(原世英自白)「暗殺幹部，對象是縣上的，至下級幹部村長，武委會主任，找一掃蕩」機會可以暗殺」(趙小六聲明書)「反對共產黨八路軍，造謠破壞」(閻克昌等的聲明書)「偷八路軍文件，書籍和其他的東西」(呂文章等聲明書)「瓦解八路軍的幹部戰士，勾引他們開小差，投毒殺害軍隊人員」(呂文章，王乃娥，黃改香聲明書)「甚至陰謀暗殺彭副總司令」(楊新運的悔過書)「陰謀火燒銀行」(綏德特務頭子王毓琪等自白)「特務機關還叫他們當漢奸：『日本「掃蕩」來了不要跑，就說是國民黨，引日本劍客搜山』「調查那個是共產黨員，日本來了告訴他」(姜天照自白)從這些聲明書裏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國民黨特務機關是怎樣忠實的爲日寇服務，與日寇漢奸通力合作，極力破壞抗日根據地。

從許多悔過者(特別是青年和婦女)的自述裏，更可以看到，國民黨特務份子是如何的卑鄙醜惡的。用金錢女人誘騙純潔青年陷入泥坑，然後威逼他們去進行各種破壞活動。且看何煥成的自白吧：「總是串門子，搞女人，平時不叫我養成做事習慣，專門吃喝玩樂。蔣玉林說他有很多的錢供給我化。他又領我去看戲，賭博。」不僅僅在生活上使這些青年腐化堕落，成爲社會的寄生蟲，尤可痛心的，是這些青年從十八九歲至二十歲起在思想上就被特務毒化有的甘心專門爲法西斯做爪牙，許多青年則

是被威逼利誘而去幹這些喪盡天良的特務勾當，這簡直是斬斷中華民族命運最毒辣的手段。此外又可看到他們如何的喪盡廉恥，『所有參加特務組織的婦女，都有以肉體勾引部隊人員的任務，勾引越多則成績越大』（黃改香自白）（以上見四三年八月三十日解放日報）『你們女特務的第一條戰線是在床上』（陝甘寧邊區綏德師範女生馬仁遠自白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報）他們戕害人民戕害青年去做這些『有悖於中國人爲人的道德』的下流事情。他們除了欺騙誘惑威逼以外，還用『人質』的辦法，控制了這些人家庭父母的生命財產，強迫他們去幹。

抗戰八年來，國民黨特務在敵後方造成無數血案，舉不勝舉。即以四三年太行左權縣爲例，特務在水井放毒，毒害民衆達五千人之多。幸而八路軍醫務人員併力搶救，大部份才免於死。再如四二年五月反『掃蕩』中，我八路軍健兒在前線浴血苦戰，保衛根據地，保衛人民利益，八路軍左副參謀長即於此役壯烈殉國，而國民黨特務份子則奉豫北太安的特務機關的指令，乘事緊張之際，在後方興風作浪，普遍組織『維持』，他們手持日本旗，到幾十里外去迎接『皇軍』，爲他們創審洞，找花姑娘，殺雞宰羊，大事犒勞，人民橫遭污辱屠殺。傾家蕩產，比比皆是，莫不切齒痛恨。真正是一面嚴肅工作，一面是卑鄙與無恥。（見一九四三年七月廿一日新華日報華北版社論要求國民黨取消敵後特務政策一文）在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特務是到處打入解放區，放毒，暗害，騷亂地方秩序，造謠刺探情報，破壞建設工作，並勾結敵僞殘餘和土匪，陰謀暴動。騷擾東北的通化事件即是國民黨特務頭

子孫耕曉勾結日寇師團參謀長友田舉行大暴動，企圖成立中日聯合政府，響應國民黨法西斯對東北人民的進攻，使人民再陷入十四年來的牛馬奴隸生活中去。

在陝甘寧邊區綏德破壞的大特務李化南，馬熾樞，李宏謀都是雙料貨的兼差特務，又是日特又是國特。（見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解放日報）米脂縣一個被陷害的失足青年艾龍飛，向群眾大會坦白道：「三五年高仲謙把我捉去，上毒刑，假造我的自首口供在報上發出來。我在他的威脅利誘之下，參加了國民黨，後來又參加了CC和復興社。四三年臘月初九我又被迫參加了漢奸組織——汪精衛的「反帝同盟會」……（見四三年十月三日解放日報）在河北解放區，舉一個特務李金玉的自供來看：「他說他是一戰區國民黨派來的，指的接頭地方是任望集南街的藥舖子，國民黨明確告訴他那是日本特務機關，同時說如果被八路軍捉到了，不要供出國民黨來，就說是日本派去的。任務是刺探重要的軍事機密及謀殺高級的長官，其次是注意與日本的連絡，如果日本「掃蕩」被捉到，只說是國民黨員就可放回。」（見四三年十月四日解放日報）又如四三年漢奸特務吳開先公然從敵戰區坐飛機到重慶，大肆活動，國民黨當局還奉爲上賓。抗戰勝利後在一次審問大漢奸穆斌時，他供出了曾與國民黨軍統局特務頭子，戴笠建立了特務聯系，更是舉世皆知的鐵證。矛盾先生的名著「腐蝕」裏對於國特與漢奸日特的來往和兼差更有生動的描述。

我們從以上這些事實裏可以看出，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與日本特務很難分清，他們是長期勾結在

一起。國民黨反動派掛上抗日的招牌。不僅自己來破壞共產黨與人民，還和日寇特務結合起來夾擊共產黨八路軍與解放區，其無恥與沒有民族立場到了極點。

第三節 黑暗的保甲制度

國民黨政府在地方行政上實行黑暗的保甲制度，這些保甲組織是國民黨法西斯一黨專制獨裁下直接控制人民的基層統治機構，直接對人民作血腥的壓迫和無限制的掠奪。

一 區鄉保甲與上級官府互相勾結狼狽爲奸

「區鄉長，聯保主任，保長，甲長，完全是官府委任的。這些人都是地方上有錢有勢的土豪劣紳，惡霸及其爪牙，地痞流氓，他們之活動當區鄉保甲長，完全是爲了升官發財，而一黨專政的政府委派他們，是利用他們刁詐狡猾的手段好實現壓迫剝削人民。委派時則不出乎利用私人關係或公然「賣缺」，於是他們與上級官府互相勾結，狼狽爲奸，敦樸的農民當然不是他們的對手。因此他們飛揚跋扈，作威作福，老百姓不能奈何他。問或有人忍耐不了向官府控告他們，而因爲他們是官府的爪牙，官府不但不能講公理，反而將這些案件推到被告的那些最老練的貪官污吏去審理敲詐，如此，老百姓不但不能解除冤苦，而每每冤苦中更加一層冤苦……」（見重慶「全民抗戰」第三號溫光三先生一

文。

二 土豪劣紳掌握着基層政權

這些保甲人員對有錢有勢者巴結，對一般平民欺壓，黃炎培先生『在山有虎，在區有虎』一文中這樣寫道：『德昌在西昌，會理綫上，算是最大的市鎮，屬西昌縣第三區。……參觀區署，區長不見，見區員及巡官，問德昌鎮多少戶口，不能答。見區署有拘留所，索觀名冊，冊係表式，刊有姓名，年歲，籍貫，住所，入所年月日，案由，出所年月日等等。見有不記案由者，有不記入所年月日者。有記明死在所內者四人。記名逃逸者四人。在所最久者，替他核計，已在六個月以上。問究竟現禁多少人？初答十幾人，後答二十幾人。問許多不明案由的，從那裏來的。答某紳送來的。問有函件嗎。答沒有，僅有張××名片一紙……』（重慶『國訊』旬刊第二二六期）。

又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黃炎培先生在復旦大學講話中說：『偶然走到一個鄉下看了一個「看守所」，裏面擠得已沒有一寸空地，要鄉長拿名冊來看，才知道死在這裏面的已不在少數，問鄉長這些人都犯了什麼罪，爲什麼不送法院，他說「黃參政員呀，不是我要關他們的，是地方上的士紳張大爺李大爺……送來教把他們關起的……」像這樣的地方行政人員和士紳在中國不知有多少。……一般下級行政機關可以這樣的隨便拘捕老百姓，可見人們毫無法律保障，同時也可見土豪劣紳的魔力是如

此之大：只需一張名片，或一句話就可以叫區署，鄉長拘押人民，至於以下的聯保主任保甲長之聽命於土豪劣紳那更不用說了。國民黨統治區的基層政權就都是掌握在豪紳地主惡霸流氓之手的。

三 國民黨部及特務機關對保甲的控制

國民黨的「黨化」勢力和特務勢力也伸展到了農村的保甲機構，國民黨部及其特務系統也就成了保甲的實際操縱和指揮者。區鄉保甲長必須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縣、區黨部可以命令聯保主任保甲長，特別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更可以命令他們做一切壓迫剝削殺人的勾當，聯保主任保甲長與特務結合一致謀害青年學生及抗日積極份子，農村救亡工作人員，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實。（見保甲制度研究一書第一七四頁）。

四 保甲人員橫暴鄉里魚肉人民

區鄉保甲長就因與國民黨及其特務勾搭結合，平時就更大膽作威作福氣焰囂張，如「鄉長出門，要帶衛兵四五名之多，」（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重慶國民公報社論）他們欺壓平民，貪污腐化，敲詐勒索，無所不為。

成都新蜀報四四年五月十八日社論說：『今日國家要政，諸如兵役徵工，攤派諸事，無不假手保

甲，彼等假公濟私，以意爲法，橫暴鄉里，魚肉人民，其例舉不勝舉。」

保長任意增減土地陳報，重慶新華日報載大後方農民生活說：某縣的土地陳報……辦理人員，多假手保長，而保長則任意增減一般農民自行陳報的地畝，有一保長自己領用土地二百餘畝，在陳報上填八十餘畝，其餘數目，都分攤在一般小自耕農身上。許多小自耕農僅有五六畝，保長替他改成九畝或十畝。許多應除鐵路基地所佔的土地，保長仍把他計算在內，意在填補他那百畝未報的空缺。事先，這些小農都在鼓中，及到看了徵糧通知書，才恍然知土地增加了，原應繳六斗或七斗，現在忽地要繳二石或一石二三。照原有地畝不應列爲徵糧戶口的，現在忽地要繳一石，這種意外負擔，實在使他們「吃勿消。」要查一查嗎？上面派來人，每天酒飯招待，保長又派歸他們，而且還得罪保長，還是「雞蛋和石頭碰」，寧肯錢吃虧，不要人吃虧吧！（見四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重慶新華日報）。

人民除納糧以外，還要給官府負擔繁重的苛捐雜稅，據四二年四川資中縣調查爲例，名目有六十種之多。在這些苛重的捐稅攤派中，「由保長決定執行的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次爲鄉鎮長決定執行者，佔百分之十。攤派數目，大部分飽了私囊。普通都不發收據，即使發出，也由鄉長發到甲長爲止，不發給老百姓。保長從來不公佈賬冊，老練狡猾的鄉鎮長，對於如「積穀」「優待金」等大量攤派之類，往往造假賬，用私章私印。」（見四川省訓練團民國三十一年度攤派調查報告書）「拿××省的情形來說，據有人統計……政府要老百姓負擔一塊錢，老百姓要出二十塊錢才能完事，其餘的十九

塊錢上那兒去了？一層層的被「中飽」了。這當然是很極端的例子。但以普通情形而論，每個老百姓所負擔的「中飽費」總在正式負擔（指各級政府規定的）三倍以上。」（董常：抗戰中的西北民生問題 重慶中國農村雜誌戰時特刊第十九期）。

例如在湘西！在抗戰以後，地方上的捐款，更無了許多，自治捐，自衛捐，航空捐，保甲捐，役捐，土匪來的時候，打死了壯丁，撫恤費，喪葬費也是出在農民身上。但這些捐還算是正式的，鄉保甲長平時的私捐，那更了不起呢！像最近政府在湘西北徵收殺豬稅，省府下令要徵收多少，可不知道，縣府就下令要每鄉徵收三百元。鄉公所拿到這一命令，他也不給地方上知道，只說「殺一隻豬，要徵收三塊錢」。一鄉大概有一千個豬，鄉公所就拿到三千塊，交了縣府三百塊，多下來的二千七百塊，鄉長同土豪劣紳分肥去了。」（中國農村六卷二期一九四〇年二月出版）。

「苛政猛於虎，」鎮鄉公所的人一到鄉間，不是要錢就是要款，老百姓見了他們像是見了閻王，陝甘寧邊區周圍的老百姓有一歌謠：

鄉丁臨門，

鷄飛狗跳牆，

燒酒盤子有細麵，

臨走還得幾百元。

x x x

一說二罵三鞭桿，

飽搗能借還罷了，

沒有的窮漢見閻王。

如陝西洛川縣民有鄉第三保保甲侯金有，就將石泉村一個姓侯的逼的跳井了，他家裏的人一顆糧也沒有，只好活活的等死。又該鄉西谷峴村的一個人，每天吃野菜，熬着米湯度日，可是因為保費出不起被關在禁閉室裏，逼得吊死了。（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解放日報）四五年四月一日解放日報登載了一個國民黨統治區的逃兵的話：「我本在藍田家鄉當了一個鄉學教師，但這也不能免去作爲聯保主任抓丁的對象。鄉學一合併，就要我「入伍」了。我家裏就有一個老母，依據法律，我是獨子，本不是在徵之列。但這些他們是不管的，聯保主任張萬說過：「甚麼國法？我就是國法！」我躲在外面好些時，去年中秋節，天黑時我回家看看，進門剛不久，便有打門了，說是來查戶口的，母親把我藏了起來，來的人很兇暴的逼問母親，母親推說不知道，可是立即受了兩個耳光，打得老年人跌跌撞撞，他們不容分說，把母親吊在樹上，沒頭沒腦亂打。這些我都聽得很清楚，母親的哭聲使我心痛。作爲一個兒子，誰還能忍受呢！我一氣關了出來，保長冷冷的說：「你看你把你母親害成什麼樣子，再不出來，會把她活活害死，」我看見母親的手上臉上，都是血，我撲過去大聲哭了。但他們一

把抓住了我，叫團丁把我捆起來，把我拉走了。」這樣的血淚事實在國民黨統治區是太多了。八一五以後由關裏國民黨統治區回來的東北名流車向忱先生談到國民黨統治區的情況時說，『家要出壯丁，日本人還都不挑孤子當國兵呢，可是國民黨却不管你什麼孤子不孤子的，但是你若肯拿出十萬八萬的法幣給保長，那就管保你什麼事也沒有。』他們大批的索取賄賂用抓來的壯丁高價私賣頂替。『他們派上自己的武裝爪牙，把打柴的樵夫，趕船的水手，過路的行客，破廟裏的乞丐，自己或親戚的仇家，無帮手的獨丁，像逮捕犯人一樣的拉來，五花大綁硬充壯丁交差。近且花樣翻新，要是對聯保主任，保長等貪污行爲稍有異言，或者你是農村救亡工作的積極份子，就不論是正教養課的小學教師，正求着學的青年學生，或者家居的公務人員，統統都有突然被拉去當兵的命運。』（三九年八月十六日出版西北雜誌第三十五期方晟：兵役動員問題）拉丁聲中，四川有諺云：『天上敵機響，地下保甲長。』可見人民眼中，對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及其爪牙的保甲長，實與帝國主義敵人對人民的危害殊少區別。國民黨統治區還普遍流傳着一句民語：『生下孩子是老蔣的，打下糧食是保長的。』這句話裏面不知充滿着多少辛酸和冤恨啊！

五 進一步實行法西斯的警管區制

最近國民黨反動派又在上海、北平、瀋陽等地實行法西斯的警管區制和特種戶口登記制，敵偽時

代的國民身份證制，和查問暗制，進一步用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統治人民的辦法來加緊嚴厲的統治中國人民，引起了全國人士的群起反對。

這樣，「一黨專政」，「特務統治」，「保甲制度」，三者互相結合，互相滲透，就構成了中國式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專制獨裁的政治制度。特務統治是爲了保證其一黨專政的工具和手段，保甲制度是實施一黨專政的基層機構，一黨專政則是「特務統治」和「保甲制度」的基礎，和靈魂。要廢除其卑鄙的特務統治和黑暗的保甲制度，使人民從痛苦死亡中解放出來，必須從根本上廢除法西斯的一黨專政。一黨專政不廢除，特務統治和保甲制度也就取消不了。因此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成立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民主聯合政府，就是當前中國最中心的任務。

第四節 官吏的貪污腐化營私舞弊

一 搜括民財荒淫無恥

在這種封建法西斯的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下，當官的就是欺壓人民剝削人民的少數反動統治階級及其代表，走狗爪牙，他們絕不是爲人民大眾謀利，而是吸吮人民的膏血來肥胖自己，使他們自己過着窮奢極侈的生活，因此不可能有廉潔政治。國民黨政府機關及軍隊中，上自蔣介石本人下至保長甲

長軍隊中的司務長連排長貪污腐化營私舞弊是非常普遍而平常的事情。蔣介石本人在美國的存款就有若干萬萬美金。其他的權貴顯要家產之富，就實在難以計量了。即使當一任縣官保甲長下來，也就可以立即致富，家產巨萬。抗戰以後，那些當官的，大發國難財者，數量也是驚人的，正氣日報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社論曾說：「貪污瀆職份子，乘此物價波動的機會利用職權與借用公款的便利暗中實行囤積居奇，轉手之間獲利倍蓰，而在會計收支上却寫得清清楚楚簡直使你無法追究。」廣西日報四五年三月十二日社論也說：「所謂半官半商，亦官亦商者，囤積居奇，利用地位，勾結奸商，營私舞弊，或則索黑錢，受賄賂，或則偷運物資走私資敵，高樓大廈做生意買地皮，本身竟引以自豪，不知羞恥」。例如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及其女兒孔二小姐，就是赫赫有名的發國難財者之一。他們利用權勢形成壟斷性的大金融官僚資本，併吞和排擠中小工商業者，他們還利用其金融界的特殊地位，作黃金投機，在金價一漲一縮之間，就能從人民手中增加來數千百萬的財富。四五年三月曾發生一個巨大的黃金提價舞弊案，國民黨政府決定將黃金官價由每兩法幣二萬元提高到三萬五千元，他們自己知道了這個消息，就趁機在提價前大量的向銀行購存黃金，有一人購存黃金三千兩者，其他二千兩以上也有十餘人，都是與金融界有關的要人。（見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解放日報）四六年三月間CC派頭子陳立夫利用開放外匯機會用二十元法幣合美金一元的官價購進美金外匯一百一十九萬，而當時市價則是法幣二千一百餘元合美金一元，發了二十餘萬萬法幣的橫財（見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東北日報）

在這種貪污舞弊，搜括民財的基礎上，他們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如宋美齡用牛奶洗澡，孔二小姐用飛機馮嫁妝到美國去結婚，爲了女的要浪漫美，於是乎一雙絲襪子花了一國人的伙食費，所製出嫁的，可以夠兩個師的裝備費，在重慶吃飛機從香港運來的自來水，（因爲重慶的水太硬怕吃粗了姨太太的脖子）這就是國民黨政府官僚軍閥的真實面貌，也是國民黨反動派所以堅持一黨專政的內幕。

二 官官相護互相庇

他們官官相護互相庇，因此『貪污而被檢舉，檢舉而被嚴厲制裁的，真是百不及一。』（廣西日報四四年八月社論）有的因事機不密被社會輿論檢舉出來，國民黨政府還加以拖延寬恕。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他們就拿出一二個小角色來犧牲，以應付輿論的指責，而那些大頭子們，則是不會被檢舉到的。舉較近的例子來說：如四四年重慶『全國慰勞總會貪污案，早經轟傳一時，但據國民黨社會部長兼慰勞總會副會長谷正綱語人，此案牽涉頗廣，未便公佈。』（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解放日報）四四年國民黨郵政匯業儲金總局局長徐繼莊貪污案，把公款大做私人生意，雖經國民參政會檢舉，大後方社會人士紛紛指責，但政府却置之不理，至今似乎是『時過境遷』（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解放日報）又四五年國民黨財政部直接稅署署長高秉坊大貪污案，據該年三月二十二日貴陽大剛報載，重慶通訊說：『這案聯系得很大，單就已查有證據者，壹丙稅就是十五萬萬多元，後有查出的不

知月錢』。高某被拘後，却有人願以三千五百萬元請法院准予保釋。又四四年經濟部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李泰初大舞弊案，涉及不知多少百萬之數。此案被檢舉後，法庭開庭，李從未到案，而且又跑到美國逍遙法外。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重慶合衆社電大公報載：外交部次長稱，李泰初已入籍爲美國公民。國民黨政府對此案拖延寬恕，並發給出國護照，其故意包庇，還不夠明顯嗎？其他省縣專員級的貪污，也是一樣的驚人，被檢舉出來的，例如四四年河南糧政局長兼第十五專員李杏村於敵人進犯洛陽魯山時，利用時機將該兩機關公物現款盜賣並捏報損失價值千餘萬元，他在局長任內，還吞食民食資金三百萬元及其他資財不計其數。

三 無恥逃跑和投降敵人

平時如此，遇到敵人進攻時，即使敵人還離得很遠，這些官僚們早就挾了一車車的財物和姨太太溜之大吉，把人民丟了，或者就無恥的投降了敵人，依舊當官（僞官），搜括人民。抗戰以來，國民黨中大批將領官員投降了日本從國民黨的副總裁汪精衛數起，直到國民黨中央委員二十多人，直到C（復興的特務頭子，直到全部江蘇省黨部，三青團，特務隊，直到六十多個將級以上的軍官（大部份是率部投敵的），直到無數的省級，縣級的黨政工作人員，相繼投敵作了漢奸。至於區鄉級下的貪官污吏投降敵人作漢奸的，那更是數不盡了。

四 接收大員『五子登科』漢奸土匪當了大官

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官員在接收『收復區』的物資中，更是你搶我奪，好似狗搶骨頭一般，把公產據爲己有，在其互相攻擊中，揭發了一些材料。如本年三月間在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參政會上揭露了有『農林部次長錢大鶴，排除異己，乘接辦上海農場之際，盜賣掉接收之優良乳牛千餘頭，計舞弊達二十億元。』等事實。（見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東北日報）瀋陽的敵偽倉庫，這個接收了那個又去接收，往往一個倉庫賤了幾十個機關的封條，甚至在爭奪中互相衝突起來。那些接收官員，荒淫無恥，東北人稱他們爲『五子登科』，就是說他們到了以後，買金子，佔房子，吃館子，玩戲子，嫖窩子。許多僞滿時候的漢奸官員都搖身一變而爲國民黨和中央軍的官員，如僞滿時撫順市僞警察局警官郭森，以一百七十萬元換了撫順公安局長之職。僞滿時大販毒品，鴉片煙組長華雨亭八一五後被人民控訴，畏罪逃亡瀋陽，這次也以百萬之款，買得『中央軍』上校官職。稅務局長也是以四十萬元買到的。（見四六年五月六日東北日報）慣匪『殺鷄王』鄧國清委爲鞍山市長，長春的『接收大員姜鵬飛就是一個有名的漢奸僞軍頭子』。正義的國民黨老党员續範亭老先生，於目疾痛恨國民黨反動派專制腐化之餘給國民黨的官僚們寫了一首詩：『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錢，三訣吹、拍、騙，四維禮、義、廉』，真是形容得淋漓盡致。

五 拒絕借用在美存款

四四年九月國民參政會上通過了無黨派民主人士褚輔先生等提出『動用中國人在美凍結的存款三萬萬美金作抗戰之用』的提案，大後方許多報紙都著文表示贊成，重慶『僑聲報』還用中英兩種文字在街頭發表宣言，成都燕京大學及遵義浙江大學都相繼爲此事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以後又發起群眾簽名運動，僅僅在一個上午，昆明聯合大學，簽名的教授，職員，學生以及校工等達一千一百餘人，其他各機關學校及人民群眾也都廣泛的展開此項簽名運動。自然，借用存在美國，巴西，瑞士的外匯存款五萬萬美金，照當時美金黑市計爲三千萬萬元，即只借用在美國凍結的三萬萬美元，亦合法幣一千八百萬萬元，不失爲當前財政上救急的一個方法。不過，誰都知道，這些存款的主人，就是今日國民黨政府的首腦與要人們。在嚴重的財政危機中，人民對於那些天天盜竊的國庫，却又天天喊財政困難，天天要增加民負的人們，僅要求借用他們巨大財富中的存外凍結存款部份，對於他們等於在巨牛身上拔一毛，無論如何是沒有理由反對的，但他們却厚顏拒絕了。

六 下層公務員待遇微薄不能糊口

困難的是下層僱員，公務員，他們爲國民黨政府機關所僱用，同樣是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迫和剝

餉，待遇微薄，不能糊口。四四年九月三屆國民參政會中一百廿一個參政員在提案中說：『各級奉公守法之公務員，亦因薪金微薄，朝不保夕，其生活之艱苦，非身處其境者殊難想像於萬一。』就是指的這一部份人員，最近國民黨統治區縣級公務員，發起組織中國縣級公務員生存同盟，發表『爭取生活平等待遇』宣言。他們舉出七點事實：（一）縣級公務員貧病交迫。（二）縣級公務員以糊口不足，演成家庭悲劇。（三）衣食住行陷入絕境，遭受勢力社會之歧視。（四）俸不足以養廉，非特不屑貪污，即欲貪污而不可得。（五）同為一個公務員，而待遇懸殊，精神遭受刺激。（六）對黨（即國民黨）及政府失掉了信心，精神上趨向理想的三民主義。最後提出他們的口號：（一）請依法實行同一增加待遇，不容有所區別。（二）請政府對公務員的衣食住行負起責任來。（三）為抗戰而流血受難的縣級公務員，快快爭取生存。（四）不患寡而患不均，苦要大家同樣苦。（五）爭一個人的生存，爭一家人的生存，爭全中國的生存。（六）誓為生存奮鬥到底。（見四六年五月十八日東北日報成都訊）本年五六月間上海南京開始的工教人員罷工，要求增薪，已引起國民黨固重慶，北平、徐州等地方法院人員共同罷工，因物價已漲至抗戰前的五千，一萬，甚至三萬倍，按照官方統計，滬寧的物價指數，亦已比戰前增四千倍，但薪資的增加僅為戰前的一百倍，以致絕對無法維持生活。（見四六年六月十六日東北日報）

國民黨政府官僚們貪污腐化壟斷發財的現象，是和國民黨封建法西斯的一黨專政分不開的，是這

種政治制度下的附隨的必然產物，貪官污吏依附着一黨專政，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支持着貪官污吏。大地主大買辦大銀行家及其走狗爪牙就是利用這個政治統制來保證其經濟上剝削搜刮掠奪人民的基
本目的，這就是他們堅持一黨專政的原因。因此也只有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之下，才能掃清
這些官僚軍閥貪污腐化，搜括人民的現象。

第五節 人民的反抗運動與民主運動

國民黨法西斯反動派，雖然如此黑暗的壓迫人民剝削人民，但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反抗黑暗要求
民主，要求改革政治的行動，並不因之稍為減弱，反而日益高漲，近數年來，國民黨統治區內廣大的
民主運動，更以堅毅不拔的力量，在向着反動派法西斯勢力英勇搏鬥着。

一 民怨沸騰民變蠶起

陝甘寧邊區周圍的國民黨統治區，老百姓流傳着一個民話：

昔日秦始皇

今日有老蔣

這可以代表國民黨統治區內一般人民對黑暗統治的怨恨。農民們被壓迫剝削得山窮水盡，不甘坐以待死，於是就民變起，連年來很多地方起來暴動，舉其大的來說，計有四三年甘南回民暴動，起義的民衆近十萬人。派去『進剿』的國民黨軍隊，共六個師以上，但有的軍隊却又不忍殘殺廣大人民，且亦起義到民衆方面去了。陝南的農民起來暴動要求免了免糧。貴州也曾有二十餘縣的農民暴動，其口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反，免了免款。』四四年河南農民數萬人組織『天下第一軍』武裝起義，把國民黨軍隊二十八師一個師完全繳了械，把師長也殺了。四五年西康夷民因不堪國民黨當局的殘酷壓迫，舉行四萬人的大暴動，持續四個月之久，國民黨派去『進剿』的軍隊達十萬人之數。同年陝南『第八行政區』暴動的人民攻戰縣城，要求免了免糧。四川宜賓縣城一度爲民變攻入，川北災民到處吃大戶，紛起騷動。貴州萬餘農民暴動，奪有步槍二三千枝，聲勢浩大，一度佔領三都縣城。四四年至四六年新疆回民在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的高壓與剝削下，舉行武裝暴動，要求民族自治，已持續一、二年，起義回民軍隊四萬人，北佔塔城，南佔阿克蘇及喀什爲格等地，屢敗國民黨胡宗南軍，據四六年三月美聯社重慶電，尙在談判自治中。最近僅據報上不完全的材料來說，江蘇安徽浙江南部各縣四川西部，西康東部等地又發生大規模的民變，抗糧抗徵，浙南，閩北已發生四次

兵變。杭州、嘉山、蕪湖等地也都發生幾千人幾萬人的騷動。至於幾十人，幾百人的『逼上梁山』，起來反抗那更不可勝計了。但國民黨當局則採取殘酷的『圍剿』，在血泊中掃滅人民的正義反抗。即以四四年河南民變來說，國民黨軍隊血洗人民即達五千餘人，凡在十歲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免。四六年三、四、五月間在四川西部，西康東部屠殺農民達二十萬之多。（新華社延安四六年六月五日電）血流成渠，造成巨大慘案。但是人民的反抗，是不會有停止的，相反的却正在日益高漲中，在一定的時候，就會有更大的規模和力量把一黨專政埋葬到墳墓裏去。

二 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

革命最堅決的中國工人階級反抗剝削壓迫，要求經濟生活改善與實行民主政治的鬥爭，也在堅韌地高漲着。抗戰中他們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爲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忍受着殘酷的剝削和高壓的統治，過着牛馬般的生活，他們埋頭生產，爲了抗戰盡了力量，但是也爲着中國的民主和富強，爲了解除廣大人民的痛苦，爲了自己繼續活命，他們也在要求改善待遇與反對法西斯一黨專政特務統治而鬥爭。他們不斷的舉行罷工，示威。就以四六年報上透露的極不完全的材料來說：即有二月間重慶電報局工人四千餘人的遊行示威，電訊交通工人，紡織工人，紙幣工廠工人，忠恕沱兵工廠工人，大渡口鐵廠工人，中央印製廠工人的罷工運動。數月來上海先後五十萬工人的罷工運動，六十八廠十萬失業

工人的代表舉行飢餓大遊行，寫着『當光！賣光！吃光！』及『做一天吃一天，停一天餓一天。』的傷心話。三月四日滬東各廠全體工人集體絕食，中央印製廠二千四百餘人進行絕食抗議。軍服廠八百女工向國民黨當局請願，上海香燭業職工舉行總罷工和請願，他們不僅要求增加工資，提高待遇，並且提出了要求『立即實現四項諾言』『立即實現民主聯合政府』等口號。但是國民黨當局也是以瘋狂的鎮壓來對付工人們的正義要求，如監禁重慶大渡口鐵廠工人五百餘人，機關槍掃死工人十餘名，派十餘道軍警包圍忠恕沱兵工廠，周圍數十里內滿佈便衣特務，強迫工人復工，並捕去工人數十名，有數名遭慘殺，上海工人被開槍射擊，被逮捕鞭打，講願女工被警察用鐵棍追打，女工代表被推下高樓，慘不忍睹。長沙人力車夫罷工，慘遭國民黨血腥屠殺。這樣的事情，舉不勝舉。但並未阻止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中國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相反地，工人運動却更堅強更高漲地開展着。

三 工農力量是人民反抗運動的主流

廣大農民與工人群眾的正義鬥爭，形成了國民黨統治區內反抗運動與民主運動的主要巨流，他們蘊蓄着偉大的力量，他們已在一天天更有覺悟地發動組織與壯大起來了。

四 各黨各派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民主運動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美國『美亞雜誌』評論說：『在國民黨統治區，曾經有而且現在仍有一種不斷增大的力量，這種力量過去是而且現在還是反對重慶官僚機構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這些反對力量中除了國民黨內傑出的自由派份子外，還包括其他許多黨派及無黨無派的領袖人物，特別是知識份子、職業界人士，更大部份的較下級的公務人員，小商人，工人，以及更年青的軍官。……』

繼中共提出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以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人士也都紛紛響應，進行着英勇不屈的爭取民主的鬥爭。四三年各民主人士及黨派（不包括共產黨）成立了民主同盟，建立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的廣泛聯盟，共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法西斯獨裁政治，要求實行民主。先後有憲政促進會，憲政座談會，國事座談會等組織及集會，文化界紛紛通訊要求民主改革，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重慶民主同盟各黨各派負責人沈鈞儒（救國會）章伯鈞（第三黨）張申府（無黨派）等聯合招待文化界賓主三十餘人，宣佈要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宣佈要求民主改革。

四四年五月二十日重慶憲政月刊社憲政座談會上工業界人士吳羹梅等提出『政治民主是工業生產的絕對條件，沒有它，一切都無從談起，』以後，中國全國工業協會也發表宣言，要求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九月一日廣西日報社論說：『我國亟須用大手術，』九月八日雲南日報社論『要求迫切進行一切必要的改革，』九月十九日成都華西日報社論說：『堅決主張立即實行民主，從根本解決中國當

前的重大問題「同日成都新中國日報社論」要求以民主憲政解決一切問題」……

自四四年九月間中共提出立即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呼籲，立即得到全國進步人士的紛紛響應。著名學者鄧初民先生在民主週刊著文稱：「一切依靠粗手大脚的人民站起來，親手握著民主的所有權。」十月二十五日重慶各黨派各階層數千人追悼鄧韜奮先生，由宋慶齡、于右任、張瀾、章伯均、林祖涵、潘序倫、冷遜、馬寅初、郭沫若等七十二人發起，「認為現在是向法西斯進軍的時候了，許多人悲憤流涕，泣不成聲。」九月二十四日重慶各黨派各階層代表五百餘人舉行了一個會議，大家一致的呼聲要求改組政府。九月二十四日重慶憲政月刊社舉行座談會，參政員冷禦秋等一致要求澈底改革政府，實行民主。四四年十月十日，四五年一月十五日民主同盟先後發表時局宣言，主張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四五年二月八日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氏在交通大學講演說：「爲今之計，唯有從速組織聯合政府。」二月九日美洲十大華僑報紙通電國內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目前立即建立全國聯合政府。」二月二十二日電重慶各業青年包括學生、中小學教師、商人、公司、工廠及機關職員等聯名於新華日報呼籲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二月二十四日成都華西日報又指出：「獨裁必成爲獨夫，無存在餘地。」又稱：「堅持獨裁，結果就只有與一般獨裁者同其命運，而走向沉淪，特殊例外是不會有的。」二月二十八日重慶八萬群眾抗議特務殺害工人胡世合，舉行公祭遊行。四月六日會昭倫教授在雲南大學座談會上說：「我們中國的執政

者，一聽人提到聯合政府就覺得恐怖異常。其實，現在世界各國——除法西斯國家外，那一個不是包括各種抗戰黨派的聯合政府？這是世界的潮流，不可抗拒的潮流！二月十三日重慶婦女界胡子嬰、李德全、史良、劉清揚、劉王立明等百餘人發表對時局的主張。三月八日昆明婦女界三百餘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呼籲。二月二十二日重慶文化界名流三百餘人等發表『對時局進言』。三月十一日昆明文化界潘光旦、聞一多、羅隆基、光未然、曾昭倫等三百餘人發表時局主張，都要求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三月十一日浙江大學全體學生發表促進民主憲政宣言。四月一日成都燕京大學全體同學發表主張民主團結宣言。四月六日昆明西南聯大全體學生發表對國事的意見。四月十八日雲南大學全體學生發表對國事的主張，都要求廢除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五四紀念節日，成都重慶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風、潘梓年、巴金、曹禺、張恨水、孫伏園等等號召作家與人民相結合，反對封建勢力與法西斯細菌，爭取實現民主。昆明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英語專科等學校教授發表時論，要求政治民主。成都三千學生，衝破各學校的封鎖，舉行集會和火炬大遊行。燕京大學秘書長沈體蘭的演講中說：『過去談救國，只是反抗帝國主義，現在的救國是反抗一切法西斯。』他們盟誓爲爭取民主自由而奮鬥到底，口號聲歌聲像春雷一般，震動着爲幾個火把所燃亮的黑夜的天空。在昆明則舉行了兩萬餘學生的大示威遊行，沿途高呼：『立即停止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取消特務組織』等口號。同日雲南昭通數千學生也舉行遊行，要求結束黨治，實行民主。這些例子

是舉不勝舉的，這些各黨派各階層人士，特別是青年學生都在以英勇的姿態，在特務的百般破壞毆辱下，不屈不撓的進行着爲民主的鬥爭。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中是一貫負着光榮的先鋒作用和橋樑作用的。

抗戰勝利後，在全國各地廣大人民響應着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和平民主運動更蓬勃的開展着。例如四六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民主促進會，民主同盟會，民主建國會，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工商協會，婦女聯誼會，學生團體聯合會，雜誌等聯誼會，美術作家會，中小學教師團體及百貨，製釘，水電機，各種職業與產業公會等九十二個人民團體發表宣言，呼籲制止國民黨反動派依靠美國援助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要求實行民主。長江下游蘇州，杭州，上海各地學生已都掀起了大規模的和平民主運動，舉行反內戰大遊行。六月二十二日上海市民學生參加遊行示威者達十餘萬人之多，要求美軍自中國撤退，敦促蔣介石實現四項諾言停止內戰。浙南各地學生教員也舉行罷課請願運動。上海文化界，實業界名流馮敘倫，陶行知等一百六十餘人致書蔣介石並派代表赴京請願，要求停止內戰。其他各地各界人士亦不斷的發出同聲呼籲。紛起反對國民黨勾結美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內戰行爲。

在國民黨內部的民主人士，也不滿與反對這種黨內外的專制獨裁要求實行民主。我們舉一些典型的例子來看，如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都新中國日報，刊載四川大學一個國民黨員學生李實肖的投

書，題爲『黨政罪言』稱：『總理逝世，會幾何時，而以黨治國之事發生，更演進而有黨在國上之語……以黨獨裁，代替專制政體，誠不免以暴易暴，五十百步之譏矣。總理所希望之民國，豈如是之民國乎？』

國民黨元老司法院副院長覃振先生在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重慶各界人士的一個大會上，激昂感慨的說：『從同盟會到辛亥革命，許多革命志士在國父領導下，流血奮鬥，爲求民主實現。如今民國已三十三年，還要大家來談提早實現民主，真令人感慨系之。』又說：『我不相信中國真會在世界民主潮流中落伍，我們要堅決起來做主人，不做牛馬，我們同志也要想想同盟會時的革命精神！』孔庚先生也說：『民主的潮流不可侮，就是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滿清皇帝再世，殺人如麻，也不能阻止。』最近國民黨內部民主人士爲反對國民黨法西斯派更進一步組織起來了，成立有：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誼會，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改革委員會，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務改革委員會，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務改革委員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團體，它們於四六年五月間發衣一個文件，認爲該黨二中全會被封建頑固的小組織在腐蝕，並認爲國民黨二中全會中常委及國大代表選舉是一種假民主的手法。他們主張實行黨內外的真正民主，首先必須革除封建頑固的小組織。他們認爲國民黨之所以成爲官僚政治集團，黨與民衆隔離，黨員官僚化是主要症結。他們擁護政協會議決議，他們鄭重聲明：『真正忠實於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員，不但不同意封建的頑固小組織壟斷政權，包辦黨務的企圖，並

且反對這些決不是真正的國民黨員的主張。」國民黨內的民主份子也已開始組織起來向反動派作鬥爭了。他們的力量在日益增長着。在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解放區的反人民內戰中，其官兵們不斷的放下武器。在東北的一八四師全體官兵，在師長副師長率領下光榮起義。山西晉軍三千餘人光榮起義。他們也參加了爲和平民主的鬥爭，他們向全國發表通電和宣言，要求廢除一黨專政，實現全國和平民主團結。

從以上許許多多的事實中，可以看到國民黨統治區內各黨派各階層的廣大人民，甚至國民黨內部和其政府軍隊中的廣大民主進步人士，都在反對着這種反動統治，並且日益高漲起來，日益壯大其力量，在不久將會造成更廣大的全國人民的緊密團結和要求民主的一致行動，雖然反動份子目前還在各地猖狂，但這些卑鄙無恥的敗類，在今中國民主的鐵流下面，已經是垂死的掙扎了。

同時也可以看出，這一系列的反抗運動民主運動，都是環繞着共產黨的政綱及每一時期的具體政策而英勇前進的。廣大人民群眾是跟着共產黨所指出的方向和口號而進行鬥爭的。因爲共產黨的主張是唯一代表中國人民意志的正確主張，是黑夜中的明燈，它每一時期都給人民指出了行進的路標。沒有共產黨就沒有這一系列的有光明照耀着方向的鬥爭行動。沒有共產黨也就沒有了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

在解放區，人民大眾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有了普選權利，參加和掌握了政權。解放區的政權是各黨各派及各階層民主人士共同參政的新民主主義政權。政府和人民在『一切爲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原則下建設着光明幸福的新社會。

第六節 解放區的民選政府

一 人民享有普遍、平等、直接、不記名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在中國解放區，人民已首先在中共領導下獲得了不分階級，黨派，民族，性別，信仰，不受財產與文化程度限制的，普遍，平等，直接，不記名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用選舉方法產生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即各級參議會）及各級政府，即是說：無論工人，農民，地主，資本家，（但必須是擁護共產黨的不反共不投降堅決抗日、團結、進步，與解放區一切民主建設之政策主張者），無論共產黨，國民黨，以及各種黨派，無論漢、蒙、回、滿等各中國民族，無論男的女的，窮的富的識字的或不識字的，無論信仰何種主義，（但必須是擁護共產黨的堅決抗日，團結，進步，與解放區一切民主建設之

政策主張者，)與宗教，凡年滿十八歲，除漢奸，特務，對人民犯罪而被褫奪公民權者，及有精神病者外，都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解放區的政權，從村，鄉，縣，市到省或邊區，都由全體選民直接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即各級參議員)，組成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即各級參議會)，再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各級政府的最高機關和民意機關，它是人民代表，它把人民的意志集中起來，決定大政方針，交給政府去做，它可以檢查督促與罷免政府。

人民除隨時可向參議會或政府提出意見外，還定期檢查政府工作，檢查政務人員的工作作風，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真正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是戒』，『有過則改，無則加勉。』一方面使人民能夠更好的識別人材，選舉為他們所能信任與需要選舉的人物，以加強各級政權。另一方面，使人民能更了解熟悉政府工作，提出問題，發表意見，作為及時和以後改進工作的基礎。對工作不好品質惡劣的政府人員，可隨時經過群眾的決議罷免撤換，另選為大家所擁戴的好人來幹。

二 人民參選的踴躍

政府為了幫助人民選舉，幫助人民行使自己的職權，在選舉之前，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工

作，有文字宣傳，口頭宣傳，化裝宣傳及各種各樣形式的會議教育等，並編製了很多代表人民利益和行動的歌曲小調，到處唱起來，秧歌戲劇，在各處流動演出，使人民了解選舉是人民做主人的第一件大事情，是中國數千年來人民不知流了多少血未曾解決的大事情，是只有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實現和享受的大事情。經過這些工作，使廣大群眾都能夠自覺的熱烈的參加到選舉運動中來，把選舉認成與自己的生存幸福分離不開的事情。由於解放區真正實行了民主政治，人民對選舉感覺到切身的利害關係，所以他們積極參加選舉，競選鬥爭非常劇烈。例如在一九四一年陝甘寧邊區選舉時，選民參加選舉的百分比，平均是百分之八十，綏德，清澗，延川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這是廣大人民對新民主主義建設事業無限擁護和關切的表現，也是邊區各階層各黨派各民族民主團結的象徵。在全世界上除了蘇聯及爲蘇聯所幫助的歐洲許多新民主主義國家以外，沒有其他國家能趕得上的（英國一九三五年全國改選，參選者佔選民百分之五十，美國一九三六年總統改選，參選者只佔選民百分之三十，而且很多下層貧苦人民是被實際剝奪了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的），因爲人民如此踴躍參選，所以經過改以選後，邊區政權的面目爲之一新，那些濫職與不稱職的幹部，自然就被人民淘汰下去了。忠實爲人民服務最爲群眾所信仰擁護的人物就當選爲政權幹部了。一九四五年陝甘寧邊區鄉選時，邊區人民先檢查政府工作，僅就十一個縣與關中一個中心區的統計，提出問題將近二萬多個。有的是建議大部是對工作及工作人員的批評。選舉結果，不好的人員選掉了，好的人員選上了。新的區鄉政府正

實際解決着人民所提出的幾萬個問題，而且大部份都已解決了，把工作推進了一大步。（見四六年四月八日東北日報）

敵後解放區人民選舉工作的進行，同樣是熱烈而積極，一九四〇年冀中區定南，深極，安平，饒陽，博野，清苑，蠡縣等七縣爲例，村代表的選舉中，參加公民百分之八十三·九，北岳區平山×兩縣的選舉中，參加的選民，達到百分之九十八，和百分之百的最高紀錄。就在某些游擊區，雖處在日寇「掃蕩」之下，仍未障礙他們的進行選舉，像定北的一些游擊區的村莊，參選公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望都約在百分之八十八左右，一般的也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有的白天不能進行，晚間進行，大會不能進行，小組進行，人民總是想出辦法，以求達到自己選舉的目的。並創造出背箱子選舉的辦法，以使不能離家的婦女及有病之人也能不掉選舉的機會。

從各階層參選的比例來看，據上面所舉的冀中區七縣的材料爲例，工人參選的佔工人全體選民的百分之九十三·一，貧農佔百分之八十五·五，中農佔百分之八十二·七，富農佔百分之八十三，地主佔百分之九十·七，商人只佔百分之五十六·七。從這裡可看出工人貧農參選是最積極，地主在民主政權下也可看出其積極起來與工人農民競選，可見解放區的自由民主一般，文化程度來看，文盲參選的佔百分之八十一·八，小學程度的也佔百分之八十一·八，中學佔百分之六十·二，大學佔百分之六十·九，可見最積極的還是文盲和小學程度的，也就是廣大的勞苦羣衆。國民黨資產階級的觀點是

要有很好文化程度才能參選，國民黨反動派口口聲聲說老百姓不懂政治，要經過『訓政』才能夠還政於民，其實他已把老百姓『訓了許多年代了，既未提高其文化，更不想還政於民』，因為他們根本不敢讓老百姓有智慧，掌握政權。拿解放區例子一比，不是很明鮮的光明與黑暗的對比嗎？何況廣大群眾的沒有文化，還不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壓迫剝削統治所造成的嗎！在解放區則不同，沒有文化，不識字，可以拿香點窟窿，或丟黃豆畫圈來進行選舉。人民的心是非常理解要自己管理政權的，人民的眼睛是明亮的，誰個好，誰個壞，他們清楚的很，資產階級不讓沒文化的人民參選，就因為怕他們選到真正為老百姓利益辦事的人來，因為如果這樣做，有錢有勢的官僚軍閥，土豪劣紳就無法站在人民的頭上了。

再從男女的比例來說，男公民參選的佔據全體選民的百分之八十四·九，女的佔百分之八十二·九，這說明了在民主政權下，男女同樣平等自由熱烈的參加了選舉。這不但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全世界上除蘇聯以外也是少有的。延安市裴莊鄉選時，六十餘歲的老太婆，跋山涉水，六里外趕來投票，並且說：『這是民主權利，不能放棄。』五台有個孕婦，選舉那天，肚子奇痛，知道早晚小孩就要下地了，然而他還不放棄選舉的權利要趕進選場去，結果沒有走到一半，終於把小孩生在一個叢樹林裡。苗鎮選舉會議正進行時，忽聽山頭有老太婆吵起來，原來是她指問村幹部說：『開會爲什麼不叫我？我媳婦不在家，我還在家，你嫌我窮，看不起我，窮人不能投票嗎？』後來經人勸說才

了事。臨縣梁家會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投票時說：『我不放過我這一票，好人多一票就選上了。』從這些例子裡可以看到選舉工作是進行得如何深入！（見四三年十月及四五年八月六日解放日報）

三 競選運動的熱烈

在選舉中，充分發揚民主，任何公民，任何抗日黨派與民衆團體，有提出候選人與提出自己的施政綱領的權利，有爲自己或他人實行競選的權利，保證人民選舉投票的完全自由。這裡從來沒有所謂『賄選』，『圈定』，『操縱』，以及『運動』之類的事情。在競選中，有些地方的農會工會、青救會等群衆團體，還敲鑼打鼓，遊行宣傳，替他們自己的候選人競選。有的農民自己說來說：『要是大家選我當了村長，我一定要給窮人們大家解決土地和老婆問題。』四一年陝甘寧邊區綏德縣某鄉選舉，提候選人時，婦女主任就說：『你們不先提，我自己來提，大家贊成我的話，就選我當候選人。』下面很多婦女，却高叫贊成，結果她當選了。還有些人在競選時提出了自己的各項施政主張，第一主張做什麼，第二又主張做什麼，……。他說：『你們看，要讓我當了選，那一件事不爲你們大家的利益着想？你們不選我這樣的人選誰？』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四五年晉綏解放區的村選工作中，群衆從檢查減租減息，變工互助，紡織，合作，爆炸，擁軍優抗，群衆負擔，村經費賬目等工作中，發現與民主地提出數量衆多的候選人，然後一個一個的從他爲

人民辦事的表现加以比較，在「比」和「選」的過程中，充分證明群眾不但認真，而且善於運用民主。有一小部份人在進行競選中，曾提出「能力强」「好脾氣」，「書肚子人家辦事有把握」的人來，群眾說：「能力强但他不能爲咱們辦事，」「能說不能做頂甚事」不知老百姓的實情怎能辦事，「拒絕了選舉那樣的候選人。臨縣龜崙村的選民在比較兩個候選人時說：「郝選林脾氣有些不好，可是辦事公道，能幫助窮人減租贖地，李樹枝是老好人，但不能辦事。」「群眾對自己的候選人既提出他的優點，也指出他的缺點，但誰要充公圖抓住候選人的缺點來打擊他，群眾是不讓的。臨縣下白楊村有少數壞人結成集團打擊會有成績的幹部，污蔑他挑撥人家離婚，但一個向來不敢在大庭廣衆說話的婦女也站起來講話了：「這事情我知道，人家那有這回事。」檢討他的其他缺點後，群眾說：「如果犯了一點錯誤就摔掉他，再選起來的也不安心，不會把事情辦好。」在投票時更是慎重認真，楊家坡地主楊篤仁是監票員，他親身體驗到「這樣選舉可是民主啦！人們在投票時也都有着主義。」結果選出的絕大多數都是群眾所公認的群眾領袖。例如楊家坡候選公民一百七十三人，「窮人沒有吃的什麼時候也借給，」「工作積極看大家的事比自己的事重要，」「什麼時候也不和人紅一下臉，不吼人」，的中農楊友則就得一百五十一票，當選爲主任。（見四五年八月六日解放日報）

再舉四五年延安新市鄉第三行政組的選舉情況作爲例子如下：

在一個小樓房上，人擠得滿滿的。昨天候選人已經由群眾一個一個提出來了，今晚進行討論。

這時工作組的王同志向大家簡短的說明：『這次三組檢查工作做得很好，有此評有建議，但是還要選出好人，才能把事情辦得好，這就要看咱們對候選人討論得好不好，熟悉不熟悉……』

『不熟悉，可就選不上好人！』角落裏有人在這裡說。

三組共有居民二〇六人，在醞釀中群眾一共提出九個候選人。

討論開始了。第一個候選人是雷印成，河南人，銀爐工人，說起話來臉上經常露着笑紋。

徐明安扼要的介紹：『從八路軍進延安城，他就在城裏擔任治安組長，現在是商會副會長，工作一貫積極負責，沒人說過他不好……』

不等主席允許，從窗台下站起來一個粗短的個子，他叫趙方，很性急的補充一句：『我對他這人性情可熟悉呢！』因為說話太急，一時說不下去，停了一會，他才扳着指頭繼續說：『他的好處要說也說不完，第一對抗戰負擔慷慨，出錢出糧在前頭，第二，對人和平，第三，肯幫助人——特別是對外來的難民照顧很好，第四，公共事業樂意出頭，第五，說話做事不偏心，不看面子……』他把五個指頭都數完了，好處還沒有說完。

『這樣的人，半夜打起火把那裏去找？』座中有人插了一句。

戴老花眼鏡的老漢說：『這人辦事實在有辦法，對公家對百姓都好，當個代表真美氣呢！』

『對着呢！』多數人的聲音。

『不要光說優點，有什麼缺點也可提。』主席在注意掌握會場的精神。

『誰能說出他什麼缺點？』又是多數人的聲音，有的人還想補充，有的人提議表決。

『好！表決吧！』隨着主席的話，手一齊舉起來了，一陣嘩聲：『全體！全體！』。

第二個候選人是李惠生，某公營商店經理，江蘇人。

李洪藩起來介紹說：『我提他是因為他和老百姓關係好，從沒見他和人吵過架，紅過臉，腫過眼。』

馮明金說：『他肯幫助人，有什麼文化困難，請他寫個字據，一說就成！』

李四子說：『那天下大雨，唐興安飯館遭水災，他自動去幫助他挖水溝。』

於是，又順利通過了。

第三個候選人就是行政組長井春，河南洋鐵工人，黑紅的方臉，胳膊粗粗的，看起來滿身都是勁。

他首先說：『我這人脾氣不好，希望大家多提缺點，幫助我進步。』

在檢查工作時，他會很好的檢討了自己的工作作風，關於他的自我批評精神，在黑板报的畫刊上表揚過，其次一個軍人在街上走路太快，撞倒了一個小孩，他去干涉，那人和他爭執了幾句，他就要叫自衛軍綁起來，當時被人勸阻了，後來他很懊悔的說：『八路軍是自家兄弟麼，我那次是做錯了！』誰都知道他有點牛脾氣，但誰都知道不怕當衆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且勇於改過，因此大家都能

諒解他，相信他這人的坦白直爽。

人們都說非春工作積極負責，肯賣力氣，檢查衛生啦，清查戶口啦，調解糾紛啦，都很認真。上級有個啥指示，一定按時辦到。有時深更半夜，還在街上忙來忙去。去年辦了一個夜校，和識字班，頗得衆人擁護。誰沒有紙筆，他就捐給誰。天天到校查看，問這問那。

安泰號的經理陳學平說：『非春能够把脾氣改好一些那就更好了！』這話引起一陣掌聲，一致贊成通過了。

候選人一個個的被介紹，討論，通過，群衆各自拿着自己的尺度來衡量每一個候選人。

當討論到溫××的時候，意見有些分歧了，有人說：『溫××工作積極負責。』有人反對說：『那是瞎話呢！』

王××舉出了具體的事實——『他是自衛軍班長，工作就不負責任，把工作推給夥計，只願自己做生意，他那一班人有事叫也叫不動……』

表決了，有一個人先舉起手來，在嚷：『舉手！舉手！』

戴老花眼鏡的老人馬上反對：『舉不舉，各人心裏有主意！』

結果，只有半數。

夜已深了，主席在叮嚀着：『大家回去好好的考慮呀！看看究竟誰可以當代表？』回答的聲音是

『咱們要在好人中選好人呢！』

二十六日是選舉的日子，地點在市政府大會議廳。中午的時候，選民都一個個的來了，婦女也來了，抱着娃娃，穿着整潔的衣服，帶着喜悅的笑容，好像參加婚禮一樣。

人們在注意的讀着會場四壁貼着的那些紅綠標語——『老百姓是主人，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公僕，看他辦事情的好壞，決定選不選他。』一個抱娃娃的年輕婦女和旁邊的一個老婆婆說：『到底是實話，人說邊區講民主，講選舉，當官的是老百姓，咱在河南就沒見過這……』

她是鐘錶匠楊培華的女人，從河南來邊區才二年光景，還沒有參加過這樣紅火的選舉會，今天她帶着愉快而又好奇的心情來了，她的丈夫也是今天的候選人之一。

這時選委會主任又在鄭重地逐條重複解釋着選舉規則，人們在靜靜的傾聽着——『選舉人如認為選票上的人不爲自己信任時，可以在選票以外，任意補選自己信任的人。』

今年選舉更充分的發揚了民主，主要是放手發動了群眾檢查，批評政府工作和工作人員，提的意見都給予適當的解決。通過檢查工作去發現幹部，挑選好的淘汰壞的，由群眾自己提候選人，一個一個的深入討論，然後毫無拘束的自由選舉，選民都解下這個意思，關於怎樣使用自己的權利比過去更加關心了。

開始選舉了。會場一陣嘈雜之後，馬上又肅靜下來，一張張的紅色選票，分送到選民手裏，每個

人拿着半截香火，主席再三的提起注意：「九個裏挑三個呀，多了就作廢啦！」

有一村民很快在自己所熟悉的候選人名字下面燒了三個小洞，把選票折起來了，有的還在考慮。旁邊一個輕細的聲音「選他！選他！」但被一個粗暴的聲音打斷了：「管我選誰！」

於是主席又敲着桌子，重新提起注意：「喂！不能說話，自由選舉呀！」

選舉完畢，正式開票了。

大家的眼睛都注意的瞪着黑板上的名字，雷印成和非春の票越來越多，人們便說：「保險選上呢！」

後邊也有人在議論：「×××，×××，選不上啦！威信不高，辦事不成！」

許多人都往黑板前面擠過去，心情隨着唱票員的聲音緊張起來了，都關心自己所擁護的候選人。那個戴老花眼鏡的老漢更被擠過去的人推在前面，他回過頭來說了一句：「看，老百姓的眼睛可明亮呢！」

幾個婦女在悄悄地議論：「雷印成，非春！定選上呢！只有他們才解上咱們女人家的困難，選上他們，紡線，識字，衛生都能鬧好呢！」

當主席宣佈開票結果的時候，掌聲不斷地響着。雷印成，非春，李惠生三人獲得最多數票，大家所關心擁護的人當選了。

那個戴老花眼鏡的老漢，更滿意的笑着，他興奮的說：『人選對了。』（摘錄四五年九月二日解放日報海陵的通訊。『人選對了』）

四 人民大眾掌握了政權

再從選舉的結果看，以四一年山東膠東區的統計為例：

	主署級	專署級	縣級	區級	鄉級	平均
工人	一·七	〇·八	一·九	〇·五	一·六	一·四
貧農	四四·三	三〇·六	三二·〇	三五·九	四六·五	三八·九
中農	四五·二	五四·八	五三·五	五四·七	四五·二	五〇·四
富農	八·〇	八·七	一〇·二	八·九	六·七	八·三
地主	〇·八	一·五	二·六			〇·三
其他		三·八	一·八			〇·七

從上面的百分比，可以看出自主署級以至區級的負責人員，貧農僅次於中農佔第二位，在鄉政府一級，貧農則佔首席。

再舉四〇年冀中區七縣的材料為例，雇農、貧農、中農當選為村各委員會主任者佔村各委員會主

任總數的百分之八七·九。當選爲村主席者佔百分之九十·九，當選爲縣議員的佔全縣百分之八十二·一。地主當農當選爲村各委員會主任的佔百分之六·八，村主席佔百分之七·六，當選爲縣議員的佔百分之十七·七，地主當農在農村人口中合計佔百分之九·五，竟佔這樣大的百分數，可見他們對新政權也是非常熱心和佔有相當地位的。

在這種民主政治下，各解放區內，戰時逃亡之地主士紳，都紛紛從敵佔區或國民黨統治區回來了。『陝甘寧邊區僅志丹一縣，在三七年至三九年三年中回來的有六十餘家之多，總計這幾年內回來的約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未經土地革命地區，不但實行了減租減息，也實行了交租交息而他們在敵佔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則受到敵僞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敲榨勒索苛重負擔。因此河北的徐水自施政綱領發佈後，逃亡地主回來者百餘戶，行唐歸來的地主中有擁地達四十頃（四千畝）者，華中的地主也有百分之九十五來歸，他們回來之後，許多都參加了政權工作，或參加了各抗日團體。山西代縣士紳座談會中，由敵佔區歸來的地主說：『過去我不知政府法令，今天我看到施政綱領以後，即使殺頭我也不到敵佔區去了。』從這些事實中，可見解放區的政權是既照顧農民，又照顧地主，既照顧窮人，又照顧富人的。

廣大的工，農，小資產階級，在政權中是佔着優勢與領導的地位，這說明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長期的戰爭中，鍛鍊了最廣大的人民，使他們在繼續不斷的鬥爭中發展了自己。在中共領導下他們

以群眾的力量，從反舊政權官吏的貪污鬥爭，反惡霸鬥爭，反漢奸維持鬥爭，減租減息等鬥爭後，把舊政權翻了個身，他們已從舊社會的被統治被壓迫的地位中解放出來，他們也一樣的做了新社會的主人。在解放後的東北，人民也在中共領導下，從清算報仇，減租減息，分田敵偽土地等運動中，清除了與清除着十四年來奴役人民的敵偽殘餘勢力以及與敵偽結合無限制壓迫剝削人民的封建剝削者，人民掌握了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廣大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甚至自由資產階級要參加政權，掌握政權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制度，兩個不同的天下。

若把「婦女解放是社會解放的標幟」來衡量解放區民主的話，那更顯得清楚。在解放區婦女同樣地參加了各級政權的工作。在陝甘寧邊區及敵後解放區都有婦女當縣長的，太行山還有婦女當專員的（劉亞雄），而且工作成績很好。當區長村長的也不少，各級參議會中也有婦女參議員。就以晉察冀北岳區四分區五個縣的例了來說，就有女縣長一，女縣議員一百四十，女區代表六百三十五，女區長七，女區代表會主席十九。同時，在冀中和晉西北，在抗日政權所在地，婦救會幹部，可以參加行政會議，而且還可以參加陪審，處理與婦女有關的問題。舊社會中婦女比男子多受一重壓迫，參政的權利根本談不上，現在他們也逐漸翻身了。舊觀點認為婦女沒能力，不能任大事，但不知任何人能力都是從實際中革命鬥爭中鍛鍊出來的，足不出三門四戶，被作為奴役的玩物，是絕不會有工作能力的。

四六年陝甘寧邊區三屆參議會開幕時，參議員的成分有工人、農民、資本家、地主、士紳、商人、軍官、士兵、舊軍人、學生、文化人、公務員、店員、退伍軍人、婦女、老太太、前清的拔貢秀才、漢、回、蒙等各民族，共產黨員，國民黨員（真正擁護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員），救國會派等各黨派，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宗教信仰的人士，其中有很多是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他們擠滿一堂，空氣極為融洽，充分表現了各階層人民團結民主的精神。

對於這種在中國千古未有的人民在政治上大翻身的民主選舉，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是怕之像洪水猛獸，痛之若眼中之釘，他們想盡種種辦法企圖進行破壞。在抗戰中間，在國民黨反動的唆使下國特份子常和日寇勾結，告訴日寇某天開會選舉，叫日寇來擾亂，使我們的選舉會開不成，或進行其他的陰謀阻擾如散佈謠言等。可是廣大群眾則是以英勇的行動和國特日寇作鬥爭，來堅決保衛自己的選舉，保衛自己的民主權利。

這些在解放區內的國民黨特務份子反動頑固來伙，除了對民主選舉進行種種破壞以外，有的還表面上假裝開明，收買人心，企圖打入解放區的政權，以便進行更大的反人民的破壞工作。可是人民群眾，特別是在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是不會被欺騙的。即使在某一時候有個別壞份子暫時鑽到人民的政權中去，也會很快的被發覺和清洗出去，人民群眾是知道怎樣來堅決保衛他們自己的政權的。

在解放區除了漢奸特務，及其破壞活動以外，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居住，身體等的充分自由。他們過着真正民主自由的生活。他們有自已的各種群眾組織：建聯會、工會、農會、青建會、婦建會、兒童團、各業公會等，代表本階級本團體群眾的利益而活動，一致堅持與爲發展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國民黨反動派任何妥協投降，任何呼應日寇的反共逆流澈底實現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而鬥爭。

第七節 中共的三三制政策

一 共產黨實行三三政策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

中共在解放區的選舉中實行三三制的政策，規定共產黨員在民選的各級參議會和政府機關中最多只能佔三分之一，超過的要自動退讓，其他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進步人士應佔三分之二，以保證建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各階層人士共同參政的地方性聯合政府。四〇年時毛澤東同志在一篇文章上說：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別的黨派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即統一戰線的政權。共產黨人在敵人後方消滅敵偽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之時，應採取我黨中央會決定的三三制。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佔三

分之一，而使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三分之一。

『不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任何黨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應使其在抗日政權下有存在與活動之權』。

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西北中央局提出在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上說：『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群眾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以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爲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爲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這種三三制政策是共產黨誠意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政策。雖然中國各解放區，都是由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等，領導當地群眾堅持抗戰創立起來的，但共產黨決不想一黨把持這個政權。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他本身決無私利可圖。毛澤東同志曾在陝甘寧邊區二屆參議會演說中指出：『共產黨員有義務與黨外人士合作，而無權利排斥黨外人士。』『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應該向人家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爲是，盛氣凌人，自己是什麼都好，別人是什麼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鴿子架，自吹自唱，稱王稱霸。除了敵人漢奸，以及破壞抗戰與團結的人們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自由的，

即是說錯了也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他本身決無私利可圖，他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同志們！我們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毛主席這一指示，為各解放區所忠實的執行着。

陝甘寧邊區二屆參議會選出的政府委員，有國民黨員，有共產黨員，有救國會派，有少數民族，有地主，有農民等等。在十八個政府委員之中，共產黨員當選的佔了七個，超過了三分之一，徐特立同志當即自動退讓，結果只佔了六個。一個參議會常駐委員，共產黨員只佔三個。邊區政府以下的政權，一九四一年邊區鄉市選舉中，據八個縣（安塞，綏德，吳堡，合水，米脂，鎮原，環縣，新寧）的平均數，共產黨員佔百分之十九·八，國民黨員佔百分之四·九，無黨無派人士佔百分之七十五·三。再如慶陽縣選舉的結果，共產黨員只佔百分之二十八·六，國民黨員只佔百分之四，無黨無派人士佔百分之六十七·四。四二年三月延安縣十六名共產黨參議員辭職，讓與黨外人士補任。中共在邊區的政權中，已經從上到下，從民意機關到政權機關，都徹底的實行了三三制，忠實的執行了自己的政策。同樣的，在河北，在山東，在華中等等所有解放區，也無不時照着這個目標實行着。如晉西北的臨參會，正式議員一百四十九人，在選舉時，共產黨員被選舉了四十九人，超過三分之一者不到

一個人，共產黨員便退二出個人，餘下只有四十七個，還不到三分之一。四四年九月安徽皖中區參議會中，中共區黨委爲貫徹三三制的精神，提出當時任各地縣長及辦事處主任的中共黨員四名退去議席。此議引起全場的熱烈爭辯，許多黨外參議員紛紛發言，以該四人忠實幹練，一致挽留，以收群策群力之效，而中共黨員的參議員，則聲言同意四人退出。激烈爭辯中，充滿民主互讓精神。最後第一屆副議長金稚石先生以黨外人士地位發言謂：貫徹三三制爲中共光明磊落之政策，對於四位參議員的退出雖覺惋惜，但我們本『君子成人以德』的精神，可准予退出，全場遂熱烈鼓掌同意。在通化省輯安縣參議會上也是同樣的情形，共產黨要退出超過三分之一的當選人，黨外人士堅決挽留，經幾次休會，多方勸解始獲應允。

事實上，由於共產黨員抗日的英勇，忠實於人民，處處爲人民謀利益，人民從經驗中也會體會了共產黨是真正代表他們的利益的，因此共產黨員在群眾中有很高的信仰，群眾都樂意與願意選舉共產黨員爲代表，在選舉中當選的共產黨員亦就常常會超過三分之一的數目。但共產黨却並不以此自傲，自滿，爲了堅決執行三三制政策，他們於選舉之前，還幫助其他抗日派及進步人士進行競選，在黨員與民衆中說服解釋，不僅投票選舉共產黨員，而且還要選舉那些進步的國民黨員，開明的地主資本家和其他的非共產黨員。如陝甘寧邊區清澗縣青柳鄉選舉時，當地共產黨的支隊進行對於選舉的討論，說：『由於共產黨員在群眾中有極高的威信，無論如何，不怕黨員佔不到三分之一，而是怕黨員佔

得太多。」他們只得指出「盡可能做到三三制，盡量多提非共產黨人士作候選人，多讓優秀群眾當選。」由於這樣的結果：在五個政府委員中，當選的非黨人士，佔有三名。同時，四個行政村主任，和十二個村長的選舉結果是十六人中共產黨員只佔了五名。（見四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解放日報）這都說明共產黨不僅毫無偏見和私心，而且是誠心誠意爲着團結全體人民，團結各黨各派各階層爲着抗戰建國而努力的。

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不僅在解放區政權中佔着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多數，而且他們中很多人擔任着政權中領導的要職。如晉綏邊區行署主任續範亭，乃是國民黨的元老，晉冀魯豫邊區參議會副議長邢聚棠，前察察邊區行政委員會副主任胡仁奎也是國民黨員，正主任宋邵文是聯盟會員。再如解放後的東北，以安東省的爲例來說，省政府主席高崇民，省參議會正議長陳先舟和副議長之一張樂民，都是國民黨的老黨員，其他的還有很多。只要人民選他們，他們就一樣當選，他們主張堅持抗戰，贊成民主，反對獨裁，取得了人民的擁護。四四年六月十日美國著名新聞記者史諾，在其所寫的六千萬被忘掉了的同盟者一文中也說：「雖然華北共產黨掌握軍權，但它承認其他若干黨派，陝甘寧邊區就有國民黨員官吏，而在晉察察邊區政府中，現任副主席就是國民黨員。」民主同盟救國會派人士亦有參加政府並擔任重要工作的。其他無黨無派的社會各階層人士那就更多，就以陝甘寧邊區來說，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就是個無黨無派的開明士紳。邊區參議會的議長安文欽也是一個無黨無

派的開明士紳。據一九四四年的統計，陝甘寧邊區非共產黨人士擔任邊府副主席、廳長、縣長，科長及鄉長，鄉文書，各級行政幹部者，三千五百九十二人，參加經濟文化建設工作者二千二百一十人，大大超過共產黨員的數目。他們都有職有權，副主席李鼎銘先生即曾多次表明過這一點。抗戰相持階段中，中共的有名的重要政策之一——精兵簡政政策，即是李鼎銘先生首先提出而獲得了中共及各地民主政府的擁護採納和堅決施行的。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到重慶去的時候，陝甘寧邊區政府就由他們當家。中國各少數民族如蒙回……等等在這裏亦同樣獲得平等的參政權利和自治權利，即以解放後東北興安省來說，民主政府省主席特木爾巴根，和省議長博彥滿都是蒙民，中共的這種民主作風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這與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黨部委派，圈定包辦，將非國民黨人士排斥於政權之外，或者對某些非國民黨員還用特務威脅，強迫入黨，或者指派個別的和少數的非國民黨員參加政府或參政會去請客裝樣毫無實權以及對少數民族奴役壓迫的情況是完全相反的。

解放區的各黨派各階層人士對中共的三三制政策，非常滿意。許多士紳和其他黨派的人說：「八路軍開闢了解放區，我們大家都成了主人。」有的說：「這樣民主的管理政權，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如此。」這一有名的毛澤東同志光輝創造的政策保證了解放區各黨派各階層人士的民主合作，造成鞏固的團結，保證了抗戰和新民主主義建設事業的勝利。

爲什麼不僅工農小資產階級堅決擁護共產黨，跟着共產黨走，而且中小地主資本案開明士紳等也

能與共產黨合作呢？因爲在中共的一方面減租減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之下，保障地主，資本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之下，獎勵與扶植私人工商業的發展政策之下，中小地主雖然減少了封建剝削，但還能有保障的收取租子，過着比較優裕的生活，又有轉管工商業和富農生產的出路，並大有發展的前途。工商業資本家則更有順暢發展其工商業的機會。他們還都同樣獲得政治上的參政權利。而在國民黨統治區，則一般的中小地主，雖然也慘重地剝削着農民，但也要受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敲詐勒索，苛重負擔及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的影響，很多小地主還趨於破產。中小資本家則在買辦官僚資本的統制壟斷競爭下，大批的破產，被吞併（詳見本書第二章經濟部份），同時中小資本家在政治上亦是從來沒有過參政權利，而爲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壓迫的，他們也迫切需要民主，因此他們也都認識到只有跟着共產黨走，才有他們的前途與出路。因此這些中小地主資本家開明士紳等就願與共產黨合作，共同參加民主建設事業。

二 共產黨在解放區政權中的領導作用

有的人相信共產黨是堅決爲人民利益的，相信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領導是正確的。但就心共產黨在政權中只佔三分之一的少數，能不能實現其領導。是的，共產黨決不能放棄其對中國人民的領導，因爲這正是其唯一的責任。同樣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中，共產黨也決不放棄其領導的責任，只有在共產

黨的正確領導之下，才能達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的成功。但領導是依靠黨的正確主張和黨員的模範行動，並不是依靠着黨的多數的優勢來把持包辦。因為，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國民黨當權派是代表少數人的利益，他害怕絕大多數人民對他的反對，所以就依靠着一黨包辦來維繫它的統治，而共產黨既然代表着廣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它什麼時候也不會受人民的反對，它不需要依靠黨的多數的優勢來把持包辦。毛主席說：『領導是帶路的意思』，黨的主張合乎各個階級的利益，人民就擁護，就跟着共產黨的主張做去！其次：黨員很積極，忠實爲人民服務，站在一切政治鬥爭的前頭，又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和正確的思想指導，人民也就信仰他，跟着他走。『少數人帶路走前，多數人在後面跟着，從沒有帶路的人要比跟着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強迫人家跟着走，那是押送，不是帶路。共產黨不放棄其帶路的領導，但只有是三三制才能顯得出共產黨的領導。』（謝覺哉同志語）

共產黨的責任是打倒人民的敵人，求得人民的解放。但共產黨是人民中的極少數，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共產黨員現在只有一百多萬。他們深深知道，要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就必須領導廣大人民起來自己解放自己。倘若共產黨員不和多數黨外人士合作，那便不能打倒人民的敵人給人民得到解放。共產黨所以能夠幹出驚天動地的事業，其力量主要在組織和依托於黨外廣大人民。群眾有了共產黨，則意志才能集中，力量才能表現，所以共產黨一切力量要從群眾身上吸取，正像植物的力量須從土中吸取，魚的力量須依靠水一樣。他們也知道共產黨人和黨外人士，在政治上平等的。要使黨外

人士對黨信仰。除自願以外，別無他法。只有使黨外人士親身體驗出黨的意見的正確然後才會以黨的意見爲意見。所以他們尊重黨外人士愛護黨外人士，幫助黨外人士的發展，嚴格實行三三制，反對政權機關中的黨員包辦，以便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有更多的了解和共產黨建立密切的聯系與濃厚的友誼。同時，他們又知道共產黨員是生活在黨外人士的包圍之中，黨外人士的意見和批評對共產黨員本身說來是最寶貴的。共產黨員在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跟黨外人士學習中，才能求得自己的不斷進步。這就是共產黨所以堅持和黨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三三制政策的另一方面根據。

解放區不僅是由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領導人民創造和擴大起來的。並且解放區的抗戰工作和各種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事業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都是在中共的正確綱領，政策和主張的指示領導之下，發動廣大人民的偉大力量和創造性來進行的。因爲共產黨的主張是完全代表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正確主張，人民都擁護共產黨的主張，願意跟着共產黨所指出的方向和道路走去，解放區的建設和中共的領導是分不開的。沒有中共的領導就沒有新民主主義的解放區，也就不會有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第八節 一切爲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爲了人民利益的政府和工作人員

由於解放區的政權是人民大眾所掌握的各革命階級統一戰綫的聯合政權，因此這個政府的各種政策也是統一戰綫的政策。也就是說，既照顧農民，又照顧地主，既照顧工人，又照顧資本家，總之，是照顧各階層人民的利益。在解放區，除了反共反人民危害國家民族的漢奸特務及其破壞活動以外，政府充分保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居住，身體等自由。

誰說老百姓是阿斗，誰說老百姓愚蠢沒有知識，不能辦事，只配讓那些「大人先生」們來統治，事實上群眾力量是無限偉大的。抗戰的經驗充分證明了只有人民的政府，才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爲人民自己辦事。他們不僅能管理政府，而且管理得很好，抗戰中許許多多的政權幹部忠心耿耿的爲人民服務，當人民的勤務員，他們領導與組織人民進行對敵鬥爭，減租減息、生產建設及文化教育等各種工作，使人民生活日益上昇。

新政權的作風是民主的，戰鬥的，廉潔的，是與官僚主義，文牘主義，貪污腐化絕對不相容的。新政權的工作人員是以『民主精神，民主作風，群眾觀點，群眾路綫』，作爲指導自己思想和工作的方法的。他們完全不同於過去站在人民頭上壓迫人民的舊政權的官吏，他們是由人民自己選出來的，是由群眾中來的，他們是密切與群眾聯系着的，他們深刻了解群眾的要求和需要，他們最熟悉群眾的

心理。他們不是站在群眾之上，之外，而是站在群眾之中，和群眾打成一片，作爲群眾的一部份，站在鬥爭的最前列，代表群眾，領導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創造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抗戰中他們堅持村不離村，區不離區，縣不離縣，與當地群眾在一塊同生死，共患難。八年來，不僅沒有一個投敵的較高級的負責幹部，就是區村工作人員亦都是英勇忠貞，雖死不屈堅決和敵人作鬥爭的。例如晉察冀一個村聯會主席女幹部郝秀金，歷年反『掃蕩』，反『蠶食』都是她領導群眾轉移，摧毀偽組織。一次敵人突然佔領了這個村莊，到了黑夜裏，她還領着民兵衝進去，搶出了幾萬斤公糧。他們在殘酷環境與敵人戰鬥周旋中，英勇犧牲的數目倒是很大的。在堅持區村鬥爭中被敵人捕去的也有許多。晉察冀從抗戰開始到一九四二年止，已有三千七八百個區以上的幹部光榮犧牲或被捕了，村級幹部更多。犧牲的幹部中，無一不是可歌可泣的民族好兒女。徐水縣長劉萍同志，當他被敵人包圍後，用槍打死了幾個敵人，最後他要自殺，槍彈已盡，因而被俘。敵寇漢奸先則利誘，繼則加以無法形容的酷刑，劉縣長卻不會有一個字的口供，他憤怒地痛罵敵寇，他絕食十天，光榮殉國。還有像常在敵人出沒的地方，堅持鬥爭，及爲敵人捕獲，嚴刑拷打時對敵不供一字，臨終仍痛罵敵人的平山縣的村幹部古道同志等，這些人民的英雄與烈士是舉不勝舉的，這與國民黨政府內『降將如毛，降官如潮』，或者敵人未到，官吏們早就溜之大吉的情形絕對相反。

再舉陝甘寧邊區的一些例子來說：如靖邊二鄉幹部張玉珍，有一次從縣上回來，終夜失眠，母親

問他，他說：「鄉上工作沒作好，我一滿謀慮誰家有地種得上，誰家沒地種不上。」經過他的不斷努力，終於領導該鄉修成水漫地五百六十七畝，增收細糧四百五十石。安塞五區五鄉，早先曾有匪患，鄉長李承統爲此日夜不安，親自化裝偵察，他回來和鄉上幹部們商量時，他們擔心他的安全，他說：「爲老百姓辦事，怕什麼？」他終於奮不顧身拿獲盜匪五人，肅清了該鄉的匪患。又他想到本鄉辦一個合作社，給老百姓解決穿衣困難。但開始老百姓還不大相信合作社的好處。他就設法先找一個會作生意的鄉民兩人湊了二十萬元，販些布疋到各村出賣一下，就賺了十幾萬元，李承統就以此來進行宣傳說：「無論誰來入股，現在賺的錢就有他的紅分。」於是人民紛紛入股，一下集了百多萬元，合作社就辦成了。再如邊區參議員房文禮老先生，舊社會裏當過擔水的苦力，在他任柳林區副區長的兩年內，曾親身領導群眾築水渠兩道，修成水地一百八十多畝。又領導群眾澈底執行減租法令，使該區的減租工作做得最澈底。在夏雨連綿，河水大漲的時候，他以六十多歲的高齡，還常常脫去衣服渡河，赤着腳去做工作。他的女婿犯了法，他就按法懲辦，並拒絕了群眾的求情。邊區移民英雄赤水縣孟家灣村村長馮雲鵬，積極爲難民解決糧食、密洞、土地、農具、籽種等困難，四一年一共安置了赤手空拳的移難民五百多人，開荒三千畝。使二十里地的無人荒山，變成了人烟繁盛，五穀滿堆的繁榮村莊。以上這樣的例子在各解放區內也都是舉不勝舉的。這些事實難道是平凡的嗎？正是由於他們這種爲人民忠誠服務的精神與偉大的創造性所產生的這些具體而實際的工作，推動群眾，創造着新社會。

爲什麼解放區政權中的工作人員能夠這樣忠心耿耿地爲人民服務呢？這是因爲他們已從舊社會裏被人壓迫，剝削的情況下解放出來，他們成了新社會的主人，他們受到革命的好處，他們認識了真理，因此他們熱愛着新的政權，他們願意拿出個人的一切來爲大衆求幸福，即使犧牲生命，亦毫無所惜，而認爲是無上光榮的。

再從解放區的司法工作來看，也表現了爲人民服務的精神，與新的工作作風。舊社會裏有一句話，『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舊社會裏衙門是維護有錢有勢的人的。打官司就得化錢，看勢面。誰化的錢多，勢面大，官司就能打贏，或者判罪可以減輕，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沒有錢的，雖然有理，也會打輸，並切打輸了還更遭殃。但在解放區，司法工作也是爲人民服務與保護人民利益的。除了對付漢奸破壞份子以外，對於民間糾紛則是以依據雙方自願的原則，儘量化大事爲小事，化小事爲無事的民間調解爲主，審判爲副，以減少人民訴訟到最小限度，使邊區人民能團結親睦，奉公守法。很多案件就在區鄉政府，採用民間調解的方法解決了，祇有重大的或下面未能解決，才提到法院。訴訟手續簡單輕便，不僅不要老百姓耗費錢財，並且還儘量使其減少和避免生產耽誤。有名的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檢察官『馬青天』馬錫五同志的審判方式就是一個典型。他的審判方式，第一是深入調查的。他真正做到了『切實照顧邊區人民的實際生活，切實調查研究案情的具體情況，分別其是非輕重。』第二，是在堅持原則，堅決執行政府法令，又照顧羣衆生活習慣及維護其基本利

益的前提下，合理調解的，是善於經過群眾中有威信的人物進行解釋說服的，是爲群眾又依靠群眾的，所謂「三個農民老，頂一個地方官。」他真正做到了「依雙方自願爲原則的民間調解。」第三，他的訴訟手續尤簡單輕便的，審判方法只座談式而不是坐堂式的，不敷衍，不拖延，早晨，晚上，山頭，河邊，群眾隨時隨地都可要求談話，告狀。因此，他是真正「民間」的，而不是「衙門」的，真正替人民服務而不是替人民製造麻煩的。一句話，這種審判方式是充分貫徹着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

我們舉一個具體的判例來看：

「華池縣溫台區四鄉封家園子居民封彥貴，有女兒名叫捧兒，民國十七年許與張金才次子張柏兒爲妻，尙未過門。三一年五月，封彥貴見女兒既已長大，而現時聘禮又復大增，遂企圖賴婚。一面教唆捧兒以「婚姻自主」爲藉口要求與張家解除婚約，一面却以法幣二千四百元，硬幣四十八元暗中許與城壕川張憲芝之子爲妻。被張金才得悉告發，經華池縣府判決撤消後一次之婚約。三二年二月捧兒赴鍾聚寶家吃喜酒遇張柏兒亦到，由第三人介紹，雖未當面談話，捧兒已表示願與結婚。但同年三月，封彥貴復以法幣八十元，硬幣二十元，嘩囂四疋另許慶陽朱壽昌爲妻，張金才得悉後，即糾集張金貴等二十人，携棍棒爲武器，於三月十三日深夜闖入封彥貴家，封姓驚恐四散，遂將捧兒搶回成婚，封彥貴控告到縣，經判決：張金才徒刑六個月，張柏兒封捧兒婚姻無效。當時封張兩造均不同

意，附近群眾亦感不滿。適值馬錫五同志赴華池巡視工作，經上訴前來，受理後，首先詳詢當地區鄉幹部，了解了實際情況，其次又問了附近許多群眾，了解了一般輿論趨向，下來就派平日與封捧兒接近的人去與談話，再親自切實徵求她的意見，了解了她是不願與朱姓結婚，她說：「死也要與張柏兒結婚的」。全部真相既明，於是協同華池縣上同志舉行群眾性的公開審理，將與此案有關的人一併集合起來，審明，封姓屢賣女兒；張姓以張金才爲首，張金貴爲次，糾衆搶親屬實。以後復徵詢封捧兒對婚事意見，與前無異。最後徵詢到場群眾對全案意見，一致認爲：「封姓屢賣女兒，搗亂咱政府婚姻法，應受處罰。張家黑夜搶親，既傷風化，並礙治安，使四鄰害怕，以爲盜賊臨門，也應處罰。否則，以後大家仿效起來，還成什麼世界」。群眾特別關心的，就是張柏兒，封捧兒兩人的婚姻問題，認爲一對少年夫婦，沒有問題，不能給拆散。至此，一切都弄明白了，於是判決：張柏兒與封捧兒雙方同意結婚，按婚姻自主原則，其婚姻准予有效，但不論新式舊式，均應採取合法手續，黑夜糾衆實行搶親，對地方治安及社會秩序妨礙極大，因之科處張金才，張金貴等以徒刑；其他附和者給與嚴厲之批評，封彥貴以女兒爲貨物，反復出賣，科苦役以示儆戒。群眾聽到這一判決後，十分高興，認爲入情人理，非常恰當。各當事人聽到這一判決後，受罰者也表示自己罪有應得，勝利者（如張柏兒封捧兒）更是皆大歡喜。尤其重要的，是因此用最生動的實例當場教育了群眾，教育了工作人員。

（見四四年三月十三日解放日報）

除了罪大惡極和絕對堅決不願改悔的漢奸特務以外，解放區對於一般的罪犯都採取寬大政策，感化教育的方法，以爭取其轉變和改造成爲良好的公民，因爲這些人民之所以犯罪，基本上是由於舊社會制度所造成，如果在平等合理的社會裏，人人都有吃有穿，都能受到真正良好的教育，那還有誰會犯罪呢？革命不僅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並且還從思想上改造人類，也改造那些犯了罪的人民。我們從陝甘寧邊區監獄典獄長黨鴻魁的工作中就可以見到這樣的事實。下面是對他的工作的一篇記述：

『對犯人絕對不能打罵受刑，和施用嚴格的處罰，要從思想上教育他們。』

在工作中黨鴻魁同志不但隨時記住了上級的這個指示，並且具體的執行了寬大政策。

『咱們邊區的監獄，就是學校。』他常笑着對別人說。『犯人的生活、學習、娛樂，各方面的享受是和我們工作同志一模一樣的，物質待遇有時還較多些。『刑期』，只不過是一個學習和改造的過程。在這期間，讓犯人們學會各種生產技能，認識共產黨和民主政府救世救人的政策。』

監獄沒有鐵窗鐵鎖，更沒有日夜守望的獄卒。很少幾個警衛和看守的同志，是和犯人們一齊出現在飯堂、俱樂部、球場，和一切生產崗位上。犯人的住室，終日照耀着太陽。早晚從裏面傳出一片開曠愉快的樂器聲和歌唱。犯人們自由的呼吸着遼闊豐茂的山林的空氣。

黨鴻魁同志和犯人們生活在一起，他一到監獄裏，很快就和犯人們打成一片。全獄一百一十九個

犯人，才只有三個行政工作同志。他啓發犯人的自動性，組織他們自己管理自己，幫助他們成立小組和俱樂部，分設伙食、衛生、文化、生產四個部門，民主選舉幹事，克服了犯人一向互相輕視和自暴自棄的觀念。

由於他的深入和細膩的領導，一年當中，沒有一件逃跑的事情發生。剎那間心頭上湧現想逃跑的念頭的犯人，會自己來向黨鴻魁同志反省說：『典獄長，我是不會逃跑的。今天想起我那七十多歲的老父親，心裏動了一下念頭。』

黨鴻魁同志立刻懇切的對他說：『人誰還不想家呢，你只要好好守法，澈底改過，將來決心做一個好公民，不久就可以回家了。』

有一個犯竊盜罪的人，在獄裏還時常犯他的老毛病，比較頑強難改造。犯人們自動的用繩子把他綁起來，要吊打他。黨鴻魁同志却婉言平服了衆人的激憤，開門爭會，採取集體教育和個別說服的方式。最後，這個犯人不但承認了錯誤，發誓改正，而且在以後行動上成了積極份子，影響了別的犯人。

黨鴻魁同志能和犯人同坐同睡，同說同笑。犯人們有什麼意見都對他談出來。他替犯人們讀報、教字、寫家信，當他發現有精神不好的犯人，立刻慰問是不是生病，難過，並交代飲食委員開病號飯，或者勸搬到病室裏去休養。

一天，警衛員帶着一個臉色蒼白的中年婦人，背上揹着一個吃奶的娃娃，到黨鴻魁同志屋裏來，這女人像失神一樣，進門就跪在地下叩頭，嗚咽的企求着說：『大慈大悲的大老爺，開恩讓我見見我男人吧！』

黨鴻魁同志立刻把她扶在椅子上，查明她是一個新犯人的老婆，不但讓他們會面，並像招待所有幹部的家屬一樣，給他們開飯，借被褥，住在招待室裏。三天以後，這個新犯人對黨鴻魁同志說：『我的好獄長呵，給我想辦法吧，婆姨在家沒法生活呀！一個婦道人家，還帶個娃娃。』

黨鴻魁就答應他把婆姨留下來，將她安排在已有的犯人家屬中間。忙着給她借鍋碗瓢杓，借米借錢。現在，監獄裏有八家家屬，九個小孩子。黨鴻魁組織他們紡織，他們已經都能生產自給，過着豐衣足食的生活。

刑期滿了該出獄的犯人，有的自動向黨鴻魁要求：『就叫我在新村住下吧！這就是我的家嚨，我還到那裏去呢？』

廟溝新村一共有八家人，其中七家都是犯人組織的家庭。

獄裏面只有兩個女犯人，其中一個帶了九歲的孩子，黨鴻魁就送這個孩子到小學去讀書。女犯人受了極大的感動，常說：『一輩子也沒有想到，人犯了罪，孩子還能上學，天下那有這樣好事！我再不好好務正生產真該死。』

犯人們在生產中鍛鍊了勞動觀念，學會了各種生產技術。生產所得除了改善犯人們的生活以外，還用公私兼顧，分紅的辦法，提高犯人生產情緒。有的把錢寄回家去。一個轉變了的犯人說：『從前我吃洋烟，身上連四兩力氣也沒有，沒想到犯了罪坐了監，學會了務莊稼，活着也有勁了。』

這些犯人在黨鴻魁的領導和教育下，最少的也已認識了二百多字，有的認了一千字以上。他們的政治和思想，有着更大的進步。都向勞動者原來的好品質轉變。今年還產生了六個勞動英雄。釋放出來後，他們就都成爲參加新社會建設的好公民。（見四五年一月一日解放日報）如犯人李樹明在入獄前目不識丁，處刑三年中已能識字寫字。現爲高等法院安塞農場主任，工作非常積極負責。塔斯社記者加爾門於一九三九年來延安參觀監獄後說：『延安的監獄不像監獄，這是個勞動公社，在這裏有許多過去的罪犯，被改造成爲自覺的公民，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一個細膩而堅忍的工作，這是要在人的本質上，在一些受改造的人們底心理上，下很大的工夫。這些人們在這裏不是「受處罰」，而是被教育以如何忠誠的生活和勞動。』世界學聯代表傅路德也說：『邊區的司法系統中充滿着平等與正義的精神……在許多方面看來，在對犯人合理待遇的問題上，它是全世界的一個模範』。

這種對犯罪的人民採取感化教育的辦法，也只有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才有可能做到。在舊社會，因爲政府和監獄是壓迫人民統治人民的工具，因此也就不可能採取這種感化教育的辦法，而是採用苦刑和打罵。

再如徵收公糧的工作，在尚未施行統一累進稅的地區，採取民主的評議方法，每年當上面經過仔細研究分配給各村的一定數額下來後，就由當地村幹部和全體村民開會討論，根據各家的收入和經濟情況，窮的少出，富的多出，一家一家的提出來，出多出少，由大家再三評議決定。由於這樣的發揚民主，所以能做到公平合理，這種民主精神的運用，是中國歷史上的創造。

總之，從以上許多事實看來，解放區政權工作和工作人員，是真正貫徹着『民主精神、民主作風、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他們一切爲着人民，他們是人民的忠實勤務員。

二 艱苦樸素的作風與廉潔政治

解放區的政權幹部因爲都是群眾中被選舉出來的最優秀的份子，他們具有高度的爲人民服務的精神，所以他們能吃苦耐勞，不貪污，不腐化；他們的生活與工作都非常艱苦樸素，如徐水縣長劉萍同志，常穿着老百姓式的衣服，一件破棉襖就穿了好幾年。他對同志們說：『省一點是一點，別看我的棉襖破，還是件寶衣服呢，夜晚大襟當被子，底襟當褥子，將袖子一折當枕頭，夜裏行軍當大墊！』一個老漢說：『我活了七十多歲了，沒有見得這麼好的縣官，真是自古稀少的清官。』

再如在敵後指揮作戰的八路軍彭副總司令，在最困難的戰爭與災荒情況下，爲了救濟太行山一帶的災民，雖然身患胃病，也和士兵一起以野菜充饑，並連個人僅供零用的稿費也捐了出來。在解放

區，再大的官，也都是『兩袖清風』這和國民黨政府官吏之搜括民脂民膏，發財自肥的情形完全不同。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奇蹟。

近年在殘酷，嚴重的抗日戰爭中，政府爲了減輕人民負擔，達到豐衣足食的目標，政權幹部亦和軍隊一樣抽出一部份時間參加生產，如陝甘寧邊區各級政府人員，上自林主席，下至鄉長，文書，沒有一個不親自動手參加生產。四三年陝甘寧邊區機關學校自給比例由百分之二十六直到百分之七十大。在生產過程中，像延長焦縣長那樣的動人故事，曾是不勝枚舉的：焦縣長親自參加擔糞，翻地，鋤草，收割。麥收時，不但白天割了一天，晚間收工時還要挑着一擔回去，無怪老百姓說：『自古以來沒見過縣長擔糞，今天縣長也擔起來了。我們必須加倍生產才對。』（見四四年二月八日解放日報，林主席：『一年來邊區政府工作總結』）

再如領導全團解放區軍隊的朱總司令，他領導全軍進行作戰，生產與訓練，工作的繁忙，是可以想像到的，如批閱文件，考慮問題，各科會議及會客等使得他一天到晚很少有空閑的時間，兼之他年近六十，因此部隊中，機關中，老百姓中，集體的，個人的，紛紛來信懇求替他代耕，以使他能爲人民爲革命保重身體。在生產的時期內稍爲休息一下。但總司令總是婉言的謝絕，他說他生產的任務自己可以完成，生產雖然要花費勞動力，也是一件最快樂的事，這對整個革命，對他自己的身體都有好處。他和他的勤務員種了三畝菜地，每天清早和晚飯後，人們便經常看到他在菜園裏勞動着。他的這

種模範作用，感動了所有的人們，成了推動生產運動建立革命家務的一個巨大的力量。這個力量鼓舞着大家去創造一切革命事業的奇蹟。（見四四年五月三日解放日報：『朱總司令在生產中』）

雖然他們都具有艱苦樸素的精神，不怕吃苦耐勞，但政府對他們的物質生活則是加以一定的保障的。使他們個人和家庭的生活安定，能一心一意爲人民辦事，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中還明文規定了『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爲，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爲，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同時實行依以養廉原則，保障一切公務人員及其家屬必需的物質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娛樂生活。』如陝甘寧邊區的一般公務人員，以四四年爲例，單就衣食兩項實物供給標準，平均爲小米六石以上（十六兩秤，三百斤爲一石），其他如辦公、文娛、書報、醫藥等費，概由公家供給，病員、產婦、嬰孩等更有特殊待遇，公務人員家庭有土地而無勞動力者，爲之代耕，全無產業者，幫助其家屬從事生產或給以適當工作，其子女的撫養教育費用，也由公家供給。（見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邊區林主席的報告：『邊區民主政治的新階段』）由於政府保障了他們個人和家庭的生活，他們也就更能全心全意的爲人民辦事。

三 虛心接受意見和自我批評的精神

雖然他們都具有高度的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他們給群眾辦了許多好事，然而在他們的工作中也不

是沒有一點缺點的，一部份幹部中，還發生有某些錯誤。但他們能在群眾面前虛心接受意見和批評，檢討自己，不怕公開承認錯誤，並在行動中堅決改正，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正是他們力求進步，真正忠誠為群眾服務的表现。由於這種不斷的自我批評，使得他們自己和政府工作都有不斷的進步。現在舉淳耀三區區長高學文同志的自我反省和他在群眾中公開承認錯誤的例子如下：

「我在工作中對於有錯誤的群眾，不能耐心說服時常開口罵人，動手打人。這種毛病，從土地革命時就常犯哩。今年到三區工作。孟憲章在選葬時把徐向財的馬跌死了，不願意賠，本來應該用教育調解的辦法，只要兩家情願就對了，但我却用皮帶打了孟憲章，這些錯誤給群眾一種很壞的印象，對工作妨害很大，群眾當面就對着我說：「你的脾氣賭的很，」其實這不光脾氣賭，主要的還是思想賭，我沒有從愛護群眾的立場出發，忘記了自己從土地革命幹到現在，究竟是爲了誰？還都不是爲了群眾嗎？我過去還想：好人不該打，還能不打壞人嗎？因此就用打罵代替了教育，這種思想是非常錯誤的。今年張德生同志到淳耀檢查工作時曾經嚴厲的批評了我。跟着關中報二四一期也登出來了，我把這條消息一連看了三四遍，起初我很難過，但是經過這種教育，我開始從思想上開通了，我暗地裡怨恨自己，和自己這樣脫離了群眾的思想行爲作鬥爭。最近我按張德生同志的指示，去向打過的五個人賠了罪。在一鄉狀元溝給孟憲章賠罪時，他還不理我，但我下了決心，紅着臉皮，耐心的給他賠不是，以後他終於開口，表示沒啥意見，已經過去的事，就算了，當時天下雨他怕把我滑倒了，還送

給我一根棍叫拿上。南蘆村的赫宣亮，過去，永沒讓我吃過飯，這次我向他賠了罪，他非留我吃一頓飯不可。最近有許多幹部和群眾都對我說：「你現在脾氣好了，再不像從前那樣：見了你就害怕。」我親身感覺到：公開在群眾面前承認錯誤，對我們沒有一點損失，還會加強我們同群眾的聯系。我以後要好好改造思想，絕不打罵人，希望三區群眾監督我幫助我進步。」（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解放日報：我要克服打罵群眾的毛病）。

四 人民擁護自己的代表擁護共產黨

很自然的，人民對於這樣地代表他們利益的解放區政權和工作人員也就非常擁護。例如在晉察冀的定縣，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天某村突然被敵人包圍，所有群眾都被趕到廣場上，敵人拉出一個青年問誰是區長，回答「不知道」，頭顱被砍掉了，又拉出一個婦女問誰是區長，回答仍是「不知道」，刺刀穿透了胸膛，再拉出一個兒童，也是回答「不知道」，屍首分開了，敵人正同樣刺殺一個老者時，突有一人跑出來說：「我是區長」，同時在群眾中也騷動起「我是區長」「我是區長」的聲浪，敵人殘忍而恐懼地把區長拖走了。當夜群眾攻入據點，又將區長救出，他淚流滿面的說：「民主保障了我。在敵後解放區政府工作人員，如果不能像這樣得到群眾擁護，是不可能存在的。」（見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解放日報）。

近年無論在前線和後方都有大批的最優秀的工作幹部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被公選爲光榮的模範工作者。解放區這種真正代表人民，爲人民服務的民主政治是和共產黨的領導分不開的，因此人民不僅擁護新政權和自己的工作人員，並且熱烈擁護共產黨。解放區的人民說：『過去地主剝削，沒吃沒喝現在減租減息，發展生產，人民豐衣足食，還有餘糧。保障人權，地權，財權，人人都自由平等，能向上發展。八路軍生產作戰，救國救民，頑固軍一打二罵三要錢，專打老百姓，害中國人。我是無黨無派的人，敢這樣說：『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人民底父母，對人民又怕你凍着。又怕你餓着。自己的父母有時都作不到。兒子要出門，父母就不易照顧，共產黨可是到那裏，都關心老百姓。國民黨只知道往腰裏裝錢，刮地皮，修高樓大廈，那管咱黎民疾苦……』（四四年十二月陝甘寧邊區參議會

上房文禮先生語

尤其動人的，四三年十二月陝甘寧邊區開勞動英雄大會時，在一個座談會上，老英雄孫萬福，站起來走近毛主席，用兩隻手緊緊的抱着毛主席的肩膀，他的沾着口沫的鬚鬚，因興奮而有些顫動，他說：『大翻身啊！有了吃了穿了，賬也還了，地也贖了，牛羊也有了，這都是你給的，沒有你，我們這些窮漢爬在地下一輩子也站不起來！』他的話語裏充分流露着對舊的黑暗勢力的憎恨，更充分流露着勞動人民的解放後幸福與驕傲和對共產黨及民主政府的衷心擁護。

五 解放區的建設主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自己的鬥爭

解放區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根據人民的意志，給人民辦事的政府。政府裡的幹部是人民選出的代表，從人民中產生出來，其本身也是人民中的一部份。這種人民自己的政府和屬於人民中一部份的人民自己的代表，組織人民領導人民，管理着人民自己的事情，創造着偉大的翻天覆地的業績，改變了社會的面貌。

雖然上面說過，這些政府裏的工作人員是怎樣地代表人民利益，忠心耿耿地爲人民服務，他們創造出許多英雄模範與可歌可泣的實例。他們組織與領導人民進行鬥爭，他們給人民辦了許多好事這是值得頌揚的事實。這種組織領導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解放區，新社會這種翻天覆地的業績的創造，主要還是依靠其他更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力量，政府和幹部也不過是被他們選舉委託出來，聽承與集中他們的意志辦事的，沒有廣大人民的自覺與動員改來，組織起來，那就什麼也幹不成，沒有共產黨及其千百萬的優秀的忠實爲人民服務的幹部領導帶頭，那同樣什麼偉大的事業也不可能創造出來。因爲廣大的人民，打仗的是他們，生產建設的是他們，參加民主政治的是他們，幹其他一切革命工作的都是他們。

在解放區的抗戰和建設工作中，群眾在中共及民主政府的領導下，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組織起

來，成立了工、農、青、婦、抗聯（現改建聯）等各種群眾團體，代表其本階級本團體群眾和全體人民的利益而活動。他們以自身的偉大力量，造成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向壓迫他們剝削他們的舊勢力作鬥爭。如在反惡霸、反舊政權、反『維持』鬥爭，減租減息增資鬥爭，大規模群眾性的對敵武裝鬥爭，廣土民兵，自衛軍的游擊戰地雷戰，踴躍參加軍隊，保衛人民利益，大規模的生產建設運動，群眾性的文化教育事業，以及在解放後東北各地的清算復仇，減租減息，分配敵偽土地，改造政權，武裝自衛，清除土匪特務，打擊反動派的進攻中，都是人民群眾自己起來為自己的解放作鬥爭，形成爲千百萬人轟轟烈烈的鬥爭洪流，發揮了偉大的力量和無窮的創造性。這些千百萬人民群眾已像巨人一樣地站了起來，粉碎各種黑暗的舊勢力，推動歷史的車輪前進。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限偉大和不可戰勝的。這種改造舊社會創造新社會的艱巨任務，決不是由少數英雄豪傑的恩賜或代替群眾自己的鬥爭所得到的，而是由群眾自己的鬥爭所創造的。人民群眾就是歷史的創造者。

六 解放區人民創造出光明幸福的新社會。

中國歷史上作爲美妙理想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這句話，在解放區却以成爲平凡的事實了，我們且從外來參觀者的觀感中來看，美國新聞記者史諾，從延安回去後，在文章中寫道：『這裏已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而且設立了四個專科學院，有一個公共衛生處，好幾個醫院和許多工業合作社，

農民已新開了六十萬英畝荒地。『這個區域，吸收了十餘萬難民，成千成萬的青年，步行數百哩到延安去學習。鴉片煙已經禁絕。娼妓和兒軍奴役有效地被禁止了。沒有一個乞丐。』流子被改造參加工作。』（見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美國『禮拜六晚報』週刊。史諾：『六千萬被忘掉了的同盟者』。）

四四年中外記者團來延安參觀回去後，中國記者趙超構先生寫了一本『延安一月』中間寫着：『談到治安，這真像是一首傳奇的童話詩，整個延安的城市裏只有四個警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裏，這真是神話，可是它偏偏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想在一個大家都有飯吃的社會裏，治安這名辭，也近乎多餘。』黃炎培先生在延安歸來中也寫道：『街道是整潔的……卻沒有看到茶館。沒有看到一個遊手閒蕩的人。男女都氣色紅潤，尤其是女子……。在街上絕對沒有看見過一個面帶烟容而頹唐的人。』是呀，這種新民主主義政治已給人民帶來了如此的幸福，這裏已現出了一幅光明燦爛的新中國的圖畫，而那更美妙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遠景已在前面向着我們招手，我們堅決勇敢地破除萬難地向着這個方向前進吧！

空白页

第二章 經濟

國民黨統治區

第一節 帝國主義對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侵略

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經濟上受到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兩大剝削。我們先看帝國主義是怎樣地從經濟上侵略中國人民呢？全國重要的工礦業及交通事業，如重工業、鑛山、鐵道、輪船、電力等大部份爲佔優勢的外國資本所控制。帝國主義輸出資本到中國，除了借款取息並取得管理權的方式外，還大量的投資於輕重工業，直接利用中國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剝削中國人民。抗戰以前有人估計：全國鐵的生產百分之九十五，煤的生產百分之六十五，電力生產的百分之七十，石油生產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握在英、美、日、法、德等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手裡（上海『新中華』雜誌，一卷二十期中國基本工業與帝國主義）。鐵路大部份是借外資或與外資合辦的，據抗戰初期發表的統計：國內各路所負債務十二萬萬元中，外債佔十分之九（『見抗戰中的中國經濟』二

七四頁)。又據抗戰前的統計：對外航運中，華輪只佔百分之七·九，內河航運中，華輪也僅佔三分之一稍強（見『抗戰中的中國經濟』二一七三頁）。民用航空事業現在全爲美國所掌握。這些交通事業他們除了盈利以外，還得到運輸商品到中國各地和購買原料的便利，輕工業方面也同樣表現出外資喧賓奪主的趨向，抗戰前特別以紡織業爲最甚，據一九三六年統計，在全國紗廠總數中外資佔百分之四十七，在線錠總數中外資佔百分之七十一，在布疋總數中外資佔百分之六十五，特別令人注目的是在布疋總產額中，外資佔百分之七十一，中國第一號的工業——棉紡織業就不能不經常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每一個廠家都時時感受到破滅或被吞併的威脅。外資除了在紡織業中佔有重要地位外，其次就要算捲烟業了。抗戰前據國民黨政府實業部調查，全國捲烟銷數達一百五十萬箱，其中，華商烟廠所供給者僅佔四分之一，洋商在華烟廠所供給者佔二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一則爲烟來品，外商資本雄厚，『英美烟草公司』在實際上就是中國烟草業中的霸王，以英美爲首的幾家外商烟草公司的資產，僅上海一地，已達四萬萬元以上，至于華商烟廠如上海號稱規模較大之六十家，全部資產僅七千七百萬元（當前大移方的工業，王子野，四三年五月解放日報）。在這種優勢的外資的控制排擠上，中國民族工業自然就沒有出路，日益走向沒落破產和被吞併的道路。

帝國主義還在中國設立銀行，發行鈔票，進行公債，商業，地產等高利貸及投機事業，以他們雄厚的資本，操縱着中國的金融事業，中國的各大銀行對他們也有依賴性，往往借他們的資本來共同進

行剝削，這一方面他們每年也從中國人民身上剝削去不少的錢。

除了資本輸入中國以外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到中國來傾銷商品與獲取中國的原料，作不等價的交換，掠奪和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還使中國經濟依賴和某種程度下附屬於他們。就連中國的重工業來說，實際上也只是原料的工業，中國的鋼鐵事業，可以說近于沒有，帝國主義把極大部分在其掌握下的中國的鐵砂運到外國，再把中國需要鋼鐵及由鋼鐵製成的貨品，輸入中國來了。『見「新經濟」一卷八期』。帝國主義從他們的走狗和代理人中國當權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手中獲得了關稅權利，現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即為美國人李度，不僅沒有像其他獨立國家那樣保護本國工業的關稅壁壘，而且實際享受到輕稅的優待，近年雖也廢除了關稅的不平等條約，名義上得到了關稅自主，但也和其他不平等條約內容的廢除一樣，實質上並沒有獲取基本改變（從全部不平等條約內容說來，有些地方現在實際上却比沒有廢除前更厲害了，此外還有前所未有的新的不平等條約的訂立，新的主權的喪失）。如果說帝國主義過去對付滿清政府，或其他非以該帝國主義為後台的封建地方軍閥，尚需用政治軍事壓力，強迫訂定不平等條約，來欺凌中國人民，剝削中國人民的話；則現在由于和他利益密切相關的忠實奴隸蔣介石政府，則即使沒有條約上的限定，也可以很順當的獲得各種特權，並且甚至獲得更多一些。由于這種實際上存在的關稅特權，海關大權操在美國稅務司之手，外貨尤其是現在佔最大比重的美國貨就毫無阻礙的傾銷和泛濫到中國市場上來，幼小脆弱並受到官僚資本的統制壟斷與苛捐雜稅重

壓下的民族工業和手工業便被競爭倒了。以抗戰前數十年的情況來說，中國每年就有幾萬萬銀元的人入，亦就是說每年要有幾萬萬銀元流到外國資本家的腰包裏去，中國廣大人當然就越來越窮了。帝國主義從中國的通商都市直至窮鄉僻野，造成了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爲他們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以便利其剝削廣大的中國人民。

抗戰前期，因爲中國沿海一帶的城市淪于敵手，對外交通線大部分被封鎖，各帝國主義對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控制和剝削也曾不得不比較減弱一些；但在後期，美帝國主義的商品則又大量的從陸運空運運輸入中國，並輸入資本、器材和技術人員，前來『開發資源』，這又加緊了對中國人民的經濟掠奪，抗戰中由于國民黨官僚資本壟斷統制摧殘的結果，民族工業紛紛關廠停工，造成生產的極度萎縮，也就給外貨傾銷中國以更有利的機會，而外貨傾銷中，中國的買辦官僚資本也依靠他們的主子從中取利，剝削中國人民，大發洋財，當然民族工業則更遭到厄運了。抗戰勝利後，大量生產力下的美國貨物山傾海倒似的到中國市場來找出路，在中國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媚外政策之下，美國貨充斥于各地，民族工業和手工業更迅速的破產了，人民遭受帝國主義的剝削更重了。

據四六年六月九日新華社江蘇如皋電，『最近又有大批美貨運至上海，單美棉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四月，已運達六十五萬擔。據悉，全部美貨的起運須動員全上海起重機搬三個月以上；舉凡吃穿、日用品、醫藥用品等，以及最新式的美式洋服，應有盡有。由于國民黨當局買辦官僚集團無限制的鼓

勵外貨進口，美貨來華祇報百分之二十的稅，成本遠較中國產品低廉，能有二倍至十倍的利潤可圖。中國一般棉花，上等須十萬元法幣一擔，而美國上等棉祇須九百圓法幣一擔，美紗美布也是如此，能以低價運華銷售獲利數倍，一桶美國牛奶粉二千圓可吃一個月，中國牛奶竟須一萬元至兩萬元。因此游資泛濫，市場競相推銷美貨，助長買辦資本的成長。中國產品在市場上因受大批外貨及官僚資本的排擠，無法推銷。」

又新華社延安六月十七日電：『進口洋貨日益佔壓倒優勢。據上月間國民黨區報紙所載，海關公佈今年一月份入超達三十萬萬元，二月份入超增至一百一十八萬萬元，入口爲出口之四，六倍。三月份入超更增加，入口竟爲出口之十倍。以入超言，三月份即達一月份之九倍。』又新華社南京六月二十四日電：『據上海海關統計，四月份進口貨計八百餘萬萬元，出口貨爲四十一萬萬元，進口又較三月份大增。出口却較三月份減少了四萬萬元，入口竟爲出口之二十倍。以入超言，四月份又爲三月份之三倍，四月份入口之美國貨合計美金三千八百七十萬元。（絕大部份爲入超）但民國二十五年每月平均入超不過美金五百七十五萬元，相差達七倍之多。四月份入口貨中，奢侈品佔百分之六十，其餘大部分爲美棉，而自美國遠涉重洋運來的花旗橘果竟達四萬萬元的鉅款，至于建設器材則簡直等于零。』可見美貨輸入和入超正在繼續不斷的迅速增加之中。

六月間，國民黨當局又許外船在南京、蕪湖、九江、漢口，航行卸貨，外人在中國獲得內河航運

權的特權，更給外國公司林立於中國，外貨更加充斥於國內以市場以便利了。

再看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在本年三月開國參會上的報告中說：「衣的方面，政府最近已向美國進出口銀行貸款五萬六千二百萬元，貸款以供購棉之用，同時，又向美國購買大量布疋；食的面，蔣廷黻署長及糧食部代表赴美，即在爭取增加救濟；住的方面，政府已向美商購買已製成的房屋一萬座來華，並向加拿大等地購買大批材料；行的方面也向各國訂購各式船舶。」由此可見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經濟情況已至山窮水盡之境，由于反動派在抗戰勝利之後，發動內戰，更增加國庫大黨支出，使人民遭受無限痛苦，以至衣食住行均告缺乏。而國民黨當局唯一辦法即是向美國要求連房子都要從美國搬來。但美國自然不能白拿的，將來還不是中國老百姓倒霉，至于買辦大資產階級則又可從中發一筆洋財。

至于歷年來美國給國民黨政府的巨大借款及軍火租借，即以本年來說，已商定了二十萬萬美金的巨借款，交付的已有五萬萬美元，還有支持蔣介石內戰的延長至四七年一月的軍火租借，在過去抗戰中的還有很多（當時國民黨主要也是拿來用于反共反人民的），這些也都不是白給的，也要交付巨額的利息，將來也要還本，這也還不要出在中國老百姓的身上。這筆債務是用于反人民却又重重的壓着中國人民，至于這些借款中還附有什麼秘密條件，則現在尚是一個謎。

工礦交通各業的美國投資也更源源而來，國民黨政府在毫無民族立場媚外奴才政策下，宣佈了

「除軍器外（其實軍器主要也是向外國買來的），其他工礦事業皆可容納外資合作。」更重要的是承認外資在華取得某種特權（「除少數事業經中國政府因中國國際需要而特別允許者外，所有外資不得有華資所無之特權」。以上號內引自四五年三月國民黨六次大會的通過的「工業建設綱領」）又宣佈在中國合資公司中，「總經理得爲外人」，「半數以上的董事，常務董事與董事長，須在國內有住所者」。（即沒有國籍的限制，只要在中國有住所就行了，其他半數以下的董事就連在中國沒有住所的外人也可充任。以上引自四五年六月國民黨政府最高國防委員會令所通過的修正「公司法」原則）。這樣一來外國帝國主義，最主要的是美國，更將大量的輸出資本來華，直接掌握操縱各種企業，使中國經濟更加深半殖民地性的深度。如本年四月間，美國三個紡織巨頭，正在與中國大買辦們計劃在華「合作」開辦壟斷性，大規模紡織廠，（見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東北日報）這個計劃的實現，將扼斷中國民族紡織業最後的殘喘。佔中國工廠數五分之一，資本數三分之一，工人數五分之一的棉紡織業，面臨空前嚴重的危機。數年以來，中國人民的衣服已不能自給，而今後則將完全依賴於美國，這一民族經濟命脈，將由國民黨官僚買辦集團斷送。這種帝國主義與中國買辦官僚集團互助勾結，壟斷中國各種企業的計劃，正在進一步實現着，中國的半殖民地性正在加深着。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抗戰，解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却又受着美帝國主義的慘重的並且益加深的奴役和剝削。

第二節 官僚資本的壟斷統治結合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絞殺

着民族工業

中國的大官僚資本集團，即是國民黨統治集團，也就是大地主、大買辦、大銀行家集團。這種大買辦，大銀行家是靠着外國的獨佔資本家起家的，專替外國人在中國廉價收買原料又高價出賣商品，經營投資借款的事業。自己從中賺了錢，發了財，就成了大買辦，大銀行家。在外國主子的支持下，再和大地主，軍閥，官僚，流氓，劣紳一勾搭，而躍上了外國帝國主義的奴隸總管的位置。於是這個集團更仗其政治上的壟斷地位，出現為壟斷性的官僚資本的面貌。他們在經濟上掌握着壟斷性的金融資本，和壟斷獨佔性的官營大企業。

一 官營金融資本的壟斷性、買辦性、投機性和高利貸性

這種大官僚金融資本主要以中、中、交、農即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大國家銀行為代表。除中央銀行全為官股外，其他三個都是官商合辦的，所謂商股實際上也為大官僚大資本家所掌握。這些銀行的支配大權都握在大官僚之手。中央銀行為孔祥熙所掌握；中國銀行

實際上等于爲蔣子文所專有。農民銀行也就是蔣介石和C C派大官僚資本的私產，交通銀行也爲C C派等大官僚資本所把持，而總樞大權的國行聯合辦事處主席即爲最大的官僚頭子蔣介石。此外還有中國國貨銀行，中國建設銀公司等私營銀行也是孔祥熙，宋子良等大官僚的私產。

中國金融資本的發展，並不是工業生產發展的結果；相反的，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在華貿易的發展。國民黨政府財政的需要和從事各種投機事業的結果。大官僚金融資本則還憑藉其政治上的特殊勢力在從事各種壟斷，投機事業中如管理外匯，拋賣黃金等，獲得更大的發展。

帝國主義將大量的商品推銷到中國各地，以及向中國各地吸取它們所需要的原料。就要有就地的中國金融機關替他們經營貸款的匯劃，使貸款的交割可以集中方便。中國金融業因對外國資本家提供了這樣的方便，外國資本家就報以相當的儲金或津貼，中國金融業也就肥胖起來了。同時帝國主義給中國政府借款，其本息清償也由所謂『國家銀行』來管理。再有在通過中國銀行資本的掩護和代辦之下，外資也能更順利地進行其放款取息的經濟侵略工作。以上這些都說明了中國金融資本的買辦性，在爲帝國主義服務中剝削着中國人民，分得一杯羹。

中國金融資本的成長，除掉依靠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侵略以外，還有賴于國民黨政府歷年所發行的公債；由于國民政府各種反動錯誤政策的結果，特別是連年進行內戰，民生凋敝，財政拮据，于是就頻發巨額的公債，政府發行新債的時候，總是財政感到竭蹶，甚至自己的統治都危在旦夕的時候，

所以那怕發債的條件如何苛刻，都願意接受下來，何況擔負重債的是勞苦人民，分沾公債厚利的又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伴呢？這種公債十分之九是向銀行抵押現款或變賣現款，都以六、七折甚至倒六、七折計算。同時公債利息又定為六厘至八厘，所以銀行所得的實際總利益，往往在年利三、四分以上，這自然是可觀的肥利了。因此，一般官僚政客就往往將他們搜括來的『汗血錢』創辦銀行，並吸收民間的游資，來做公債等生意，這一方面促成了銀行對公債的投機，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政府與銀行的狼狽相依。

抗戰中間，大官僚的四大銀行的資本，除一部分投資於官辦企業以外，最大部分用作商業投機。『官辦之四聯總處本年貸款百分之九十用作商業放款』（中國實業第十三期）。『各私營銀行商業放款也達百分之九十六』（銀行界一卷八期）。這種金融資本為有權有勢的所謂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官僚們所運用與互相結合起來，從事大規模的囤積居奇，操縱物價，大發國難財，如孔祥熙和孔二小姐就是發國難財最有名的人物。抗戰中間以及勝利以後，官僚巨商們以大量資金從事非生產的囤積居奇作物價的投機，造成的結果是物價飛漲，少數人財富激增，大多數人痛苦更甚。近如在糧食生產缺乏與國民黨政府大量勒索內戰軍糧中，趁火打劫，囤積糧食，更增加了普及於國民黨統治下廣大地區的飢荒的嚴重性。這些大官僚金融資本還利用其政治上的勢力和金融支配地位作黃金外匯投機，如四四年二月的美國借款五萬萬美元中，二萬萬元是由美國運來黃金，在蔣介石、孔祥熙等大官僚所有

的中國農民銀行、國貨銀行拋售。他們進行金價投機，製造搶購黃金風潮，官僚資本在金價一漲一縮之間，獲利至少數萬萬元。四六年三月間C C派大官僚資本家陳立夫利用開放外匯機會，用二十元法幣合美金一元的官價購進美金外匯一百一十九萬，而當時市價則是法幣二千一百餘元合美金一元，發了二十餘萬法幣的橫財（見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東北日報）。

他們對民營工業的投資視為畏途，時常坐視民族工業受外資壓力或負債沉重而歸于破產，不加以救濟。抗戰前如一九三五年上海中新第七紗廠被英國匯豐銀行非法拍賣，裕元紗廠因欠日債被迫清理，中國的銀行資本均坐視不管。他們主要從事商業、公債和地產等買辦性和投機性事業，只以小部分資本來從事工業貸款，而其中主要的還是用來補助它自己的『國營』或私營的官營企業。如『一九四三年四大銀行放給綢緞業貸款五萬萬元，但『國營』的資源委員會就分去二萬萬七千萬元，官僚資本孔祥熙的中國興業公司獨得一萬萬八千萬元，剩下歸民辦廠的只得五千萬元；而西南及衡陽和桂林等地民營工廠，則還都沒有獲得此項貸款。』（中國工業第二十六期）由于此種情況，遂使工業家們痛感資金缺乏告貸無門，即使借到一些的也限期過短，利息過重，條件極苛刻，大都以機器廠房為抵押，使工業家受到極沈重的債務壓迫，常常成爲工廠腐蝕或關門的原因之一。

這樣，經過放款，銀行和一些中小工業發生了一定的利益關係，同時又因放款的高利貸性質及其坐視工業的災難與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的投資事業的影響，就形成了銀行業與中小工業之間的很大矛

盾。這種狀況，與其說是銀行幫助工業的發展，無寧說是銀行反而成爲真正民族工業發展的一種桎梏。大銀行們在經濟上與經過政治對於中小工業的各種壓迫，指出了一個事實：即是：一方面加深了中小工業的顛沛，另一方面又促成了外資在華工業和外貨的活躍。同時，大銀行家利用其金融的力量，經過官場的統制，和那壟斷性質的官營企業相結合，吞併和排擠中小工業，摧殘民族工業的發展，且爲外資開方便之門，和生產脫節（從主要方面來說），而又高壓在生產的頭上，這就是中國金融資本的特點。同時大官僚金融資本，對於民營的金融資本也同樣的壟斷排擠吞併，也存在着矛盾和鬥爭。

二、官營企業的壟斷統制

國民黨的大官僚資本自從抗戰以後進一步利用所謂『國營』事業及統制政策，壟斷了共統治區的所有的重要的輕重工業。抗戰期間，在重工業方面，舉凡兵工、電力、煤焦、燃料、鋼鐵等事業，完全在資源委員會、工礦管理處、液體燃料管理處、兵工署等機關經營的企業機構的壟斷之下。輕工業方面，中國工業的重心——棉紡織業爲花紗布管制局及軍需署所管制。重要的出口生產品——生絲、茶、桐油被復興公司，中茶公司所統制——『統購統銷』。重要日用品的鹽，曾一度爲國民黨當局所『專賣』，『專賣』解除後，仍爲鹽務總局所統制；火柴則有官辦的壟斷的『中國火柴公司』，並亦曾一度列爲『專賣』品之一；甚至糧食，官方也辦有中國糧食公司（糧食部與中國農民銀行合辦）：

這種官營企業和官營金融資本是結合着的。勝利以後，雖部分的解除了對生產者的統制，如廢除花紗布管制及統購統銷，但對重工業統制機構，照舊更改個名字，依然存在；並積極籌備重工業「國營」機構的擴張，企圖將石油等礦產，完全收為「國營」；對輕工業反而更加擴大了壟斷範圍。中國紡織實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華北鹽業公司等官僚統制壟斷機構已先後成立，並拚命的籌辦水產、墾業、造紙等「國營公司」。統制煤業的已成立有宋子文主辦的「燃料委員會」。操縱進出口貿易的有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主辦的「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以及宋子文的金山公司，立達公司與孔祥熙之子孔令燾主辦的「揚子江實業公司」。操縱糧食的有農民銀行。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接收」敵偽的托辣斯和康采恩性質的公司，如華北開發公司，華中振興公司等，全部作為國民黨內大官僚資本壟斷之武器。所有接收的兵工、電力、鋼鐵、煤礦、機器、船舶、造船、造紙、糧食、化工以至紙烟等事業，全部為大官僚所攫取，並以之作爲設辦壟斷公司的基礎。只有少數工場準備標售，但仍然是從大官僚們的左手移到右手。工業家吳蘊初氏請求收買就被阻拒。這些官僚資本已比抗戰時期大大的發展了。

三 壟斷統制下民營生產者的破產和民族生產力的破壞

數年以來，這個壟斷路線造成了民營生產者的破產和民族生產力的破壞。比如：花紗布的管制，使棉農及民營紡織業者失却了生產、銷售及購置原料的自由，在官僚資本收花換紗收紗換布的殘酷的

剝削下，不僅造成了紡織業瀕於破產，而且也造成了棉農的破產，形成空前的人爲棉荒，最後使大後方棉紡織業停機斷了。如河南土布業經統制後，官訂布價永遠落在一般市價的後面，其後又獨佔收買，成立了所謂『採購包辦處』，一經包辦處營業，『布店商人就只好一律停業。』（中國工業第十三期專論）。結果棉農紛紛改種糧食，棉田減縮了十分之八，造成了大後方棉荒空前嚴重，布疋亦隨之非常缺少。於是西曆四年七月間孔祥熙向美國購訂每月八十萬疋洋布來華，按每疋洋布在美國價值七元美金（見西曆四年三月三十日重慶大公報），加上海運空運來華運費，最多每疋美金五元，每疋共值十二美元，折成法幣爲四百八十元，而當時重慶每疋陰丹士林布值一萬零六百元，則每疋可賺一萬元。因此官僚資本大發洋財，而民族紡織業則受到極慘重的打擊。復興、中茶公司的『統購統銷』，同樣的剝削了絲、茶、桐油的生產者，迫使他們砍伐茶、焚燒桐樹，造成絲、茶、桐油生產和出口的大衰落。許多工紡織業糧業油業等，就因爲這種統制的結果，農民所生產的原料大大減少，而官僚統制機構，還囤積原料，抬高價格，以致原料缺乏而停工減少了。另一方面，也因爲工業產品被統制，給價往往不修成本，如錫業、酒精業、油業、糖業、鹽業、綢緞、煤炭等業因此而無法維持。

除了統制與壟斷而外，生產者還受到官僚金融資本，濫發紙幣，囤積物資和國民黨政府苛捐雜稅的打擊，工業家利得數字在天文數字的物價高漲下，實際成爲虧本，但還要擔負種種稅捐，這就是國民黨區工業家所控訴的『虛盈實稅』的壓榨（捐稅方面，有所得稅，利得稅，統稅，『儲蓄』等等），

據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重慶大公報載：「某公司有資本二百萬元，去年（一九四三年）全年利潤總額二百萬元，負擔全額所得稅，利得稅，營業稅，印花稅，鄉鎮公益捐等共計三百四十萬元。超過純益額或資本原數的一倍半，地方的安碎攤派還在內。」黃炎培先生在重慶一次座談會上說：現在的關稅並不限於國稅，中央、省簡直是「統二」「統三」「統四」，甚至到「統八」都有的。

在生產者破產的局中，生產力的凋敝達到了如此嚴重的程度：重慶工廠總數一千四百零九家，佔戰時國民黨區工廠總數（五千四百多家）的四分之一，已倒閉了千家左右，佔該市工廠數三分之二。強，佔西南，西北國民黨區五分之一。其他，鋼鐵，化學工業全部停閉，機器業停一百八十一家，電工業停十七家，煤油業苟存者寥寥無幾，麵粉業半數停工，而紡織業在去年即因棉荒與勝利後恐慌而大半停工關門，目前仍陸續倒台中。他如貴陽工廠倒閉了一千多家。昆明民營工廠倒閉半數以上，而西安的紡織業也大部破產。其苟延殘喘者，僅開用機器十之三至十之五。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四川的蜀報頭條廣告為三才生等十家煤礦的聯合聲明，稱：「現本礦等業，已竭盡最後之掙扎，陷于借貸無門，業瀕全部停頓之絕境」。這種景象，就連國民黨政府生產局長翁文灝氏亦不得不承認「生產萎縮，國廠停工」。由此可見，國民黨區的工業已被大官僚資本摧殘到何等衰敝的程度（見四六年五月十九日東北日報）。

勝利以後的大官僚「接收」的工礦業和「國營」壟斷的政策，則更是破產的民營生產者

的絞刑。這種官僚資本的『國營』公司憑藉着政治上的特權，實行壟斷，吞併、掠奪，民營工業絕無力量與之競爭，如中紡公司所『接收』的連同向外國購買的與中交兩行原有的紡錠共達五百萬枚以上。但國民黨統治區民營紗廠目前所能開工的只有十五萬枚。這就無法與中紡相抵抗。中翫公司同樣的擁傲上海江浙兩省的八大蠶絲廠，七百九十八台機器，並有十五廠尙待接收。在嘉興、杭州、上海等地有設蠶絲、製絲、織綢工廠，亦非破產的江浙四川生絲產者所能與之競爭。總之，『國營』事業以壓倒優勢格殺着民營的中小資本，而阻斷國民黨區人民從事生產事業的道路。

四 官營企業的封建腐敗性和買辦性

官僚資本壟斷的路線，不僅摧殘了民營生產事業，而且由于其買辦性和封建官僚的腐敗性，官僚資本所壟斷的企業本身，也決不能成爲發展生產的力量。官僚資本的第一特色，就是貪污腐化，因之，凡是官僚資本所經營的生產事業的生產也日益低下。著名的花紗布局需布案，如前年九月間參政會所暴露的，其所毀爛掉的紗布竟達三萬萬元以上。同樣的，在『統購統銷』的政策下，大批的茶葉腐爛在衡陽倉庫裡；這個政策簡直成爲『銷而不購，購而不銷』。勝利以後，官僚資本壟斷公司一個又一個的成立了，以中紡公司來說：單單總公司的大小職員，就有七百人，完全成了一個腐敗的官僚機關。在這裡，各廠真正人才無法延攬，皇親國舅，裙帶關係，都可任意委任，甚至對機械設備任

令腐蝕而不添補。據四六年三月間參政會所暴露的，絕大部分的『沒收』的工礦業至今八個月尙沒有復工，坐令機器設備生鏽。大官僚們只知『沒收』發財，無心『復員』生產。爲了賺錢，中紡公司以共所『沒收』的紗掛牌售價一百二十萬元一包（其原來成本不到五十萬）。引起上海紗布高漲，目前（四六年四月）價格十二倍于去年九月，並刺激了百貨漲價。而上海所有的『公營』事業，如鐵路、電車、電報等等的加價，無一不是上海物價高漲的推波助瀾的因素。這又證明大官僚資本不僅沒有幫助生產的發展，而且在製造經濟紊亂。實際上是對於生產的重大破壞。

官僚買辦資本的破壞工業生產，更重要的還因爲它在『生產建設』的幌子下面，爲着他們的主子外國獨佔資本服務與斲喪民族權益。比如，國內皮革業在他們壓榨下破產了，但大官僚們的『軍用皮鞋』也不在國內訂製，而向古巴購貨，使垂危的皮革業更走絕路。目前，外貨大量的入口，從棉花、棉紗、棉布、洋麥、洋麵、洋米，直到奢侈品都成爲大官僚資本家最重要的發財途徑。在此情形下，官僚買辦資本是不可能也不會去和他的主子競爭的。因此目前中紡公司主要的業務，不是生產，而是大量的作布疋。棉花的入口，即幫助其帝國主義主子推銷商品到中國來。由于美貨泛濫于中國市場，使民族工業已遭受到更嚴重的危機；另一方面，他們又正與美國紡織業巨頭籌劃在中國『合作』開辦紡織廠，以美國的五大資本和技術侵入中國，這將使已經非常衰敝的民族紡織業完全走向破產，而官僚買辦資本亦就依附其外國主子分得一杯羹，充分表現出買辦的特性。中蘇公司甚至認賊作父

的向日本採購五十萬張蠶種和三千萬枝桑苗，給了垂危江浙、四川從事蠶桑事業的民間生產者以一個致命的打擊。抗戰中間如資源委員會的各種『國營』工廠事業也無一不是與外資『合作』使外資擁有了一定的支那權利，即是說都帶有買辦性。勝利以後，這種官僚資本的買辦性更擴大和加深着，這種『買辦』政策，無疑的是在國內市場驅逐民族生產品，破壞民族產業的道路。

五 民族資本家的呼聲

這種官僚資本的壟斷統治結合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已造成工業嚴重的凋敝和中小資本的破產，而今後，則無疑的將更加嚴重的摧毀民族的，自由的，人民的生產事業，使中國人民依舊並更殘酷地被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牢獄裡。

在這種嚴重的摧殘下，工業界就喊出了『解放工業』，『產業自由』，『實行民主，成立聯合政府』，『打倒官僚資本』，『要求和平建設』的呼聲。如四四年五月重慶憲政月刊社召開的憲政座談會上，工業家吳藻梅大聲疾呼：『工業界沒有生產的自由，沒有運輸的自由，沒有營業的自由，像人沒有言論，出版，結社，身體的自由一樣的痛苦』。他說：『生產界要提出「生產自由」的口號，同時政治主要是工業生產的絕對必要條件，沒有它一切都無從說起。』胡西園說：『要解救工業，扶持生產，第一個課題就先要取消統制政策。』章乃器等也說：『民主政治是發展工業的必具條

件。『四四年中國工業協會，西南實業協會等五企業團體聯合舉行座談會，出席有吳稚初，吳羹梅，章乃器，潘仰山等八十幾位工業界代表，他們一致呼籲，要求政治民主，要求生產自由。曾因著文反對官僚資本而坐牢的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說：『官僚資本佔了大工廠，又要限制小工廠。現在大工廠停工了，小工廠也倒閉了。』『今天中國的經濟問題主要不是勞資對立的問題，因為勞資雙方都在不合理的官僚資本壓榨下，一天比一天不得了。資方關門倒閉，勞方失業饑餓，以前勞資雙方對立的形勢給官僚資本沖淡了。今天與勞資對立的對象是官僚資本，不倒閉官僚資本大家都會沒有飯吃的。』四六年二月在重慶中央大學的講演中，他高呼『打倒官僚資本』，他怒罵這少數的大官僚買辦們『利用外國人勢力來搜括自己中國老百姓，真是狼心狗肺，真是中國的不幸。』最近工業家，中小銀行家等一致反對國民黨進行內戰，要求和平民主，如中山工廠聯合會負責人徐崇一，遷川工業聯合會理事長胡詒文等都先後發表此種呼聲，上海各界赴京請願被特務毆打的代表中，很多是民族事業家，中小銀行資本家。他們已認識到要救濟並發展自己，歸根結底是一個『政治問題』，也就是不許大官僚買辦金融資本家獨裁的問題。是反對美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侵略的問題。

六 極少數人的幸福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破產、飢餓、死亡的痛苦之上

由於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與官僚資本壟斷統治，操縱投機的結果，造成民營生產者的破產，已如上

述，因此人民生活日益貧困，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裏只舉工人和城市貧民的生活如下：

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生活，原來在資本家的殘酷剝削之下，就已很苦，工錢低微，每日工作時間通常在十二小時至十五小時，並且常常受到失業的威脅。如一個紡織工人說：『一天要作十二、三小時的工，物價狠命上漲，工資却加不了多少，每天飯都不能吃飽，住草棚房子，碰見下雨，上面淋水，上面淌水，人就睡在水中間。』還有一個工人說：『每天十二個到十五個鐘頭工作，還加夜工，動不動就開除，就罰金，死死的弄了一月，這一扣，那一罰，就完蛋啦。』萬一發生疾病，不僅醫藥費無着，就連半飢半飽的生活也不能維持。在他們一天十二、三小時的勞動當中，大部份工人都忙得手足不停的。每天到最後的兩三小時，完全是在極端疲乏之下的強制勞動，軋傷、軋死等悲慘的事，也就在這個時候層出不窮。工業恐慌，停工減工以後，就有大批工人失了業，挨凍挨餓，流離失所。據四六年初中國勞働協會統計，重慶一地失業工人即達八九萬之多。上海則有更多。這些被拋棄的失業的工人流浪在街頭。他們說出『做一天，吃一天，停一天，餓一天。』『當光，賣光，吃光』的傷心話，等到什麼都光了的時候，就只有餓餓和死亡了。

城市貧民的生活也是非常痛苦的，如重慶市民搶買平價布、紗罵、打架、擲石頭，終於流血。福州搶買平價米的人，擠塌了房屋，壓死數十人。四三年時重慶每日餓死街頭，無人收斂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新華日報四三年四月二十日）。四六年一月三、四兩日，上海凍餓而死的就有百餘人，

其中困苦工人佔很大數量。在重慶妓女總數在一萬人以上，重慶的青年婦女共只有十三萬，平均十三個女青年中，就有一個淪入火坑。再如湖南衡陽，全城男女老幼二十一萬人中，因生活所迫而流入娼妓者達萬餘人。這就是說，差不多三四個年輕婦女中即有一個爲娼（婦女生活六卷十二期）。他們從慘苦的充滿了血淚的夜生活中，一年給予政府的捐稅，達一百五十九萬六千九百三十四元（四三年四月七日大剛日報。）這種出賣肉體的生涯是她們願意的嗎？決不是，那是罪惡的舊社會，國民黨反動派黑暗統治的壓迫和剝削所逼迫她們的，不僅逼迫她們走上了這條路，並且還要向他們抽稅剝削，這種不合理難道還不明顯嗎？

另一方面，佔人口中極少數的大官僚，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級則吸取人民的膏血滋養着自己，在廣大人民破產飢餓死亡的痛苦上，建築起他們極少數人的幸福。他們過着窮奢極侈荒淫無恥的生活。如孔祥熙存在美國銀行裏的美金，早就達一萬萬美元，還在南美洲的巴西國有大批的地產。四三年時的統計在昆明市內擁有四萬萬以上的財產的計有十四人，擁有一萬萬以上的計有一百四十人（四三年五月二十日桂林掃蕩報社論）。其生活之濶，穿的是十幾萬元一套的衣服，住的是數百萬乃至上千萬元一座的洋房（還要講求什麼『英美式』、『荷蘭式』，或者『宮殿式』之類），吃的是美國橘子，美國白菜，喝的是三千元一瓶的白蘭地酒，灑身的香水花五千元一瓶，一場賭博的輸贏達數十萬數百萬元，小老婆八、九、十幾個；甚至用二萬元買一頭狼狗，狗的生活之濶綽，據說出入坐汽車，

每日消耗牛乳一磅，生羊肉一斤，雞蛋數個，每日伙食費二三千元，約與當地大學一個人十個月的伙食費相等（四三年四月五日重慶新蜀報），情況緊急時，洋狗也坐着飛機逃難；其僕人之多，『如重慶老鷹岩一巨宅，用男女僕人八十餘，每日食官米數十石，每月共支工資二萬五千元』。尤有甚者，比如孔祥熙的二小姐結婚，爲着擺佈得更堂皇富麗，索性就坐飛機到美國去舉行婚禮。『其嫁裝皆由財政部婦女工作隊代製，多爲繡花錦袍……』，再用飛機送到美國去，第一次運嫁裝的飛機失事，致艷麗的服裝稍有污損，又由『婦女工作隊數十人日夜趕工重製，再行運美。』據說『把孔小姐結婚所耗，如用來作軍服，可以解決二師人的全部軍服，或五十個傷兵醫院的全部傷兵衣服，如用以救濟饑民，則一萬個飢民可以起死回生』。（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長沙大公報）。

第三節 國民黨統治區農村經濟的破產

一 農村的土地問題和封建的地租剝削

國民黨統治區的農村，土地分配是極不合理的。抗戰以前，據一九三三年國民黨政府的農村復興委員會在河南、陝西、江蘇、浙江、廣東、廣西六省調查的結果，佔總數百分之九點九的地主、富農，佔有耕地百分之六十三點八，而百分之七十點五的貧農和雇農，却僅佔有土地百分之十八點四。

浙江平湖地主以百分之三的人口，而佔有百分之八十的耕地。又據晉察冀邊區北岳區二十八個縣中的八十八個村莊的調查，抗戰以前，佔農村總戶數將及一半的貧僱農，每戶平均只有兩畝半至七畝半左右的耕地，而地主所有的土地總平均則有九十七畝以上。各階層的土地分配狀況如下：

階層	戶數%	每戶平均有地畝數
工人	二·一〇	一·七八
僱農	五·八二	二·五四
貧農	四一·六三	七·四〇
中農	三五·七九	一八·〇九
富農	七·二六	五六·二七
地主	二·〇三	九七·八九
其他	五·三七	二·八一

雖然各地集中的程度有些差異，但一般的可以這樣說：十分之一屬於榨取階層的人佔土地十分之七，而十分之九的貧苦農民（包括中農，貧農，僱農）只佔有十分之三的土地（見『抗戰中的中國經濟』一書）。因此廣大無地或土地不足的貧苦農民，就不得不租種地主及富農的土地，忍受殘酷的封建地租剝削。

在抗戰過程中，土地集中的程度更是飛速的發展着。這主要是因爲農民在地主、高利貸者的殘酷剝削與國民黨政府橫征暴斂之下，大批的破產，土地被兼并；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他份子競向購買土地，進行投機所造成。這裏舉國民黨統治區內一些雜誌中的材料如下：

『在農村裏面，常常有一批一批的大地主出現，有資財的人多轉移投資的目標於土地，作土地的囤積居奇。據說四川×縣的全縣土地，幾乎被某人買光……以目前的情形而論，土地是一天天的在集中。』（重慶糧政月刊一卷四期專論）

『官僚地主和商人，大量投資於土地，成都平原、重慶周圍……爲達官顯要發國難財者匯集之區，爭購土地的熱潮更非常洶湧。在抗戰前，兼併土地者主要是地主及少數軍閥，現在則情形有些不同了，競買土地者，很多是一些新的人物了。這些新的人物，有人稱之曰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投機份子。』（重慶文化雜誌二卷四號專論）

『四川平原的大地主，在戰後，他們的聲勢令人咋舌，佔地三四十萬畝至三四萬畝的地主極爲平常。』（重慶『學習生活』十六期專論）

『貴州關嶺的大地主每戶可收五百石地租，這樣的大地主，可有二十餘家，每家統治着二千餘石的穀類生產，那麼二十餘家就能統治一兩萬餘石的穀類生產；並且統治着二千餘戶佃農的生計。大地主勢力是相當雄厚的。』（重慶『中國農村』六卷六期）

土地所有權雖如此集中，但使用權却是非常分散的，地主手中大片肥沃的土地，不願意自己來耕種，而是把土地分割成極小的單位，出租給農民利用中國古老的方式和農具來耕種，維持着古色古香的封建小農經濟。至於資本主義性質的雇用工人生產的富農（農業資本家）經濟，在中國僅佔着很小的比重，並且規模都很小，絕大多數是出舊的生產技術，而他們一般的還兼營租佃和商業高利貸剝削，帶着濃厚的封建性。

抗戰前的地租額一般的佔收穫量百分之五十至七十，除正租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額外榨取，如『背租』（一斗租子加一升糞或一捆草），『雜租』（除正租外，地主額外要的茶，水菓，草料……等），『小租』（如『租草』『租料』『租鴨』『租雞蛋』等），收租時『秤收租』，『加一租斗』，『加二租斗』，租地時先交『押金』等，還有『無代價的給地主服役』，如抬轎，挑水，打掃，樁米，割草，牧馬等工作，遇着婚喪，造屋，過年，還要隨叫隨到，『年節送禮』，『收割請酒』……等等數不盡的剝削。遇到天災歉收，許多農民全部打下的糧食還不夠交租。還有如五台山和尚喇嘛地主，是當地最大的地主，佃戶給他們送租子，走進寺院時，須數步一叩頭，焚紙燒香獻上。當他們來鄉上收租子時，往來盤費接待費等都要佃戶負擔。某些地區喇嘛地主對農民的妻女還享有『夜夜權』！一般地主打罵拘押佃戶和搶佔姦淫佃戶妻女者也是在皆是。在輩分上還叫佃戶和地主的兒子同輩，在人格上地主對農民是視為卑賤下等的。

抗戰以來又因地價、物價的高漲，地主亦就任意的加租，加押金，因此租額普通在『六成以上高至八成左右』（見『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如『四川墨山下家×農村，地價漲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地租交漲一半，以前佃戶與地主對半分的，今天却變成佃一主三了。』（見反攻八卷一期，沈志遠：過去一年的中國經濟。）

在土地的投機競買中，土地換了主，管事的也就換了，管事底下的地鑽子（專門代農民租佃的人）也換了。管事、地鑽子爲求自肥，也乘機調換了一批新佃戶，他們又從新佃戶手中剝削一點所謂『酬勞金』。平時佃農對他們也要恭維應酬，不敢得罪了這些『地頭蛇』。農民不僅沒有土地所有權，連租種權也得不到保障。

地主爲了向農民收租，普通都養着自己的武裝隊伍，在許多地方甚至有他們的拘留所，以拘禁沒有交租償債的農民，或者依仗他們政治上的勢力交代給官府逮押。

農民們終歲勤勞，生產了社會所需要的糧食，但却大部份被不勞動的地主剝削了去，自己反而吃不飽，穿不暖，還要受到地主的種種欺壓，給地主當奴隸牛馬。地主們則是不勞而獲，坐吃農民的血汗。並且華衣美食，三妻四妾，當社會的寄生蟲。這種不合理不平等的現象，基本原因是由於地主階級掌握了農業中最重要的生產手段——土地所有權，而廣大農民們却沒有土地或缺少土地，不得不向地主租種。所以土地問題就是中國農村問題中主要問題，一切矛盾的出發點也就在這裏。中國農民

解放運動，也就是農民要求得到土地，要求『耕者有其田』的運動。

二 吃人的高利貸

既然農民們終歲勤勞所得大部份被地主剝削而去，他們就只好緊緊腰帶，忍飢挨餓。一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吃的沒有，農本沒有，只好向地主或土豪、商人、富農借債，一有意外急需，或官債逼得非繳不可的時候，更得忍痛告貸。在中國農村裏，高利貸是很普遍的。據統計四川西屏山馬×一帶農民，負有高利貸者約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利息最低的是年利三分（即百分之三十），五六分是很平常的。川中有月利十分的。（見『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利大利小，要看『人值不值』（有無產業），貧農借錢，利特別大。還有所謂『現扣利』（在借錢時先扣下第一個月的利息）、『出門利』（借錢出門之後，不管半天一天都要算一個月的利息）、『打打利』（利率高，以趕集爲利期，遇集付息）、『滾滾利』（前一個月的利息，後一個月又生利）、『關錢』（以十天爲一關期，分期償還資本和利息）、『青麥賬』（莊稼長青苗的時候，借了錢，講好到莊稼收穫後以低價折錢償還）……等等的高利貸剝削形式。借錢時還須以土地或房產作抵押，一般約期都很短，到期還不上錢，土地房產即爲債主所有。

請看茅盾先生的巨著『子夜』裏的一段關於農村高利貸的生動的描述：

「他，馮雲卿，就靠高利貸盤剝農民，居然也掙起一份家產來。他放出去的鄉債從沒收回過現錢，他也不希罕六個月到期對本對利的現錢，他的目的是農民抵押在他那裏的田。他的本領就在放出去的五塊十塊錢的債能夠在兩年之內變成了五畝十畝的田？這種方法在內地原很普遍。但馮雲卿是有名的「笑面虎」，有名的「長線放遠鷄」的盤剝者。高利貸網佈置得非常嚴密，恰像一隻張網捕捉飛虫的蜘蛛，農民們若和他發生了債務關係，即使只有一塊錢，結果總被馮雲卿盤剝得傾家蕩產，做了馮宅的佃戶——實際上就是奴隸，就是牛馬了！現在馮雲卿已經擁有二三千畝的田地，都是那樣三畝五畝詐取巧奪過來的。都是滲透了農民們的眼淚和血汗。就是這樣在成千成萬貧農的骨節上，馮雲卿建築起他飽暖的荒淫的生活！」（子夜）

近年來在國民黨禍殃民的各種政策下，天災人禍交迫，農民大量破產，高利貸亦就更活躍，利息亦就更驚人。在廣西年初借稻穀一百斤，在七月還本利稻穀二百斤，這就是「借一還二」（『農村的高利貸』四一年六月三日桂林大公報載）在廣東春江，春天借一千元，可買穀四十斤，夏秋二季共須還本利穀二百斤，計值五千元以上，這就是說「借一還五」（『粵東糧荒日擊記』四三年六月三日大公報載惠陽通訊）湖北襄陽，放債者放出一斗麥，收麥後本利可收回七斗，這就是「借一還七」（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河南民報讀者呼聲）。這種是吃人的利息啊！農民們常逼得沒有辦法的時候，雖明知這是死路，也只有向死路走去，因為這樣到底可多延長幾天生命。

三 吸血的商業資本

農民們將自己的收穫物出賣，去換取自己所需要的其他生活資料時，又要受到商業資本的剝削。每年在秋收以後，農民們急於出賣他的糧食以爲償債和維持生活之用；但在商業資本的壟斷操縱下，此時的糧價一般的總是較低，到了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們已沒有吃的餘糧，只得借錢去買糧來吃，而每年此時糧價在囤積投機下總是大漲，這中間就吃了很大的虧。其他農產品出售，也都受到商業資本的操縱剝削。他們或是故意抑低價格，農民因急於出售，不能拖延太久，只得忍痛市低價出賣。或是大秤小斗，剝削農民。或是放債買青和高利貸結合起來，譬如四川內江一般農民以栽種甘蔗爲生，在重重壓搾剝削之下，極度貧困，常因等着錢用，預賣自己的甘蔗叫做預賣青山，又往往因爲天年不好，甘蔗歉收，不足繳清預算的數目，長用了糖坊的款項就叫做『長項債務』。這種債務，須在預賣時還利，每月三四分不等，並以複利計算，這叫做『空心利』。有了『長項債務』的農人，不只是受着『空心利』的輾轉剝削，就是以後每年甘蔗的主權，亦便歸於糖坊的掌握，不能自由買賣。在買取其他生活用品時，農民也要受到商業資本的一層剝削和囤積居奇，抬高物價的影響。

這種農村中的地主和商業資本高利貸者，通常是互相結合三位一體的。往往是地主又是高利貸者

又是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高利貸者轉化而兼爲地主，他們有極密切的關係。他們在農村中重重剝削和壓迫着農民，農民因交不起租，還不出債，被他們逼死、拘押、拷打，以至家破人亡，被迫逃亡的事情是充滿於農村各地的。

四 帝國主義對中國農村的經濟侵略

另一方面，農村經濟又帶有深刻的半殖民地性質。在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政策之下，例如抗戰前河北省平漢路一帶農民，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都被迫種了棉花，替日本帝國主義生產原料。山東膠濟路中段與河南許昌一帶的農民將種大部份土地給英美烟草公司種植烟草。而日常必需品，甚至大部分食糧，都要從國外輸入，帝國主義在中國用低價購得農產品原料，再把經過加工製造的工業品賣給中國，從不等價的交換中剝削中國人民；又使中國經濟依附於他們帝國主義。中國的商業買辦階級則亦在幫助帝國主義收購原料與推銷商品的過程中，操縱剝削中國人民。舊有的小手工業及家庭手工業，因競爭太過殘酷生產的賤美價廉的外國工業品，迅速趨於破產，中國農村受到帝國主義的支配與剝削更日益貧困。

而這種帝國主義的支配剝削是以直接爲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爲媒介的，而這種買辦階級與高利貸階級則又像上面所說與地主階級有密切的聯繫，往往又是三位一體，互相結合

的。帝國主義是通過他們來支配掠奪中國農民的。因此在政治上，帝國主義也就與中國封建殘餘勢力結成聯盟，共同辦理的。資產階級作爲其統治半殖民地中國的代理人，以封建地主作爲其統治中國的主要工具。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像兩座大山結合起來重重的壓迫着中國的人民。

五、苛捐雜稅橫徵暴斂

除了這霸權、上的剝削以外，國民黨政府在農村中還有繁重得驚人的苛捐雜稅和地方攤派，簡直要抽乾人民的骨髓。

第一種是田賦徵實，也就是按照田畝數向人民『徵糧』。在『徵糧』中間，保甲人員往往任意增減土地陳報，使老百姓的田畝與自己有關係的人物土地畝數減少了；把一般老百姓的當然是無錢無勢的窮人的增加了。窮人們在暴政淫威下沒有說話和告狀的餘地，只好忍屈受欺。

第二種是『徵購』『徵借』。『徵購』就是除『徵糧』以外還強用低價購買人民收穫的糧食，『所發糧價僅四、五、六分』，且強迫人民代爲運送。』（見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國民黨中央社報導國民參政會的糧食『簡案』）『徵借』就是除『徵糧』『徵購』外，向人民強迫借一定數量的糧食，規定第五年起分五年還本，這實際上也就是預徵和加重田賦的一種形式。這種『徵購』『徵借』是攤派的，因此地方上的主要勞紳有錢有勢者就儘量不依貧富比例來出，而使自己少負擔，使一般農民多負擔。

第三種是『攤派』，據經濟季刊第三期載稱：四川雲陽、巴縣、宜賓、劍閣等十八縣，四二年底攤派種類六百一十六種之多，平均每縣在三四十種以上。而資中一縣就有六十七種，有『壯丁費』、『義勇壯丁費』、『鄉警費』、『鄉鎮縣丁食米』、『警備丁飲食費』、『駐軍柴草馬料費』、『壯丁伙食費』、『出征壯丁購置費』、『幫助壯丁獎勵費』、『兵役熟賠費』、『機場哨兵費』、『駐軍火柴費』、『保護電線費』、『巡察隊成立費』、『保校升旗費』、『保長臨時費』、『因公被押費』、『做公文費』、『請客治酌費』、『建立鄉鎮公所廁所費』、『招待縣長費』、『屬地屬人捐』、『三月臨時費』、『民生慰勞費』、『國曆費』、『遷移城隍廟捐』、『誦經費』……等等。四二年四川省各縣攤派平均在一十萬元以上。四四年蔣介石電令舉行鄉鎮儲蓄，數額二百萬萬元，普通工商農人也要按月拿出數百到二千元來儲蓄，則攤派又增加了重要的一項。下面舉重慶中國農村第十九期一篇文章中所報導的一段話：『當你在街上走時，常常可以遇到很多人抬着棺材，棺材頭上貼着一大堆印花。假如你要買一隻羊，也得在羊角上貼許多印花。』各種攤派捐稅，簡直稀奇古怪，無所不有。因而國民黨統治區內流行着一句話說：『自古未聞尿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

這種攤派最苦的是農民、中農。因為第一、鄉保人員可以不派款，鄉保長的親友可以少出，會在黨政軍有職務的，或地方士紳及哥老會之有力份子都可減免。第二、有權有勢的大戶拒攤不繳，雖派等於不派，鄉保長就將大戶欠派數，向其他各戶攤派以補足。第三、有力地主，憑其在租佃關係中之

優勢，故意將各種保甲捐壯丁捐等轉嫁給佃農。

這些攤派中，『大部分飽了私囊，普通都不發收據，即使發出，也由鄉長發到甲長爲止，不發給老百姓，保長從來不公佈賬冊。』（見四川省訓練團民國卅一年度攤派調查報告書）『以普通情形而論，每個老百姓所負擔的「中飽費」總在正式負擔（指各級政府規定的）三倍以上』（重慶中國農村戰時特刊第十九期：抗戰中的西北民生問題）。

如果總的來說，合計抗戰中農村全年賦稅要佔到總收穫量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上。如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陝西黃陵縣某村的統計，四四年全村收穫量如果以入口平均，每人不到一石四，但平均每人負擔却有七斗四升六。（見四五年七月二十日延安解放日報）而其中因『征購』和苛稅雜捐的攤派，並不與財產和收入多寡作等比，有許多稅捐則是按戶平均攤派的，富的就愈是相對的少出，窮的就愈是相對的多出，再加上有權有勢者任意增加和轉嫁負擔到一般農民頭上。因此一般農民的負擔佔其收穫量的百分比則更大，總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再除去農業成本消耗以外，人民就無以爲生了。某些地方甚至公糧勒索超過了農民的總收穫，近年來因國民黨政府殘民以逞的錯誤政策的結果，生產日益減少，人民日益貧窮，貪官污吏營私中飽日益增多，政府與軍隊開支日益膨大，造成財政上愈來愈深的危機。於是向人民榨取的各种賦稅也就一年比一年增加，即以田賦一項來說，四四年國民黨區田賦總額比四二年增加一倍比四三年增加三分之一，地區和生產量日益縮小中，征糧負擔却還年年增加。因此

在國民黨區流傳着這樣的民謠：『革命尙未成功天有眼，同志仍須努力地無皮』。在這種苛征勒派之下，不知多少農民被保甲和差役狗腿摧逼致死，或被捉去關押拷打。

除這些『賦稅』以外，在駐紮軍隊或軍隊過路的地方，更要受其擾害，隨便牽去牲口，拿去糧食蔬菜，敲詐勒索是常有的。再有，就是可怕的抓壯丁，抓去當兵不管你一家死活，除非每年花錢運動保甲長和兵役人員，在這種敲詐勒索下，不知多少保甲長和兵役人員發了巨財，不知多少農民被逼得死亡流離！

此外許多農產如棉花，茶葉，桐油等，被政府統制，常常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強迫收買，以致農民們勤勞一年竟賠了血本。

六 農民飢餓死亡農村生產萎縮災荒遍地民變蜂起

農民們的終年收穫既遭地主慘重剝削，再又受到高利貸、商業資本和帝國主義的經濟剝削，政府統制農產品的剝削，及苛重的橫征暴斂，敲詐，勒索，於是大多數的農民們就飢寒交迫，掙扎在生死線上。少數富者愈富，大多數貧者愈貧。農村中兩極分化非常明顯。甚至大多數的小地主在受到國民黨政府橫征暴斂，敲詐勒索和變國難財者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下也遭到破產的厄運。農村中的土地和牲畜就一年年更集中到少數有錢的地主富豪們的手裏去了。

試問在這嚴重剝削下瀕於死亡的農民，那有農本、精力和心情來改良生產？相反的，却是一年比一年的馬鹿。農民像牛馬一樣，現在大部賣掉或殺掉了。過去的肥料、油、豆餅，現在已作爲重要食糧，不送到田裡了。再加上連年抓兵，勞動力缺乏，老人婦女也代替了壯丁。於是田禾的收成一般限於『說不收總收，說收却不收』的萎縮狀態，農業生產力日益下降。『四川全省農產帶指數，最近五年間稻米產量低落了百分之三十二，小麥低落了百分之二十四。』（廣西日報四四年三月十四日專論）在這樣亂突交迫，地主、債主、保甲長的催糧逼款之下，抗戰中農民的抗戰積極性自然也就受到很大的壓抑，阻礙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儘速勝利。

同時，在這種慘重剝削之下，農民們也就被剝奪了提防災荒和救濟災荒的一切可能性，任何災荒，一旦降臨，人民即受到慘重的災難。而國民黨政府的苛征虐派，敲脂吸血，還人爲的造成飢荒或加深了災荒的嚴重性。近年以來，國民黨統治區各地都普遍不斷的發生災荒。最嚴重的是四三年河南災荒。老百姓稱爲『河南四災，水、旱、蝗、湯。』湯就是國民黨政府在河南的駐軍長官湯恩伯。僅據災情過程中間一個極不完全的調查：『全省人口約三千萬，有三百萬人已經餓死，流亡他省的計三百萬人，不立即救濟即將餓死的計一千五百萬人，另有一千萬，也是奄奄一息了。』『飢民在榆樹皮草根都吃光之後，強壯者就搶他人的兒女殺來吃，老弱者就只好坐而待斃，或懸梁自盡。鄭州一老婆，當餓得沒法的時候，把自己的女兒也殺來吃了。』（大後方生活相）在廣東有把女兒論秤每斤十

元出賣的。（桂林大剛報四三年五月十四日）『去年廣東災荒，餓死及無家可歸的人據英國援華總會報告就在兩萬以上……』（何香凝四四年三月八日桂林大公報）在四川、陝西、廣東、廣西、福建、貴州、河南、湖北、甘肅等大後方各省都曾有過嚴重的災荒。災荒一起，農民們賣田鬻兒大量死亡或逃荒，却又造成富豪們趁火打劫的好機會，以極低的價格，兼併土地房屋及其他財富。農民們被逼得沒辦法時不甘坐以待死，因此就造成民變蠱起，各地此起彼伏不斷的發生大小規模的農民暴動，要求免糧免款，要求生存活命（見本書第一章政治第五節，人民的反抗運動）。

抗戰勝利後，農民們的苦難，不僅沒有減少却反而增添了。國民黨為部署發動內戰，大肆調遣軍隊，大量徵收軍糧，繼續抽拉壯丁，更瘋狂的壓榨人民，使已受國民黨或敵偽摧殘和破壞得不像樣的農村，更遭逢到不堪其苦的災難，人民的負擔和痛苦比抗戰中更重更深得多了。

例如湖南衡陽大堡鄉小小一地，即駐有數千名國民黨軍隊和日偽，天天派兵下鄉，坐索軍糧，以草根為食之難民無法應付。（正言報：『湘省賑災拾聞』）湖南縣一地『征購』軍糧即要分擔十四萬九千石。×南縣田賦附加，超過正供七倍以上。試問一個縱橫不滿百里的小縣，如何負擔得起？（同上）他們『拉丁徵糧，把機關槍架在老百姓門口搜糧，搶劫掠奪。』（見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國民參政會上翟倉陸的質問）江西滿目荒涼的災區，尚須『征購』軍糧，一個江西紳士說：『峽江幾經敵人竄擾，人口只剩三萬多了，可是征購軍糧却分配到十萬石之多，照目前的人數分配，連吃奶的嬰

兒包括在內，每個人平均要出三石多，而我們連自己吃也不夠，那能再征購呢！」這還是紳士的話，貧民則更苦了，很多人家被逼得懸梁或投水。（四六年四月十六日上海申報：『江西在災厄線上』）甚至在蔣介石發動大規模內戰急催各地軍糧之下，逼得江西糧食處長程懋型也投河自殺了。上海文匯報五月二十七日通訊稱：『在程氏自殺之前，不知有多少農民因不起「軍糧」而被迫自殺。程氏之死更說明江西是實實在在沒有軍糧了。』這種橫征暴斂已產生非常嚴重的結果，使各地人民糧食奇缺，發生普遍而嚴重的飢荒。

據聯合國救濟總署最近發表的初步估計：國民黨統治區飢荒地廣達十九省之多，約有三千萬人民已瀕於餓死。其中四百萬人已無法挽救。內中災情尤以湖南、河南、湖北、廣西爲最慘重。

聯總發表消息說湖南全省人口（二千七百萬）估計有四分之一以上（七百萬）嗷嗷待哺或不久于人世，有數百萬人日食草根樹皮，甚至觀音土，以苟延殘喘，湖南鄉間植物，已被當地人民及前往漢口的難民咬嚼一空，寸草不剩，疾病死亡跟著飢饉來臨。據新華社延安西六年六月五日電訊，湖南已有三百二十萬人餓死了。一民主生活「第八期載稱，衡陽有飢民行劫，被抓住了，他指着自己的肚皮說：『請破開我肚皮，看裏面是米是草，如果有一粒米跡，請打死我！』零陵縣城每日街頭兩旁擠滿葦藍，內坐着三四歲五六歲的小孩，大人哀求行人把他們的孩子買去，幾天賣不脫的只好送入。（上海申報三月十七日長沙通訊）廣西北部，已兩月未見粒米，儘以野草充飢，湖北有的地方，整甲整

保逃走一空，河南人民有四分之一已處於絕境。（聯總開封分署主任哈寧報告）甘肅省會蘭州，十三萬人口中，採食野菜草根吃的達十萬人以上。（國民黨中央社四六年四月四日電訊）中國歷史上在各朝代統治集團腐朽專橫到極點而臨近崩潰的時候，常有過極普遍的可怕的大災荒，在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區又一次更嚴重地出現了。

但另一方面，大批的米糧却在大批的米糧倉在大官僚老爺的倉裡霉爛掉。天津大公報載鎮江專電說：在鎮江有一百多所『接收』封存的糧倉，因人民無權過問，在風吹雨打之後，倉裡麥子出了芽，麵粉霉成餅。在杭州、嘉山、蕪湖等地，因糧食被『要人』兼奸商的老爺團在店裡，糧價逐日飛漲，而且還買不到。二、三月間上述各地，人民被餓死所逼迫，相繼發生幾千人以至幾萬人的米風潮，怒打米店，但是國民黨當局命令軍警以刺刀『保衛着由人民膏血所積成的米店倉庫。』（見四六年六月十一日東北日報，人為的飢荒）最近在江蘇、安徽、浙江、四川西部、西康東南等地又已釀起農民的反抗運動了。在解放區周圍則有大批的災民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向解放區逃來。

當然在淪陷過的地方日寇的燒殺掠奪，曾是造成飢荒的原因之一；但是更主要原因却是國民黨當局自己製造的。例如河南，國民黨大軍雲集，強徵糧食，以至食糧殆盡。例如廣西，向來依靠外來的糧食，但因國民黨軍霸佔車輛，供作軍運，以致糧食，無法入口而加重災荒。其他地方或由于國民黨拉夫抓丁，以致農事荒閑；或由于苛捐雜稅，官吏的貪污敲榨，以至民窮財盡。再加上巨商富紳從事操

縱，這些原因則是飢荒產生擴大與普通的真正來源所在。上海經濟學家指出：『征購軍糧和造成投機操縱，實爲促使糧荒飢荒深刻化的重要原因。假使政府施政無所改變，只有再惡化下去的。』（見四六年六月十日東北日報）

七 結語

看國民黨一黨專政，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殘餘勢力在政治上經濟上的重重壓榨，已使中國人民到了如何水深火熱飢餓死亡的地步，已到了如何嚴重的程度。這難道就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嗎？這種法西斯的一黨專政難道還不應該立即廢止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對中國人民的壓迫難道還不應該去掉嗎？中國人民要活命。要不當奴隸牛馬，要國家民族的獨立富強，只有立即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廢止這種殘民以逞的法西斯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使中國走上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解除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對人民的兩重壓迫。

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

第四節 解放區的工商業

一 解放區的工商業蓬勃發展

爲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爲了支持前方作戰與繁榮解放區，爲了使解放區人民由貧弱走向富強，這些年來解放區政府用保護扶助和獎勵的辦法，動員了公私的力量和資本，提高了工人的待遇，調節了資本家和工人間的關係，發揮了工人對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一致爲發展工商業而奮鬥，是獲得了巨大而不可計量的成績的。

以陝甘寧邊區爲例，近年來，邊區在敵人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封鎖之下，在非常貧脊落後，毫無工業基礎，抗戰前除僅有百人的修械所被服廠外，一無所有的條件之下，到四四年爲止，已發展到了有七十七個較大的工廠。其種類在重工業和化學工業方面有鍊鐵，煉油，修造機器槍械，配製彈藥軍需，製造玻璃，硫酸，酒精，陶瓷，肥皂，輕工業方面有紡織，被服，造紙，火柴，製藥，皮革，

印刷、木工等等。其他的小工廠小作坊則還更多，煤、鐵、石油等礦廠和鹽業尙未計算在內。工人數目也從抗戰前的百人左右到有一萬餘人。工業產量逐年激增。如四五年全邊區布疋產量即爲四三年時的四點七倍，爲三八年時的一百二十五倍，紙的產量爲四三年時的三倍，爲四〇年時的二十倍，並且質量也逐年提高了。邊區的工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逐漸脫離了過去工業品完全仰給外面的情況。在過去抗戰與被封鎖的環境中，向着工業品全面自給的目標邁進。

我們從過去的非常落後的基礎出發來看，從邊區所處的遭敵頑封鎖的異常困難的條件來看，那個成績是多麼的驚人呵！解放區的這種工業建設對於堅持八年抗戰的勝利和解決解放區人民的物質困難是起着巨大作用的。但這些老解放區的工業，也因為是處在農村，頻繁的游擊戰爭環境中，遭敵頑的封鎖，再加上在以前長年的舊中國政權統治之下，工業基礎異常落後；由于這三個條件的限制，所以雖然歷年來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水平還是很不夠的。

在反攻階段中，我們解放了很多有相當工商業基礎的中小城市和一些大城市，解放了很多中國著名的重要礦區，在迅速的恢復與發展之後，目前整個解放區工礦商業的陣容已煥然一新，比前壯大了。

以新解放區的工業來說，拿烟台爲例：該市戰前以鐵工、紡織兩業著稱，鐵工廠有廿八家，解放後增至卅家，已超過戰前。在敵僞統治下拍賣機器，推小車爲生的廠主，現在已紛紛重振舊業，目前正積極擴充機器、招收工人擴大生產。戰前該市有紡織廠五十三家，敵佔後減至卅一家，解放以後

五個月，即增至五十九家，已超過戰前規模。歷史悠久的張裕釀酒公司、昌興火柴公司，敵佔時均停工，現已復業。昌興火柴公司復工月餘，月產量由三十六箱增加到六十九箱。擁有三十萬人口的鴨綠江邊的安東市，截至本年三月中旬：公私營工廠作坊一百餘家開工，復工工人達一萬三千餘人。其中規模較大的鴨綠江造紙及安東紡織廠，各有工人二千五百餘人，大東被服廠，過去每年只作軍衣三千餘套，現在一個月即作棉衣三千餘套。再以張家口爲例：敵寇建立的輕工業有五十餘廠，現已大部復工，其他私人經營的中小工廠，僅麵粉業在半年中即發展至九十一家（手工業作坊不在內）。而產量都在迅速增加着。

礦業方面來說，解放區有不少中國著名的礦藏，如山東的淄博煤礦，南豐鉛礦，鐵山鐵礦，新汶線煤礦，晉冀魯豫之焦作，六河溝煤礦，長治晉城煤鐵礦，晉察冀的鷄鳴山煤礦，龍烟鐵礦及東北各地的礦產等等。由于工人的積極保護與民主政府的扶植，敵寇的破壞並沒有使這些礦藏毀滅與停頓，大部份經過短期修復即已開工，而且產量日漸增加。焦作煤礦復工時，日產量爲四百噸，二月份即增至六百噸，且在不斷提高。山東博山博大公司煤礦，敵我攻奪數次，本年一月恢復生產，開工二十餘日，日產量保持在高噸以上。公私合營的察省寶興煤礦解放後，日產二百噸增至六百噸。除了這些規模較大的近代礦場而外，破敵偽沒收，統制限於破產停頓的中小煤礦業，已在解放區普遍恢復。察省中小煤礦二百餘處均已開工。山東淄川開採小煤井，已有一百五十餘處出炭。每井平均產量一

百五十萬斤，五千工人藉此得以維持生活。此外各解放區內各種較小規模的礦產，也均已普遍開採，而且在迅速擴展中。東北各地的礦產也都在迅速恢復與發展中。

再以商業來說，各地新解放的城市，商業上普遍的都從敵寇統治時的蕭條走向繁榮了，例如張家口市敵寇統治時只有商號一千九百八十一家，解放後至西六年四月已增加至二千七百十六家了。（見西六年六月十一日東北日報）

工礦商業在解放區不但抗戰中有了驚人的建設成績，同時在反攻勝利後的新解放區，也像雨後春筍似地迅速恢復與蓬勃發展起來，工廠礦廠商店公司等不斷興建，生產品生產量質量日新月異的提高，顯示了蓬勃的朝氣與無限發展的前途，完全不同於國民黨統治區內在帝國主義與金融買辦官僚資本的摧殘下民族工業奄奄一息，工廠停工，廣大小手工業者破產失業，生產日益萎縮的情況。

二 中共的工商業政策

爲什麼在解放區的工商業建設上能獲得這樣偉大的結果呢？這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區的民主政府實行了中共所主張的『發展工業生產與商業流通，獎勵私人企業，保護私有財產，歡迎外地投資，實行自由貿易，嚴禁對壟斷統制，同時發展人民的合作事業，扶助手工業，發展工商業政策。』（見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十七條）解放區的政府，工業界人士，技師職工等，實際的執行着中共的發展工業

的政策，對於發展工業生產，下了最大的努力。抗戰中間他們在埋頭苦幹中，努力克服種種困難，發揮了無數的創造性並產生了很多的集體主義的英雄和模範。他們積極自覺地以自己的血汗建設起了偉大的工業生產的成績。例如有偉大意義的創造，用馬蘭草造紙，自力更生地解決了敵頑封鎖所造成的紙張困難，再如在困難條件下創製了炮彈等等。總的來說，他們把工業生產大大的較前提高了。

解放區的工商業包括有公營私營和公私合營的三種形式，其中公營事業起着領導和骨幹的作用，這種公營不同於國民黨統治區的所謂『國營』，而是屬於人民大眾的，並非屬於少數大地主大官僚大資產階級的，它對於私營和合營的事業，並非是壟斷排擠吞併，而是合作扶助，促進私人資本的發展，以合力提高中國社會的生產力。

解放區的私人資本，獲得了政府銀行的大量低利貸款的帮助，不同於國民黨統治區內工業家痛感資金缺乏，及受重利剝削的情形，即以四六年的貸款數額為例，晉察冀邊區發放的工商貸款已達二十八萬萬元；察哈爾省本年生產會議上決定工礦貸款五千萬元，貸糧兩萬石；山東省政府對工商漁鹽各業的貸款亦達十萬萬元，他們沒有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的重壓，而只要繳納很輕的統一累進稅。在陝甘寧邊區等地創辦工業者享有三年的免稅優待，在晉察冀邊區等地規定公私礦業全部免稅，各種工廠所納營業稅只有其賣錢的百分之一，所得稅亦按其獲利之多寡而有不同的規定：最低者（每半年收入不滿三千元者）只納百分之三，最高也只納百分之三十。（每半年收入在六十萬元以上者）這種輕稅

和免稅政策也是促進私人資本發展的有利條件，他們還不受像國民黨政府那樣的統制，專賣政策的壟斷摧殘，而是可以自由生產自由買賣，他們還不受如國民黨統治區內官僚買辦金融資本的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以及外國商品傾銷泛濫排擠和摧殘，而是處處受到政府的獎勵扶植和進出口保護稅制的保護。在這種稅制下面，解放區政府獎勵必需品禁止奢侈品的輸入，獎勵某些過剩物品與禁止需要物資的輸出，對某些非必需品的輸入，課以較重的稅，以發展解放區的工商等業。充裕人民物質生活，及避免和減少人民的不必要的消耗。此外，在新解放區，對於恢復與發展私人企業，政府更不遺餘力，給以種種照顧，如山東烟台昌興火柴公司復工後，政府除允許管理磷硝外（原係軍用品）並設法為之購買原料。威海衛的中威橡皮公司，北海銀行曾予貸款，助其採購膠皮汽油，市政府並幫助該公司買到膠皮五百噸，自行車外胎八百餘付。蘇中大中紡織工廠，去年恢復之初，民主政府曾每天供給棉花十石，每月供給糧米三十石，助其復業，其產品一半也由政府訂購，這樣該廠復工初期供銷困難得以解決，在晉察冀、晉冀魯豫等解放區，民主政府為獎勵發展私人企業，更將公營企業二十四廠轉讓私人或吸收私資實行公私合營。在新解放區，還把日偽強佔私人的工廠交還給原主。

由於這種工商業政策實施的結果，不僅公營企業如銀行，大礦山，大工業，大商業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且私人資本也獲得很順暢的發展，他們保證獲得正當而豐富的利潤。大量的小手工業小作坊及合作事業也得到普遍的發展。家庭手工業如紡織業也很快的發展起來，在這種蓬勃發展之下，生產力

就空前的提高了，社會就日趨繁榮。

例如陝甘寧邊區三邊區的元華毛織工廠，由當地富商數人開辦，要求政府投資三分之一，公私合辦，四〇年以十二萬元資本開始，到年底盈利就有三十四萬元。四四年獲得大發展，大大吸收群眾股金，年底獲得了二千六百萬元的紅利。四五年整個的業務更走向縣家的合作。商人，工人，職員都積極入股，四五年時就有資本七千四百萬元。經理靳體元老先生當選為邊區參議員，鹽池縣參議會副議長，獲得了邊區合作事業英雄的光榮稱號。

在商業方面，如延安市在抗戰前僅各種商店一二三家，四三年時即達四七三家，增加了四倍，我們看延安經商近四十年的蔡奉璋老先生關於延市商業的談話：『幾近年來延安商業發展得這樣快，實在是驚人的，榮興昌的老張，老范，天興瑞，姬天保，以及商會孫會長等這幾家子，原先都只是十幾，幾十塊本錢，擺個小攤子，到現在不過五六年工夫，竟發展成一兩千萬了。三四年內白手起家的亦不少，如中興昌的王獅子，新市鄉的井泉旺等，原先是工人，還有萬福店老王是退伍軍人，現在都已發展成爲中等商人。要不是共產黨，能把陝北弄的這樣發達，這實在是萬萬不可能的事。』

『說到負擔，現在可說是輕而輕了，我過去（指革命前舊政權統治時候）一年至少要負擔三百元，值當時的市布要抵二十多疋，如今延安的頭等商人，亦不過負擔五六疋布的钱，今年的營業稅還普遍減低了。公家生產有了基礎，就減輕人民的負擔。在戰爭時期，負擔還能往輕處走，不要說中

國，就是外國恐怕也少見，在國民黨統治區，從成都到樂山（四川的一條公路線），一路上就有五十多個關卡，這樣的環境，商人怎能做生意呢？

「我們的政府，還多方注意扶植小商人，如這次驛馬大會，銀行合作社，撥款四千多萬元低利借給小商人幫助他們發展，政府是唯恐人民不發展，有這樣的政府在，人民還怎會不發展呢？」（西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日報）

再看陝甘寧邊區慶陽縣商會會長賀新民先生講慶陽的商務：

「民國二十七年八路軍沒來以前，那時的情況怎樣呢？

一個偌大的慶陽縣城，東西南北四道大街才不滿七八十家店子。舖面開一家，關一家，這不是沒有原因的：譬如，兵匪不分，要領個營業執照，還得找個老總幫領，七八十元明的一份，又一個七八十元暗的一份，時常又有攤派下來的二三百元，苛捐雜稅，不計其數。這樣做買賣能成嗎？大戶走了，小戶站不住。

現在的事情又怎樣呢？

東街西街是滿滿的。南街北街也是滿滿的。從前一個店面，今日開成兩個店面。要做生意的人給房東說：『讓個地方給咱也開上一個門面吧！』這就是說，買賣不比從前，有個做頭了。

幾年來店子增加了一倍以上。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譬如說，你的買賣本錢不够，一時攪不開，在共產黨八路軍沒有管事的地方是有倒閉的危險的。可是眼前有革命政府在，不要緊，它會照顧你們一把：銀行給借個八九十幾萬元能成。苛捐雜稅是沒有了啊。營業稅也很輕，這樣，慶陽的商業就一天一天的上昇了。

咱們邊區的商人是靠八路軍發的』（見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日報）

在抗戰勝利後，和平建設的條件下，在解放區掌握了很有相當工礦商業基礎的中小城市和某些大城市的條件下，解放區的工商業在中共的正確政策領導之下，將有而且已開始有更長足的發展，私人資本也有了更大的投資，如蘇北民主工業家龔應龍等十七人，興辦鹽業公司，並吸收各地商民及工業家投資，完全爲民辦性質，資本總數法幣十五萬萬元。張家口蒙漢實業家開辦內蒙實業公司，資本數法幣三萬萬七千萬元，其他的還有很多，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小資本家因受買辦金融官僚資本的壟斷排擠和外國商品大量傾銷的摧殘，大批的破產，也有很多將其資產移到解放區來興辦工商業了。

解放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首先決定於中共這一個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工商業政策，至於中共爲什麼採取這樣的政策呢？它的根據正如毛主席所講：『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的建立輕重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地位升到工業國地位上去。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們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倍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佔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

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們的基礎，所謂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是不能鞏固的。」又說「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爲甚麼不怕資本主義，而是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發展資本主義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統治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與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及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國家與人民，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

三 中共的勞動政策

解放區工礦業之所以蓬勃發展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於解放區政府實施了中共所主張的「調節勞資關係，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工作制，增強勞動生產率，適當的改善工人生活」的政策。目前各解放區工人的工資，較之過去已增加了一倍至數倍，一般的工人都領取實物工資，不受物價變動（特別是戰時）的影響。以陝甘寧邊區來說城市手工業工人實際工資四四年時比戰前提高了一倍半至四倍，公營企業工人的實際工資則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八點，至百分之八十四，但公營企業工人的醫藥、文化

和娛樂等費，勞動保險和社會保險都由公家負責。他們組織起自己的工會，保障和代表工人們自己的利益，他們有俱樂部，組織各種工餘的體育娛樂和文化活動，有各種球類，游泳，滑冰，話劇，平劇，唱歌，牆報等。許多不識字的現在識字了。有的工廠工人在禮拜六還組織跳舞，在抗戰期間，能有這樣的工人生活，世界上除掉蘇聯以外，沒有那一個國家可以比得上的，與國民黨統治區內工人生活比較，則更有天壤之別，現在解放區各地工人的工資大多經過廠方，工會，以及工人們廣泛民主評定，因此最能達到合理公平。

某些工廠已開始採取了累進工資制，其辦法是按着技術人力等具體條件，規定了各人每月生產基數，產量在生產基數內發給固定工資，超過基數按級累進，這樣比較更合理的照顧了勞資雙方的利益，刺激了生產的發展。採用了這一辦法的張家口信生織布工廠，一月份產量較之過去即超過百分之四十四，裕盛東記織布廠，僅二月份開始實行了累進工資制，日產量由十二疋增至十七疋，該月份將使廠方多獲二十萬元以上的利潤。

另外某些公營或合營的工廠，還採取工人分紅和工人入股的辦法，每年工廠賺得多，各個工人自己生產成績多，分紅亦就分得多。因此工人們對工廠更愛護了。原料成本儘量求節省，質量儘量求提高，產生了或增加了對工廠的主人感。吸收工人入股的辦法，則更使工人也成了工廠的主人，因此工人們的待遇更提高了，隨之工人們的生產情緒也就更提高了，廠方的利潤也同時增加了。

工人們不僅物質生活改善了，並且政治社會地位也有顯著的提高。他們已不像舊社會裏被人卑視如奴隸牛馬，他們和農民一起已被認作最神聖的財富和世界的創造者，是中國抗戰和民主建設專業中最積極最堅決最革命的成份，他們已到處受人尊敬。他們也平等的享有參政權利，並且表現最積極，他們中很多人當了各級參議員參加政權工作，如陝甘寧邊區工人勞動英雄趙占魁就是邊區政府的參議員，其他的還有很多。再以解放後東北的例子來看，如本溪湖煤礦工人代表五人被選為本溪市參議會的參議員，總工會副主任高崇義被選為三區副區長。工人們不僅有說話做事參政的權利，並且還經過他們的工會組織參加管理工廠，在公營和合營的工廠中許多工人已提拔當了廠長、股長和職員，這也使工人更增加對工廠的主人感，更加愛護工廠。像陝甘寧邊區中央印刷廠的青年工人李平，就當過工會主任，廠長，又是邊區政府的參議員，下面就是他的自述：「我十五歲到華陰兵工廠做工，不到兩年工廠關了，我失業後在長安街頭流浪，常常兩三天沒飯吃，有時去當修馬路的小工，每天工資兩毛錢，只能吃冷饅頭，喝冷水。我到了邊區，我就再不感受失業的威脅了。我在十五歲時還是一字不識，在兵工廠辦的工友夜校讀了一年半的書，到了邊區，工廠很注意我們青年工人的教育，規定青工每天做工六小時，學習兩小時，並由工廠供給我們工人課本和紙筆，在這六年來，我在工廠中不僅學會了一門排字的技術而且把文化政治水平也提高了，我是一個普通青年工人，就在工廠教育之下，也使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我在二十歲時，由于我勤快的勞動，工友們就選我為工會主任，二十

一歲被提拔起來做呂梁印刷廠廠長，二十二歲又被選爲陝甘寧邊區參議員，我今年二十四歲，假如我不到邊區來，那裏會有這樣好的工作學習環境，我相信我一定還只是一個糊裏糊塗的小工。」現在他已是東北印刷廠的廠長。

這樣，解放區的工人，由于中共的正確政策實施的結果，在經濟生活上、政治上和社會地位上都得到了改善和提高，也就是開始翻了身。他們受到了革命的好處和中共民主政府所給他們的教育，加上其自身的體驗，他們一般的都有很高的政治覺悟，他們知道共產黨就是他們工人階級的政黨，他們堅決擁護與跟隨着共產黨所指的道路和各種主張的設施做去，他們自覺的積極的爲抗戰與解放區的民主建設，同時也是爲了自己本身利益而加緊生產在民主政府的動員、組織和獎勵之下，各地工廠普遍開展趙占魁（陝甘寧邊區特等工人勞動英雄）運動，他們的生產情緒更高漲了，熱烈地展開革命的生產競賽，發揮了許多技術上、工作上的創造，產生了大批的勞動英雄，大大的增強了勞動生產率。如四三年延安難民工廠的生產數量就逐月提高，五月份生產土布五五二疋，六月份生產六五〇疋，七月份生產九〇八疋，八月份則超出一〇〇六疋，而生產人數和工具較前減少了百分之十。陝甘寧邊區各工廠四三年的工業生產量較四三年一年中的增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個別工廠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華中某工廠一年內產量增加了六倍，而質量還都大大的提高了。

在新解放區，例如解放後的本溪湖礦工，有的工人堅持做兩班工，工會怕損害了他們的健康，勸

他們少做些，他們說：『現在是給自己幹活，應該多作些，不要說還多給工資了。』遼東賽馬煤礦自發起競賽以來，經全體職工努力，已超過任務四十六倍。（見四六年六月十八日東北日報）張家口，宣化各公私營工廠工人，也掀起了大生產競賽熱潮，鈺牲麥粉公司每日產量由一百卅餘袋增至三百袋，廠方兩月贏利一百餘萬元。益發鐵工廠由三日鑄一爐，出鐵一千餘斤提高到兩日鑄一爐，出鐵三千餘斤。交通麥粉廠則一直保持增產百分之六十五的生產計劃。新察哈爾報印刷廠裝訂工人過去每人每日平均摺頁子一千餘張，現增到三千五百張，排版工人工作效率提高一倍，錯字訛誤等現象大為減少，隨着生產大競賽工人學習技術的熱忱大為提高，努力克服各種困難，改進工廠生產條件。張市電話局自動電池損壞後，工人們發揚創造性在短期內試驗改裝蓄電池成功。宣化工人都紛紛發起『愛廠運動』願協助廠方從事各種建設，勞資間極為融洽團結。振華麥粉廠工人自動放棄休假，幫助廠方修理車間，並發起節省材料和燃料運動，廠方為酬答工人們這種高度生產熱忱，規定出標準生產量，超過者加累進工資獎勵，所節約的原料和燃料大部也歸工人。肥皂廠工人提出每日增加二小時的勞動口號，廠方為照顧工友健康，只允許增加一小時，除去產量超過任務，品質優良者獎予特別工資外，並改善工人伙食。工人待遇改善後工人勞動情緒提高了，對工廠也愛護了，產量和廠方的利潤也就增加了，勞資間關係亦趨於團結了，所以資本家也說：『工人增資似乎對我們不利，但工人生產情緒因此提高起來，實際結果却反而對我們更有利了。』

四、新民主主義政治造成經濟生產力順暢發展的條件

雖然目前國民黨方面對解放區發展建設所必要的各種物質裝備實行拚命的封鎖，但是這些困難是不能阻止解放區建設發展的。因為在這裏有中共及民主政府發展工商業的正確政策，有廣大工人群眾的熱情智慧與勞資的合作，而這些解放區工業生產力發展的最基本與可靠的動力，是反動派無法封鎖的。

總之，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下，無論公營、私營、合營的工商業，都有極大的發展前途，生產力有了順暢發展的條件，向着工業化的前途大步邁進。這與國民黨統治區內，在大資產階級壟斷統治政策之下，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之下，中小工業沒落，廣大小手工業者破產，工人飢餓死亡的情況有根本的不同。

第五節 解放區的農村經濟

一 減租減息增資政策和農民減租鬥爭的勝利

在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中共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幫助人民獲得了解放，人民自己在中共領導之下發動和組織起來，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在敵寇，漢奸，貪官污吏，土劣，惡霸的統治下翻

了身。他們採納和擁護中共所提出的爲廣大人民利益的減租減息的農業土地政策，並通過自己的政權來把它實行了。

這種土地政策，就是一方面交租交息，一方面保障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一方面又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這一政策的實行，減輕了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提高了農民的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而又聯合了地主一致抗日和共同參加民主建設。爲了動員全民參加抗戰和民主建設，如果不實行這個正確的土地政策，不改善廣大農民的政治、文化，特別是物質生活，從經濟上給以援助，使他們從重重的壓迫剝削下遂漸獲得解放，從奴隸、牛馬、飢餓、死亡境況下超脫出來，那末他們便沒有精力和心情來參加抗日戰爭和民主建設，而如果没有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群衆自覺的積極的參加抗日與支持，則解放區的創造，堅持和爭取抗戰和民主建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對於僱農的政策則是增加其工資，改善其生活，並規定十小時工作制，亦以提高其勞動和抗戰建設的積極性，並改善僱農與僱主間的相互關係。他們有自己的工會組織，團結全體僱農，爲僱農自己的利益辦事。

減租率的規定是以減去原租額的百分之二十五爲原則，即所謂「二五減租」，或叫「四一減租」，而減租後的租額又規定不得超過收穫量的百分之三百七十五。（按：國民黨政府土地法第一七七條明

明寫着：『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穫總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只是空說不做僅欺騙而已。實際上只有不斷的增加地租而根本沒有減租這回事。減息是對於解放區政權建立前成立的借貸關係，爲適應債務人的要求除去高利貸對廣大貧苦人民的重重剝削，並爲團結債權人一致抗日和共同參加民主建設起見，規定以一分半爲計息標準，如付息已經超過原本一倍者，停利還本，超過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即所謂『分半減息』，舊租舊欠對於貧苦農民是愈積愈多，吸盡了農民的血，使他們永遠抬不起頭來的。『八斗九年三十石，十個騾子馱不完』，這是他們對高利貸的罄心的傷心話。某人在光緒年間欠下的七兩銀子及十二吊麻錢，利錢已超過原本十八倍以上，但本錢始終無法還清，並越滾越重，現在則一筆勾銷了。但對於以後新成立的借貸關係，則政府也不規定過低息額，而是根據當地社會經濟情形，由民間自行處理，以免借貸停滯，不利民生。

抗戰以來，在敵後不斷的殘酷戰爭環境中，各解放區已普遍地實行了減租減息。在東北等地的新解放區也都已由政府頒佈了減租法令，實行了減租或正在積極推行中。農民們自己在政府領導之下發動起來組織了『農會』或『租戶會』。掀起了熱烈、普遍的減租運動，並向少數頑固地主進行了講理鬥爭，在群眾力量的鬥爭下獲得了勝利，退回了租子改訂了新約，領回了被地主強佔的和贖回了被地主用高利貸或典地方式巧取掠奪的土地。農民們已認識到並非自己靠地主養活，而是自己流汗勞苦換來的糧食養活地主的，自己是神聖的創造世界的勞動者而地主則是寄生蟲。即以解放後東北安東省的

例子來說，到四六年四月爲止，安東各地已退還租糧數十萬石，押金一百萬元之多，而減租運動還在方興未艾中。他們已從被壓迫得有些畏畏怯怯不敢說話的情況下昂抬起頭來，挺直了腰幹。人衆勢大他們有了說話的權利和力量了，他們敢于和地主爭理和鬥爭地主了，他們再不低首下氣了。這是幾千年受壓迫以來的一個偉大的翻身。現在舉一個農民鬥爭頑固地主的實例如下：

四三年陝甘寧邊區綏德縣舉行兩個區的佃戶地主大會，城裡的地主亦前來參加，各校學生出席旁聽，共達三千五百多人。佃戶們對於這次減租大會，情緒均極爲高漲，佃戶王漢章說：『咱幾輩子沒有出過頭，今天咱翻身了，我要給地主講道理！』張懷德說，『咱要鬥爭地主王樹丁，他不按法令，多要我的糧，今年他還要夏麥租，老財們吃的好，穿的暖，窮人家，多要一斗米，就是要我的命呀！非鬥爭不行！』

大會開始選出了主席團，主席簡單說明了開租戶地主大會的意義後，新店三鄉租戶繼即提出王紹渭當過壞地主王樹丁的狗腿，要求他揭發王樹丁欺壓佃戶的事實，王紹渭上台說：『我給王樹丁當過奴隸，他要我到處壓迫老百姓，收租時我抹斗抹的很高，不管佃戶高興不高興，馱回來了，也不上賬。』說到這裡群衆恨極了。他又說：『王樹丁拿出個大斗給我用，這個斗比市上的大一升多。還把佃戶按條例減下的租了，留在賬上寫作欠租。他叫我做下的壞事實說不完。……』全場佃戶聽了非常憤激，要求王樹丁上台講話，王樹丁上台氣憤憤的不承認他用過大斗，群衆都一齊起來了：『

斗大一升，抹高一寸，大家都知道的，不說不讓你！」佃戶張懷德說：「你要租子時，我說家裏沒有綠豆，你一定要綠豆，三十年要夏租，今年又來要哩！」王樹丁在群眾的鬥爭下，還想鬼混。田巨川說：「二十九年，三十年你都多要下了，我交的租子，都留賬，請大家看看。」他馬上在口袋裏摸出賬本來，唸給群眾聽。王樹丁再沒辦法抵賴了，只得承認：「是多要了，我多收下的全退給你們。」張德雲訴說：「二十九年時他又要了糧，三十年又要夏租，今年來要夏租沒給他，到城裏時，被他擋住，強要了八百元。」……在全場的憤激下，王樹丁承認錯誤說：「我錯誤，以後政府作保證，多下的我就退，多要了什麼，退什麼。」

在群眾鬥爭下，揭發了壞地主王樹丁歷年來抗減租法令的破壞行爲，大家一致高呼：反對壞地主壓迫窮人，要求政府處罰他；有的提出罰三百石米，在群眾熱烈要求之下，主席團出來調解，提出處理的辦法：一、他多要下的糧，統統退回，多收甚，退甚，二、他不遵守減租法令，同意大家意見，罰他五石糧，三、由農會領導去算賬換約，盤糧。大家同意了主席團的意見。

王志明給壞地主高鳴九當狗腿，高鳴九叫他經管土地，老百姓都叫他做「地經理」！他仗地主的勢力剝削窮人，農民租種高鳴九的地長下糧食，一定要搬到他的場子去打，分糧時，一石糧他要抽一斗，每到一村莊收租子時，要雞蛋白麵吃，還要炒瓜子，吃醉棗。不然，地就被抽走。王戶一一揭發其罪惡時，群眾高呼，反對王志明「溜溝子」貨！新店區的佃戶們一致要求把他趕出新店，王志明只

得支吾承認錯誤：『你們所說的，都是我做過的事，我也是受人支配，我當狗腿不得已，我也是窮光蛋，以後再不做了。』全體租戶們都認識了給地主當狗腿是最卑鄙的事，群眾高呼：『歡迎王志明轉變！』團結起來，不要學當狗腿的人！』于是佃戶們高度的憤恨，轉到壞地主高鳴九的身上了，他到處破壞減租法令，壓迫窮人。有一個佃戶提出：『前幾天，高鳴九聽說要開減租大會，便請了十幾個佃戶，到他家裏吃餛飩羊肉麵，在吃麵的時候，他向佃戶說：『開會時，你們千萬不要鬥爭我呀！』企圖收買佃戶，繼續他破壞減租法令，剝削窮人的勾當。』租戶馬恩昌訴說：『高鳴九叫狗腿王志明，把我們莊的佃戶壓迫結實了。我租他十二垧地，現在只剩下二垧，今年高鳴九圈葬，動員新店區的租戶，給他們做奴隸，做了工不開工錢，我的哥哥給他圈葬做了五十多天工，一個工錢都不給，有一天看見他，想向他借點錢來買炭，他說：『我使喚你是鼻子流在口裏，還要什麼工錢，給工錢就輪不上使喚你的了。』他還打算抽地，你們看他講什麼良心，把窮人磨結實了。』租戶們一個一個的申訴地主高鳴九這幾年來，多要了他們的租子。結果是多要了什麼叫他退什麼，需要歸回土地者由農會去處理。

租戶馬生才控訴說：『廿七年六月時，瓜已開始熟了，地主王毓琪指定我，摘下瓜一定要挑到他舖子上賣，我就挑上一擔去，幾天，還賣不出，我就挑到別的地方去賣，這樣，他就不高興了，第二天，他到我車裏，一跳五尺高，大喝一聲，說我摘瓜不告訴他，就用脚把半垧瓜都踢掉了，將瓜用兩

個牲口擄回城去，但瓜都是生的，他就喂了牲口。你們想，窮人家半坵瓜，八月糧接不上就靠瓜養活全家，擄走了，要我的命呀！那時，又是他們當上聯保主任，有什麼辦法呢，只有眼淚往肚子裏流，哭了幾天……唉！今天咱不怕了，我要伸冤，非賠不成呀！」馬生才說的落下淚來，全場極爲憤恨，一致高呼：『王毓琪壞東西呀，非賠不行！』全場要求王毓琪講話，王毓琪承認了錯誤，答應按當時市價折米賠給佃戶。另一個佃戶說他除了租子外，地主向他多要了二十畦菜，二百個茄子，二十條黃瓜，二百個南瓜。馬光奇控訴說：『民國十年時，借了王毓琪一百二十元，三分多利，利上加利，到十六年就要我擱下八坵地，二十九年我要按法令贖地，他不肯給我抽地！』（群眾高呼：反對壞地主利滾利剝削我們窮人呀！）全場通過擄了的地多要下的租子要往回退。擄的瓜要折價賠償，並請求政府處罰他。

大會第三天，中共綏德縣委書記講話，他說：『四十里舖的租戶，也在開這樣的大會，開的也很好，減了租，大家就能吃上穿上，大家想一想，國民黨在時，實行減租沒有？（租戶們齊說：沒有！）誰實行了？（齊答：共產黨！）是的，所以大家要跟上共產黨走。你們看八路軍來後，老百姓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好了，將來還要更好。（群眾高呼：擁護中國共產黨！）這次證明了，只有租戶們團結起來，什麼事情都能夠辦好，大家組織起來了，一定能徹底減租減息，大家回去後，農會要領導起來，真正減租，再好好準備明年生產。大家回去後，用這個會的辦法，繼續貫徹減租鬥爭，大家一定要幹

澈底。大家都要努力生產，團結農村各階級力量，保衛邊區，堅持抗戰。」（群眾高呼：租戶們組織起來，澈底減租，大家團結一致保衛邊區！）（見四四年一月二十日延安解放日報）

在這樣減租減息以後，農民們的情緒就非常高漲，例如安東省一個佃戶孫大娘說：「俺年年燒紙燒香敬神，年年窮得不像人，現在共產黨來了，民主政府替俺作主減了租，要沒共產黨，俺一輩子也不會翻身啊！」熱河省平泉縣小寺溝佃戶在減租勝利後，狂喜地說：「我們好比一盞燈，油快點盡了，燈快滅了，幸虧共產黨給添了一股油，這盞燈就明亮了。」

一方面是有共產黨和民主政府的領導，才有人民的翻身，但另一方面，這種群眾鬥爭的勝利，貫徹和鞏固，決非依靠共產黨和民主政府工作人員的恩賜、包辦和代替群眾的鬥爭所得到，而是由於群眾自己的鬥爭所取得的，群眾已認識到自己力量的偉大，也充分認識到組織起來的重要，因此他們就緊緊地團結在農會的周圍，跟上共產黨走。

二 減租減息增資後大大提高了農民生產抗戰與建設的積極性鞏固了農村

中各階層的團結

現在解放區一般的租率，以晉察冀邊區為例，已減少了原租額的三分之一。經過減租減息與增資以後，廣大農民已從以前的貧困悲慘的境遇超脫出來。他們便有了精力和心情去發展生產，提高了生

產的積極性，同時，農民對抗日保家鄉保衛自己既得利益的情緒，也大大的提高，他們不僅組織起來，並且還武裝起來，他們踴躍的參加民兵、自衛軍，英勇的配合正規軍作戰，侵擾敵人，破壞交通，保衛村莊，圍困敵人據點，廣泛開展游擊戰、地雷戰，並熱烈的掀起參軍運動，更積極的參加民主政權和一切建設工作。對解放區的堅持與發展起了異常偉大的作用。

這個土地政策的實行，還不僅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和抗戰建設的積極性，及其對民主政府的熱烈擁護，並且也團結了地主階級，因為他們看到，在敵佔區的地主富有者，除了常受敵人打罵勒索，妻女被敵人姦淫等恥辱外，還要被迫交出超過他們總收入的苛重負擔。河北定縣瀛白村一家富農，四二年對敵負擔佔其收入的二倍，平山西回舍一家地主，四二年對敵負擔佔其收入的四倍，而逃到國民黨區去的地主，也受到反動派政府的敲榨勒索，苛重負擔，甚至有的無法生活。因此有些因最初不了解中共及解放區政府的政策而逃到敵佔區或國民黨統治區去的地主，自施政綱領頒佈以後，了解了解放區的減租減息，交租交息政策，並知道在他們逃亡期間，政府還幫他們代管土地，代收租子，回來時還都交給他，他們就都回來了。有的甚至拿了施政綱領到北平榆林等地，去動員留居該地的地主回邊區。例如陝甘寧邊區志丹一縣到四二年止已回來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河北行唐歸來的地主中有擁地達四千畝者，華中的地主也有百分之九十五來歸。四六年蘇皖邊區新解放地區淮安等縣，已有二百名地主及商人，因在國民黨統治區無法過活，先後逃回解放區，其中地主張守舍稱：國民黨軍強派慰勞

大批幣票，被勒索五百萬元。又一地主，被誣所謂「私通新四軍」罪名，罰米二百石。又據商人李戴平稱：他到揚州販鹽，鹽船遭國民黨扣押，索去賄賂二百二十萬元。請客酒席費五十六萬元，他們都說「國民黨棺材裏伸手死要錢，我們再也不去了。」（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新華社延安電）

又如華山解放區某些地主商人，被國民黨特務騙至「收復區」，於受磨難後，又陸續返回家鄉。射陽地主楊懷東到上海後，無法謀生流爲乞丐。淮安地主陳振華，全家討飯度日。射陽後井波高林才在上海慘遭兵車軋斷了腿，現全家遷回。鹽城王國清被國民黨拉去當兵，好容易開小差逃回。射陽王翼伯全家，有地五六頃，在上海坐吃山空，其家人流落在上海當砍夫、清道夫、三輪車夫、人力車夫等，俱備管壓榨，回憶解放區自由幸福生活，而川資無着，懊悔不已。對返回地主解放區民主政府與當地群眾，均予親切慰問，並給以救濟，幫助其迅速恢復生產。（新華社淮陰四六年六月一日電）

在解放區的一般地主，最初對減租減息也是用種種方法抗拒的：擔當政策普遍深入的進行了解釋及廣大群眾起來保衛了解放區，維持了社會治安，和保衛着他們的既得利益（連地主富農的土地和利益在內）的時候，地主便感激的說：「民主政府保障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少收幾顆租子，有甚關係。何況政府還獎勵與幫助我們向工商業和富農經濟發展呢。」的確，「少取幾顆租子」不僅是爲了抗戰保家鄉，和繁榮國家族，而且也爲了他們自己本身的利益，同時他們還有向另方面發展的出路。農民們的反映則是說，「一面改善生活，一面鞏固統一戰線，交了租可以顧住地主的

生活，這是應該的。」因此，土地政策實施後，不僅發動了廣大農民——抗日建設的主力軍自動的參加抗戰建設，提高了各階層人民的生產熱，逐漸削弱封建經濟，發展了新民主主義經濟而且也鞏固了農村的團結，和緩和了地主與農民間的尖銳矛盾。它是完全適合於中國抗戰與建國的需要的。

三 減租減息增資後農村階級關係的變化

減租減息增資以後，農民對於土地的要求和對於擴大生產的熱望大大地提高了，他們也就有興趣，並且有能力來不斷購買、典進或贖回土地，以前土地飛速的向地主富農集中的情況是結束了，相反的，土地是從地主及部分的富農手中分散。大部分農民已逐漸的得到了和增加了土地，僱農、貧農、農的上昇，已成了一般的趨勢。譬如貧農中的大部分現已昇到中農甚至有些昇成富農。

舉山東沂蒙區的一個例子來說，某莊農民朱富勝是一個上昇的典型。五年前他是一個貧苦佃農，家裏僅有一畝四分地，租種人家二十八畝，辛苦一年，全家不得一飽。一九四〇年減租以後到四四年他自己已有地二十三畝，有牛驢各一，肥豬兩口，四四年打糧六千多斤，除全家十一口人吃用和交公糧外，可餘糧七八百斤。（解放日報四四年十二月六日）

濱海區勞動英雄鄭信，在兩年的時間內，就由貧農上昇為富農。他說：「十幾年的破棉襖，又破，又重，去年叫我扔掉了，換了新的大棉襖。今年全家九口人，都做了新衣服，過年吃六斤肉，四

頓包子。我翻了身，這都是實行了毛主席的好辦法的緣故。」

陝甘寧邊區米脂印斗三鄉三十八戶租地的貧農，原來只有四十多垧地，四二至四三年這三十八戶贖回和買進典進地一百八十多垧，增加了原有的四倍半，綏德某鄉三十二戶，四〇年前所有耕地三百七十垧，只有三十多垧自地。四四年正月租地只剩七十垧，大部分贖、買或典進，過去自地只佔百分之八，四四年初租地只佔百分之十八點八，近幾年來一定又更上昇了。

地主經濟則逐漸削弱和下降，地主階級雖然還過着比較優裕的生活，但已感覺到坐吃地租已比不上轉業或自己參加勞動有利，因此有一部份地主自動轉化為富農的經營，或者自己已用僱工經營一部分土地成為經營地主，例如這幾年來晉察冀北岳區大部分中小地主都開始參加了耕種，又有很多地主將其土地變賣出去，放棄其封建剝削而轉向工商業或畜牧業。如陝甘寧邊區綏德延安畝十一家地主土地共一千七百餘垧，近四年（到四五年止）已典賣出六百一十九垧半。逐漸轉向工商業或自己耕種。

四四年來陝甘寧邊區來參觀的美國名記者愛卜斯坦，他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共產黨農業改革方面最有趣的結果，是地主的資本轉移到工業去。因為佃農富有了，同時又可向邊區銀行借得低利的信用貸款，他們常常購買土地來自己耕種。地主呢，地主收入比以前少了，但被工業投資所吸引，因工業是被獎勵免稅的。過去幾年諄諄教誨的新的看法，也已經起了作用，在邊區作為一個士兵，教員，辦合作社的，或者工業家，都叫起來很響亮的；但當他被認為是一個地主脫離生產不貢獻任何東西的

時候，是不覺得太舒服。特別是年輕的地主，開始覺悟到繼續這樣下去，是不愛國的。有一個把他的土地賣了投資紡織廠的人對我說：「土地不論是否爲我所有，總可以生產的，現在我可以用這筆錢來增加國家所需要的生產總量。」他也有了很好的利潤。」（見「我在陝甘寧邊區所見到的」原文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印度政治家日報）

在這種農村階級關係變化的情況下，產生了一種新型的富農，他們是由過去的貧農，中農或僱農在土地政策實行以後發展起來的。他們都是好勞動者，以自己的辛勤勞動發展起來。他們熱愛與擁護民主政府，贊成民主。他們有很高的生產熱情，並且還幫助與組織別人生產。如陝甘寧邊區特等勞動英雄吳滿有，原先是個貧窮佃農的，吃不飽，穿不暖，現在除自己辛勤勞動而外，還雇了兩個長工，種了幾百畝地，糧穀滿倉，牛羊成群，自己生活富裕，還幫助別人生產。由國民黨統治區逃來的難民，五年中間有二百戶人遷徙到吳滿有鄉，吳滿有協同政府和人民幫助他們窖洞、土地、農具、貸款。他們發展了，一百戶人已成了中農和富農。解放區已提出吳滿有的方向作爲全體農民發展的方向。

新舊富農是農村裏的資產階級，雖然他們自己參加勞動，但他們還要剝削僱工，中共及解放區政府的政策是在適當的改善僱工生活條件之下，獎勵富農經濟的發展，以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提高生產力。但中國的舊富農有其一部份封建性質的剝削，如出租一部分土地或經營高利貸，爲中農貧農所不滿，所以在農村中實行減租減息時，對富農的租息也一樣照減，近年來他們

也逐漸放棄其封建部分的剝削而安全轉向於富農生產去了。

四 解放後的東北分配敵僞土地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

在解放後的東北，除了減租減息以外還進行分配敵僞土地（他們多年來從中國老百姓手中強佔或變相強佔去的土地）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工作；經過分配以後，大部分的農民都獲得了土地，越是貧苦的，獲得越多，現在以東豐縣鎮安村的例子來說，無地或少地的九百九十八戶四千七百七十四人，分得敵僞土地二萬九千七百四十三畝。是按貧苦的程度分等級來分配的。如果平均來說，每戶分得三十畝弱，每人分得六畝二分強。按該地上中下地平均之平年產量，每畝收糧五斗，這說明一貫過着窮困生活的農民，每人（小孩在內）每年將獲得三石以上的食糧，衣食確保無虞。分完地後，農村階級成份，起了根本變化，約佔百分之十五的僱工，與佔百分之六十的貧農，現在都成了自耕農。原來靠租種敵僞土地而由於勞動力多並兼副業的中農，一部分已成爲富裕中農，即靠僱工租種敵僞土地而主要收入依靠副業之富農，亦分得較次或少量的土地，消除其轉租與僱工之剝削關係，但按經濟地位來說，仍然是日益上升的。分地以後，農民們改選了政權，成立了農會，組織了武裝，廣大人民不但因此獲得了經濟利益，並且掌握了政權，有了自己的組織，提高了政治地位，得到了澈底翻身。（見四六年五月十二日東北日報）

五 解放區農村的大生產運動

在這種減租減息和解決一部份土地問題以後，農民們的生產情緒提高了，有了發展生產的要求和力量了，但還有缺少農本的，於是解放區政府的銀行，就進行爲人民服務的低利或無利的貸款，大量的發放給各地的貧苦農民，幫他們買地，買牛，買耕具，買種籽。如四六年華北華中各解放區民主政府，幫助人民開展大生產運動，恢復八年戰爭的創傷，已發放各業貸款法幣一百六十萬萬六千元，並發放糧食千萬石，其中農業貸款佔百分之五十上下；在減租減息和解決了一部份土地問題的基礎之上，在政府的號召推動與幫助之下，解放區農民就普遍而大規模的開展了大生產運動，開荒、修地、開渠、鑿井、多施肥、勤剷草、深耕細作，講究農作法，組織集體互助，政府還推行勞動英雄運動，對於勞動最積極生產成績最好並最能幫助別人生產者，每年由當地群眾公選爲勞動英雄，政府還加以物質上與精神上的獎勵，當選爲勞動英雄是無上的光榮，好比過去科舉時代中了狀元似的，勞動英雄在生產上就要起帶頭作用和模範作用，把全村全鄉全區全縣全邊區的勞動者都推動起來組織起來更積極更有效地進行生產，農民和農民間，勞動英雄和勞動英雄間，一鄉和一鄉間，還掀起了熱烈的生產競賽，互相挑戰，並且還用耐心的教育改造的辦法，把好吃懶做游手好閑的所謂『二流子』都改造成爲好勞動者，因此農業生產力大爲提高，農民生活日益上昇，農村經濟日趨繁榮。如陝甘寧邊區耕地面

積截至四五年止已較抗戰前增加百分之七十九點四，四年來人民開荒達二百六十餘萬畝，四四年產糧較三七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四四年種棉較四一年增加五倍，產棉增加四倍，人民已做到了豐衣足食，『過去有襖無袖，有褲無檔的人，現在收下很多糧食，買下驢子。』（邊區參議員房文禮先生語）全邊區已做到了『耕三餘一』，某些鄉村如吳滿有鄉還達到了耕一餘一，其地各解放區人民也都已達到了豐衣足食或正走向於豐衣足食。

六 解放區人民負擔輕微並且逐年減少

人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人民給政府的負擔却逐年減輕了，解放區的部隊、機關、學校爲了減輕人民負擔，實行生產自給，如四四年陝甘寧邊區部隊共產糧八萬餘石，自給了百分之七十一點八。某些部隊達到了完全自給。根據四三年的材料，邊區財政支出，經過稅收取之於民者，不及半數，其餘皆由機關、學校、部隊生產自給來解決，陝甘寧邊區四一年共征救國公糧二十萬石，四二年四三年減至十八萬石，四四年減至十六萬石，四五年又減至十四萬石，全邊區一百五十萬人口，如以平均計算，每人負擔只有九升三合，比國民黨統治區不知輕好多倍（如陝西國民黨區洛川縣人民負擔四四年時較陝甘寧邊區大十倍，陝甘寧邊區周圍耀縣邊境，相差約二十二倍）。在這樣嚴重的抗戰時期，在敵人封鎖與國民黨封鎖的極端困難情況下，人民的負擔却如此之輕，這在國民黨地區是絕對不可能有

的事。

解放區實行了合理的統一累進稅制：居民中的極貧者予以免稅，其他均按財產等第（如土地稅）及所得多寡（即收益稅）定出程度不同的稅率，是累進的，又是統一的，就是說每年除了繳這一種依貧富累進的稅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苛捐雜稅，在陝甘寧邊區很多地方都已這樣做了。至於在敵後殘酷戰爭環境中，和在一些新解放區中，則除了少數地區外，大部分地區尙未能實施這種最科學的，但須經過精密計算的統一累進稅，而是實行評議攤派的制度，經過大家民主的評議，攤派各戶應交的稅額，但在評議中，同樣是根據累進的原則，比較最窮的也予免稅。

而這種稅收都是用在抗戰與人民福利事業上，不像國民黨政府向人民橫征暴斂了以後，又作爲壓迫和奴役人民的費用，更沒有像國民黨政府內當官的貪污飽私囊的現象，這些香蹟是只有新民主主義的政府，真正人民的政府才能做到的。

七 合作社和農業勞動集體互助

解放區的農民不僅在減租減息之後，減弱了和逐漸擺脫着封建束縛，並且還實行勞動的集體互助，即農業生產合作社，進一步的提高生產力，進一步的使廣大農民群眾普遍迅速的發展起來。

這種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是提倡農民群眾自願的組

織和參加的。在陝甘寧邊區有「變工隊」、「扎工隊」、「唐將班子」等形式，在其他各解放區也都

有同類性質的有些名目不同的組織，有幾個人的，也有幾十個人，有單由全勞動力組成的，也有半勞動力參加的，有單實行人力、畜力、工具的互助的，也有在農忙時竟行集體吃飯住宿的，有臨時性的，亦有永久性的。

廣大群眾的生產實踐，證明了集體勞動是從四個方面補足了個體經濟的弱點：

第一、小農個體經濟的生產因素（土地、人畜力、工具、副業）是分散而微弱的，農民常因缺乏某一條件而使生產受到限制甚至停頓，使有用的人力物力不能充分的互相結合而用到生產中去。集體互助的勞動，就是把農民所有的生產因素更廣泛的結合起來。

如陝甘寧邊區靖邊某村農民閻俊旺，有地二十五畝，牛一頭，羊百隻，自己攔羊種地沒法兼顧。隔村李姓，有地十五畝，牛一頭，羊七十隻，因老婆病在床上，媳婦照看病人，也是沒法兼顧攔羊種地。閻的同村李來六夫婦，男的作長工，女的却閒着。後由區上提議，三家商量同意，閻俊旺攔兩家的羊，李姓種兩家的地，李姓媳婦除看病人外兼管做飯，李來六老婆為兩家拾糞。鋤草，收割，由閻李兩家幫助飲食。收穫按四四二分。這就把三家的問題都解決了。

第二、個體經濟的家內分工，勞動力的浪費是很大而必不可免的，集體互助的勞動可以發展較有利的企業性的分工。也就是說從家庭分工的狹小圈子，走向一個更大範圍的共同勞動集體分工的

路。例如以前一具牛犁地，一人播種，變工後兩具牛犁地和播種就可以了。以前每家都要有人做飯，送飯，或者攔牛攔羊，變工後攔牛攔羊可以各家合起來，做飯、送飯可以各人輪流，一個人可以做許多人的事情，婦女可以抽出時間組織紡織養蠶等副業生產。老頭小孩也可以分作一些輕便或打雜工作，更多的發揮作用，充分的把壯年人抽出來參加集體勞動。有的窮人地太少還實行幾家併起來種，抽出餘下的勞動力出外打短工，賺下的錢大家分，地多分少，地少分多，有的農民們併地種後，抽出多餘的勞動力和牲口去作買賣、運輸，賺的錢，適當的分配。

第三、個體經營因為缺乏協助，經營的範圍就很狹小，工作的進展也很慢，集體互助的勞動，却能從事不誤農時的、距離較遠規模較大的生產。

農民們說：「一兩個人鋤過這頭，那頭又荒了，終是鋤不完，只有扎了工，幾天就鋤開，草不得起來，苗就一定好。」

又如幾個農民會商量上山開荒，打算在二三年內，丟掉川裏的租種的熟地，等開好二十餘畝新地，就全家搬上山去。但上山開荒，一是個體開荒作飯的問題。婦女在家照應小孩和牛，不能上山，自己做飯就誤時間太多。二是上山地少人少，看莊稼不方便。組織唐將班子後，這些困難才解決了。

又如修水利，打壩堰，修水漫等，個體家庭去修，有的辦不成，有的不生効，有的鬧糾紛，集體互助後則都能解決。

第四、散漫的個體小農經營的生產效率是很低的，沒有勞動的組織和紀律，就是成天不勞動也行，想幹就幹，不想幹就不幹，更沒有勞動競賽和互相幫助、容易疲勞，沒精打采，二流子的生產更不必說。組織起來以後，他們自己就規定了天亮上工，天黑收工，甚至休息抽烟的次數和時間都有規定。因為是大家自願的組織在一起，幹起來，就爭先恐後，互相制約，互相鼓勵，他看你努力，他要比你更努力。有的一面鋤草，一面還叫喊，叫做『喊號子』，這裏喊，那裏也喊，做的就更有勁，所以生產效率也就大大的增加。同時把二流子和懶漢也逐漸帶好了，很多勞動英雄還親自和二流子變工，把他們改造成勤勞純正的莊稼人。

根據四三年時陝甘寧邊區所得的經驗：『一般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範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體農民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勞動之中，那末，全邊區的生產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這辦法將來可以行之於全國，這在中國經濟史，是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生產的成果也不是歸公而是歸私的，但人與人的生產關係變化了，這就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是土地革命後的第二個革命。』（毛主席論合作社）

除了上述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外，還有運輸合作社（如運隊），手工業合作社（如紡紡），及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延安的南區合作社是一個最標本的

例子。四三年一年中該社淨得紅利三千二百餘萬元，社員分紅，平均一元分到三元。在解決人民的困難上，舉共重要者如下：一、春耕、鋤草時，僅一個區（南區共有八個區）借給變，孔工隊就有十四萬元；二、代群眾買鋤頭七九〇把，市價每把五百元，合作社只賣二百五十元，代買×三，二〇〇頁，耕牛一九七頭，幫群眾省了錢又省了時間；三、組織婦女紡織，放出棉花二萬斤，發展了農村手工業；四、代交救國公糧四百石，這些公糧又都給了群眾入為合作社股金，節省洋一百二十萬元。五、幫助群眾優抗慰勞洋十四萬五千元；六、幫助小學，冬學購買用具洋六萬三千三百元；七、幫助群眾紅白喜事洋一百零一萬零四元；八、幫助移難民借糧十八石，借錢九萬五千三百元；九、群眾買合作社貨低於市價洋一百九十四萬零四百元；十、群眾疾病幫助醫藥洋三十萬元。以上幫助群眾洋約為二千七百九十萬元。合作社是給群眾謀到了很大的利益，為群眾所擁護，現在該合作社已發展成為廣大群眾性的、有工廠、作坊、商店、驛馬店、運輸隊等大量資產的合作社了。（四四年二月六日解放日報）

這種合作社是自願參加的，是民主的，負責人都是由社員選舉的，業務的方針與計劃是經過社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這種合作不僅在經濟生活上替人民服務，並且也可以通過了它，來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教育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毛主席說：「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提高，文化也會進步，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

會改變。不要很久，生產工具也會改良，到了那時，我們的農村社會，就會建立在新的生產力上面了。

毛主席又說：「我們有了人民群眾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全部群眾的力量組織成爲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

這種合作社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重要的組成部份，通過這些合作社的活動可以聯系廣大群眾，又因爲合作社經濟和公營經濟、個體經濟之間有橋樑作用，它協同公營經濟推動個體經濟的發展。

八 解放區農村欣欣向榮

解放區農民經過減租減息，組織起來，大生產運動並逐年減少負擔以後，已普遍的做到了豐衣足食，或正走向於豐衣足食。貧困的破產的農村已轉變欣欣向榮的了。現在舉陝甘寧邊區吳滿有鄉的例子來看：

革命前的吳滿有鄉，全鄉的土地是延安城內高，左兩家握有，農民一年辛苦所打下的糧食，大部分被他們剝削了去；同時，官府壓迫農民窮兇極惡，捐稅繁多，人民所能記憶起的就有烟筒捐，月月款，自地款，馬頭稅，皮毛稅，地捐等十數種，康家××李連，因一時「一顆子」變賣不成錢，交不出

捐稅，衙役就將他抓進牢監。那時農村遍地是匪，搶劫百姓，人民苦的無法生活，請來民團剿匪，但是他們却不打土匪，躲在莊子內抽洋烟，調戲婦女，革命前，吳滿有鄉的人民陷於貧困的深淵中，有些農民就只能找野菜充飢，用繩子勒住肚皮苟延殘喘地過活。縣縣統治了人民，全鄉只有地主尚×秀的老子略認得幾個子。革命前，吳滿有鄉有九戶地主，而另外有一百戶貧農和僱農爲他們效忠，很少富裕的中農、富農，農村經濟陷於破產，當時耕地面積只有三千多畝，由於天災和人禍，他們無法作莊稼，他們歸罪於自己苦命。吳滿有是從上邊逃難下來，他本想來求生但將自己女兒賣掉、受衙役狗腿子的勒索、死去了婆姨，和所有的窮人一樣，他遭遇着躲不過去的厄運。

幾年來，人民生活逐漸富裕。在老戶中，那些過去的貧農和僱農已有十九戶變成了富農，十二戶變成了富裕的中農，五十四戶變成了富農。經他們幾年來的開墾和種植，耕地面積擴大到七千四百畝，比革命前增加了幾近一倍。人民經濟上昇了，但負擔却一年比一年少。

在春耕中，全鄉組織了百分之九十六的勞動力參加變工。吳滿有從前是一個赤貧的農民，現在却變得富裕了，他成了聞名全國的勞動英雄。我們看他吧，正月初十他就到金盆灣去慰勞我們的八路軍，農民們都把鷄蛋、肉，託英雄送給軍隊。在一個窰洞外木棚下，他給戰士講農作法。吳滿有，他出席了延安各界憲政座談會，而且發表演說。瘟疫流行時，他在莊前莊後跑着，給人治病扎針。春天他領導一個隊開荒，親自趕着毛驢到市場上給變工隊隊員買菜。吳滿有，他家裏，外國記者福爾

曼、斯坦因、普金科都來看他。秋收了，他送給毛主席一石麥、一石大米，在田野裏他牽着三條毛驢，人民的領袖毛主席和他揮着手道別。吳滿有，不，所有的吳滿有鄉的全體人民，他們都變成了主人，自由的耕耘和享受着。

那些受人敲榨和欺壓的，從神木、山西、河南國民黨統治區逃了來的難民，五年中間有二百戶人遷徙到滿有鄉來。政府幫助他密洞、土地、農具、貸款，他們發展了，一百戶人已成了中農和富農。孫明山，這個不幸的農民，他從那被「水，旱，蝗，湯」所蹂躪了的河南，用一輛獨輪車全家四口載走，沿途討乞，進入邊區，吳滿有招待了他，政府幫助了他，孫明山的母親活了八十歲了，她歷了差不多一世紀的悲苦和憂患，今天居然也成了紡織的模範。吳滿有鄉走向繁榮，全鄉不但莊稼收穫多，達到耕一餘一，而且他們發動的夫妻，試種棉花，種植護林，組織婦紡，開展文化衛生運動。全鄉現有的五分之四的婦女，參加了紡織，她們之中產生了紡織英雄，全鄉現在有幾個民辦小學和農民學校，有二百個青年男女參加農民學校，他們採用了民教民的教學方式，解決了教員的困難。

吳滿有鄉是一個美麗的農村圖畫，它給我們看見了人民的民主和幸福，這是全邊區農村和農民生活的一個縮影。（《魯報》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日報「吳滿有鄉」）

這和國民黨統治區的農村日益凋敝，日益貧困的現象，正好成爲兩種顯明不同的對照。因此，國民黨統治區的老百姓仰望解放區。邊境一帶，很多老百姓通過了國民黨的封鎖線，從國民黨統治區

遷入解放區，特別是遇到災荒的時候，更大批的逃來，解放區政府和人民則給以種種救濟和幫助。僅據陝甘寧邊區四四年的材料，隨東某地幾百家人民自勳打破門牌，要前來依靠邊區，榆林鎮川堡百餘商家大部關門，有的拋棄房屋土地移入邊區，寧夏等地回民移至三邊者亦有四百餘戶之多。河南山西等地移入邊區者更大批：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因不堪慘重壓榨和人爲的飢荒，逃入解放區者則更多了。

第三章 軍事

第一節 八年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戰場與解放區戰場的戰績對比

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先後獲得蘇、英、美、三大盟國的大量借款與軍火武器的援助，擁有廣大的人力資源，可是他僅僅只抗擊了侵華日軍的百分之三十五·五。日寇在華兵力，截至四四年三月，在華北戰場的，計有九個師團、八個獨立旅團，兩個獨立騎兵旅團，共十四個師團，約二十二萬人。國民黨僅抗擊了二·二五個師團，佔百分之十六弱，八路軍抗擊了一·七五個師團，佔華北日軍兵力百分之八十四強。在華中的日軍，計十六個師團，約二十六萬人，新四軍就抗擊了百分之五十九·五（九·五個師團），國民黨軍才抗擊百分之四十一·五（六·五個師團）。在華南日軍約有三個半師團，兩個獨立旅團，合計四個半師團，八萬人，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的抗擊一個師團佔百分之二

十二，國民黨軍隊抗擊三個半師團，佔百分之七十八。這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國共兩黨軍隊抗敵的具體情形。總計中央軍隊防禦敵軍百分之六十。五，國民黨抗擊敵軍百分之三十五。六。

全國的偽軍，可分爲正規軍，數量約有三十八萬多，偽地方軍約有四十萬，合計全國偽軍約有七十多萬人。這實在是最殘酷的恥辱。而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二，是由國民黨軍隊投降敵人的，有百分之三十八，是敵偽強拉壯丁，收編土匪，流氓編成的。此外尚有許多偽民團，警察，未計算在內；如果一併計算在內，當達九十萬人以上。而其中百分之九十，爲八路軍新四軍所抗擊，國民黨僅抗擊百分之五。四。約有萬人（詳見葉恭綽長報告「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

如果把全部敵軍及各種偽軍合計起來，則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產黨擔負抗擊的，佔敵偽軍總數一百三十四萬人中之一百一十餘萬，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國民黨擔負抗擊的，僅佔百分之十六，即不是六分之一。

一九四四年四月以後，敵人增加了一部份兵力，向中國正面戰場進攻，依據已有材料，當時新增約十餘個師團，敵寇在華北也抽出了三個師團，俱立即爲新的兵力所接替，而在侵華日軍（滿洲尙不在內）四十個師團六十八萬人中，共產黨擔負抗擊的是二十二個半師團，三十二萬人，佔百分之五十六。國民黨負擔抗擊的，不過十七個半師團，二十六萬人，僅佔百分之四十四，偽軍的分擔則完全無變化（見毛主席：論聯合政府）。

國民黨抗戰以來，美師美地，意師意地，從蘆溝橋一直退到貴州省，特別是一九四四年，日寇舉行打通大陸交通線的進攻時，國民黨統治區的河南，湖南，廣東，廣西諸省的大塊土地，在很短的時期，就陷於敵手。河南戰役中，國民黨號稱精銳之師的蔣鼎文、湯恩伯及胡宗南的部隊，對付七萬日軍的進攻，作戰兩個月，不但沒有一個俘虜，一枚槍，一門礮的繳獲；反而失地四十餘縣，喪師近三十餘萬，其中大部份潰散，一部份被俘，大部份槍械被丟棄。據傳僅是步槍就有十五萬餘枝，其中有許多是友邦援助的，第一戰區的糧，彈，槍，砲存儲，全部丟光。

蘇聯皮·克蘭諾夫評論說：「中國軍隊的失敗，在中國人民的廣大階層以及和中國共同進行反日鬥爭的聯合國家中，都引起了驚愕，為什麼在太平洋和美國英國軍隊作戰中接二連三遭受失敗的日本軍隊能够在中國戰場上進行大規模的進攻呢？為什麼中國前軍隊敗退呢？中國統帥部及政府的代表們對這種形勢的解釋是中國從國際國方面得到的援助太少；但中國軍隊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不是在這裡呢？」

客觀估計中國形勢的許多外國報紙得到另外的結論，照他們的論斷，造成危機形勢的原因是反動份子於中國統治集團有很大影響。這些反動份子在中國所進行的，不是鞏固民族團結和民主的政策，而是分裂民族力量的政策。中國軍隊高級軍官中反動份子的階層特別廣大，最近去職的軍政部長何應欽被「紐約先驅論壇報」描寫為執行法西斯政策的極端反動派。中國各進步黨派，團體及活動家的

要求，就是企圖實現國家的民主化。以便將一切民主力量團結起來，達到共同的目的，……戰勝敵人。這種要求是中國一切愛國者的希望，但它們却遇到政府中反動份子的抵抗。」一九四四、十二月（消息報。）

在解放區戰場，共創造者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他們的前身都是中國工農紅軍，從蘆溝橋事變爆發以後，這支軍隊立即開赴前線，深入敵後，在爲國民黨所喪失的廣大淪陷區域中，結合人民的力量，發動全體人民群眾，展開廣泛的游擊戰爭，和運動戰，破裂戰。七八年抗戰，國民黨政府對於這個英勇抗戰的軍隊沒有一槍、一彈的補充接濟，反而不斷與敵人配合夾擊它，雖然在敵後那樣的環境下，雖然孤立無援，雖然被敵頑夾擊，它不僅不被消滅，反而愈打愈強，八路軍新四軍由抗戰開始時的幾萬人發展到一百八十萬正規軍，三百多萬民兵，抗擊五十八萬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抗擊九十餘萬僞軍的百分之九十五，建立了華北、華中、華南十九省地區的解放區，解放人口一萬萬三千萬以上，成爲抗日戰爭中的中國主力軍。

一九四〇年在華北進行了英勇卓絕空前的百團大戰，這一會戰自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開始發動以來，至十二月五日止，連綿作戰，整整三月十五天，這一大會戰，是以華北八路軍主力之一部，及決死隊在本部統一號令之下，在華北廣大地域之內，向各個交通沿線及各個大小據點之敵僞英勇積極自主進攻的大會戰，破壞與截斷華北敵軍全部交通，毀滅在了正太鐵路的敵人運輸，粉碎了敵人的「

堡壘主義」與「囚籠政策」，阻止了敵人進攻昆明重慶及西安的目的，挽救了國民黨投降妥協的危機，興奮了廣大抗日軍民，堅定了全國抗戰勝利的信心，爭取了時局的好轉。在整個大戰過程中，除配合作戰部隊外，總計進行了大小戰鬥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潰滅敵偽有生力量，計斃俘日軍二〇・六四五人；（內有大隊長以上之軍官十八人），斃傷偽軍五・一五五人，俘虜敵軍二八一人，（內有副大隊長山西綏清，中隊長田木石野和小隊長木島等八人），俘虜偽軍一八・四〇七人，俘日寇武裝移民五六人，俘騾馬一・五一〇匹，軍犬二九支，軍用鴿子消滅了敵偽共二・九九三個，其中最大最險要者，計有正太路的娘子關、磨河灘、葛家莊、馬首……等等，冀東 縣，官屯，晉察冀邊區的上社、拘興、西烟……等等，冀中的子樂鎮、白洋橋、東西安、營西北的場方口壘口鎮、軒崗……等等，繳獲了大炮、重炮、手射炮、迫擊炮輕重機槍、步馬槍、手槍、信號槍、瓦斯筒、擲彈筒、各種炮彈槍彈、手榴彈、汽車、大車、救火車、機車、腳踏車、車箱、無線電台、電話、探照燈、降落傘、木船、汽船、收音機等等無算。

這一偉大而艱巨的大會戰，以其兵力之大，地區之廣，積極自主向敵進攻戰術藝術之指揮及組織，以及總結所獲戰果之大的方面說來，百團大戰實為我國抗戰以來空前未有之大創舉。

八年來，八路軍新四軍忠誠於民族國家，備嘗艱辛，不少優秀的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戰鬥員，不少的優秀的中國共產黨員，流盡了他們最後一滴血，為民族犧牲了。用他們的頭顱，熱血和生命來爭

取民族的獨立生存。這八年，他們和廣大民衆進行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戰鬥事例，構成了民族鬥爭的史詩，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永垂不朽的。這八年中，他們進行了許多光榮的戰鬥如著名的：平型關戰鬥、樊霸戰鬥、潘莊戰鬥、梁山戰鬥、賈莊戰鬥、陳莊戰鬥、河間戰鬥、關家驢戰鬥、黃烟洞戰鬥、狼牙山戰鬥、官莊源戰鬥等等。

從敵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度的綜合戰果中，也可以明顯的看出我軍與國民黨軍在抗日戰線場上的情形。一敵大半爲中共軍，在交戰回數，萬五千次中，和中共黨軍的作戰佔七成五，在交戰的二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也都是中共黨軍，在我方所收容的七萬四千數目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佔的比率，則只有三成五。這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也就是說：每天平均交戰四十次以上。

敵西部每日新聞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南船北馬」欄載敵記者阿部作「改正中共觀」中稱：「有人稱中共爲『共匪』……我想還值得考慮。……從目前所發表的自一月至四月華北軍戰鬥狀況看來，在四個月戰鬥中間，交戰回數是六千〇四十二次。其中四千三百五十六次，佔全數七成以上，都是和中共作戰，即一天平均作戰三十次，在這裡每天平均有×人被犧牲，……」這是敵人口中的中共軍在華北戰場的戰績。

一九四四年一月七日美國美亞雜誌評論說：「目前華北的情況，主要的事實爲：日本所能完全控

制的地區、比較的不大，在大城市與主要交通線之間。中國的游擊隊已控制了廣大的地區，建立了真正的民主的各級政府，以動員各階層人民抗戰，這些在河北、山西、山東、河南作戰的游擊根據地（或『邊區政府』控制的地面約有十萬萬方英里，有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的人口（實達一萬萬以上的人口），在所能得到的，最近官方統計中，八路軍及新四軍所領導的游擊隊予敵人的傷亡，幾達日本在華總傷亡之半數。（武漢失守以後，實早超過一半以上了。很明白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所控制的邊區裏面，包括反攻日本的極端重要的根據地。而且這些軍隊本身更是中國攻擊力量的一個有力部份。

……

這支軍隊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這七年半中，（華南抗日縱隊缺一九四三年以前的數字，）總計對敵大小戰鬥十一萬五千餘次，擊斃和殺傷敵偽軍自阿部中將以下計九十六萬餘名，俘虜敵偽軍二十一萬餘名，投誠反正敵偽軍計十餘萬名，敵偽總共損失一百三十六萬餘名。（詳見葉參謀長報告，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在四五年八月蘇聯對日宣戰以後，這支軍隊即開始全面的對日大反攻，猛烈地出擊鐵路線，交通要道及中心城市。斃傷俘敵偽軍，獲得更大的效果。

國民黨投敵叛國的將領，到四三年為止，已有六十七個，國民黨中央委員投敵叛國者，自副總裁汪精衛以下，竟有二十餘人之多，以下的官吏投敵者就更難計算了。而數達八十萬以上的偽軍，其中大部份是國民黨將領率部投敵，或由國民黨投敵軍官所組成的，形成了『降將如毛，降官如潮』的現

象，剩下沒有降的大人先生，也厚顏無恥的和敵人勾勾搭搭，尋求投降妥協的道路，而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却沒有一個指揮員去當了漢奸，沒有一個中委去投敵的，沒有一個連，一個排去投敵爲僞軍的，同時，也沒有一個日本間諜或者一個漢奸，可以在解放區逍遙法外的。

中國八年的抗戰，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八路軍新四軍抗擊敵僞的大部份，進行堅決的抗戰，那末敵人早就會長驅直入，向國民黨統治區的內地進攻，而國民黨軍隊又是必然招架不住，那末，抗戰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設想的了。

抗戰開始，國民黨蔣介石本心是想利用抗戰中來消滅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可是在抗戰第一階段的十五個月，國民黨節節後退，八路軍新四軍步步進在敵後很成功的建立了新的戰場，收復了廣大的失地，壯大了人民的武裝力量，在武漢失守以後，國民黨當局就改變了政策，改變成對日消極抗戰，觀戰，對內積極反共反人民，發動三次反共高潮，製造摩擦，封鎖邊區，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在日本投降以前，他封鎖包圍進攻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解放區的軍隊總數達七十九萬七千人之多，單是在陝甘寧邊區周圍擔任包圍封鎖的部隊，經常是五十萬人，同時，還製造出所謂『曲線救國』的理論，唆使他的軍隊去投降日寇，再配合日寇來進攻解放區，但是，不管蔣介石如何喪失民族氣節，如何想方設計來進攻八路軍新四軍，進攻解放區，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面，全國的解放區仍然是不斷的擴大，八路軍新四軍仍然是不斷的發展，不斷的壯大，因爲它是中國人民的力量，爲人民服務爲人民

辦事的，人民是不可戰勝也消滅不了的，而蔣介石是壓迫人民的黑暗的倒退的勢力，因此他不能戰勝八路軍新四軍，不能戰勝解放區。一個爲人民求解放，代表多數人的利益是前進的，進步的，欣欣向榮的，一個是爲了壓迫統治人民，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建立封建法西斯獨裁統治，是倒退的，反動的，它們始終是不同的兩個政治勢力，兩條政治路線。

第二節 兩條不同的軍事路線

由於政治上的兩條路線：一條政治路線是法西斯專制獨裁，一黨專政，不給人民的民主自由，反對喚起民衆，壓迫人民的，從這條政治路線便產生它的軍事路線，不能不是壓迫人民，奴役士兵，消極抗戰，依賴外援，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排除異己，破壞團結，在軍隊中保存舊制度舊習慣，舊戰術的老套子，拒絕根據抗日戰爭的新條件加以改革，這樣才便於少數人把軍隊當作壓迫人民厲行專制的工具，因而他主張抗戰可以速勝，主張速決戰，害怕發動人民的力量，甚至全力摧殘人民的力量，他估計抗戰全部過程只是兩個階段，認爲武漢失守以前是敵勝我敗時期以後便是轉敗爲勝的時期，否認有相持的階段，他把中國抗戰勝利寄托在日蘇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上面，不寄托在國內自身的民主改革和軍事改革，不寄托在自身的努力，祇希望着他人的援助，縱容叛將，囚禁有功將領，實施不要民

民主生的強迫徵兵制，強拉壯丁，賄賂公行，摧殘民力，這樣就構成了一條反人民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

與此相反，另一條政治路線便是施行民主，發動民衆，給人民的民主自由，組織人民自己的政權和武裝，改善廣大群眾的生活，讓人民起來管理國家大事，全國總動員，團結一切抗戰力量，軍民團結，官兵團結，改革中國軍隊的舊制度舊習慣舊戰術，主張根據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時代的軍事經驗，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武力與國民結合，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的原則，才能團結軍民，煥發士氣，主張中國抗戰是持久戰，不能速勝，因之主張加強人民的力量，喚起民衆，認爲抗戰過程是包括戰略退却，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而相持階段最是艱苦，這時應作特別的努力，要經過民主改革和民生改革去組織廣大人民的力量，準備有效的反攻條件，它相信人民的力量，是可以戰勝敵寇的，主張需要外援，反對依賴外援，主張在大反攻前的攻勢防禦的積極戰略，反對單純防禦的消滅戰略，反對各種各樣用投降理論，獎勵有功將士，堅決討伐叛官降將，伸張民族正氣，主張實施民主民生基礎上的志願兵制，既滿足軍隊的需要，又要保護民力，這樣就構成了一條中國人民的抗日的軍事路線。

前一條是國民黨的軍事路線；後一條是解放區的軍事路線。這兩條軍事路線是顯明的不同的，由此出發，也就產生兩種本質不同的軍隊。

第三節 兩種軍隊

「一種是把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訓練起來，保衛人民的利益，替人民服務的軍隊，另一種也是把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訓練起來，但其目的，是爲了保護大地主，大買辦，大銀行家極少數人的利益，來壓迫人民，剝削人民，奴役人民。」（朱德：論解放區戰場）前者是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後者便是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國民黨的軍隊。

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軍隊，因爲與人民分裂，對於保衛祖國，就不能不是無能的，動搖的，失敗主義的，以至叛逆的（如常僞軍），對於人民的民主自由，則是摧殘壓迫的。解放區的軍隊，因爲是人民的軍隊，人民的子弟兵，要爲人民辦事，所以也就能够有效的保衛祖國，同時堅決的保衛人民的民主權利。

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軍隊，內部要用壓迫制度和欺騙方法，不如此，就無法叫由人民出身的最大多數的官兵去做反人民的事情；它對人民是擄取壓迫的，因爲不是如此，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便無法壓榨剝削人民，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軍隊也就不成其爲壓迫剝削奴役人民的工具了。解放區的軍隊，他的內部是民主的，是官兵一致的，軍民一致的，解放區軍隊的擁護愛民運動，與解放區人民的擁軍運

動是獲得了廣大的軍民群眾的愛戴與推行，八路軍與新四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每一個戰士所熟讀的，因此在解放區的軍隊與軍隊、軍隊與人民，是視愛團結如一家人一樣的。

第四節 兩種兵役制度

國民黨的壓迫徵兵制。他的方法是綁、買、抓、騙、徵兵人員貪贓枉法，草菅人命，壯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綁、凍餓、囚禁、鞭撻，大小便都沒有自由，死亡枕籍，或散而無歸，能够捱壯丁送到隊伍去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從以下一些材料可以看到國民黨兵役制度黑暗的情形：

國民黨軍事雜誌：一七期上載稱：『有錢有勢者不出壯丁，可以享受免役、緩役的權利，或進行賄賂，僱買頂替，於是買賣壯丁到處盛行』。

『縣府區署及團管區，爲壯丁之接收機關，其舞弊方法亦復不少，身體合格壯丁，拿了錢運動，便可以得到體格不合標準而剔退的恩典。應該撥到部隊的壯丁，得到了賄賂，便可長期留下；而不出發。至於因豪紳之說情而釋放，富人之賄賂而免役者，尤比比皆是，甚至強拉過境之客人而充數，僱買乞丐流氓而頂替。』（軍事雜誌一二五期。）

『保長往縣上解送壯丁，恐怕壯丁逃跑，都是五花大綁，像對付殺人大盜似的，用鞭子抽着，用

棍棒拷打着，從縣上解到師管區時，因為有時經過城市，怕外國人看見不雅，表面上就不採取捆綁的辦法，而是用一種更痛苦的捆綁來代替。捆每個壯丁的背上，綁上一大捆木柴，木柴和背緊緊綁在一起，沒有人幫助是解不下來的，若是沒有柴的時候，那就更妙想天開，把壯丁的背上，緊緊的捆起一塊大石頭，裝做搬運石頭的樣子，這樣一拐一拐的走在漫長的路上，比五花大綁更痛苦百倍。」

『新兵在師管區，被扣重糧，每天只有二頓稀飯吃，（雖然規定每人每天大米一斤半）；一到夜晚，因為防止逃走，一吹熄燈號，衣褲就被收拾了去，到天明才發給，這樣，他們只有用自己的肉體來抵抗寒冷，平時不準邁出房門一步，監視像犯人一樣，吃飯喝水在屋裏，大小便也在屋裡』。

（漢中師管區某君談國民黨漢中師管區徵兵内幕，見邊區週圍國民黨軍隊内幕一書，）

還有雲南日報一九四四年八月七日社論說：『壯丁被徵以後，由保而鄉鎮而縣府，而訓練機關或部隊，這中間囚禁、飢餓、寒冷、疾病、打罵、逃的逃、病的病、死的死，真正能送到部隊去，能活着已經是太幸』。

『新兵入營後，月入之餉，不足以補助草鞋費用，食不得飽，營養缺乏，勞作過疲，健康全失，疾病傷生，治療無藥，小病變為大病，重病惟有待斃』。（西四年四月號兵役月刊。）

『壯丁到了師管區，被主管人的無恥剝削，可說是無微不至的……新兵的米糧被長官們扣了去，他們餓着肚子。但還必須參加勞役，比如上山砍柴，（自然是像囚犯似的被監視着，）一天筋疲

力盡，把柴帶回去，長官又大作生意，把柴賣出去，賣得的錢，由連長，排長，班長按成分，新兵是沒有份兒的……新兵在師管區照例過着這樣牛馬不如的生活，一直到三月之後才開始受訓。」（漢中師管區徵兵之內幕。）

此外國民黨反動派還用『昇官發財』『吃牛油麵包』等。欺騙來引誘知識青年從軍，企圖建立法西斯的『黨衛軍』用來作壓迫人民與反共內戰的工具和炮灰，但大多數青年們對於參加這樣一個迫害人民的軍隊，表示冷淡和拒絕的態度，以致國民黨反動派又只好採用強制抽籤和攤派的辦法來徵募充數。

由於這種捆、買、抓、騙的黑暗的兵役制度的結果，在老百姓中，傳着几句悲慘的話：『積下的錢是保長的，養下的孩子是老蔣的』。

解放區現在所實行的兵役制度，是自願兵役制，在將來新民主主義中國亦要實現建立在自願與說服基礎上的徵兵制，加入這個軍隊的，在抗戰中都是爲了抗日救國，爲了實現新民主主義即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自願來的，他們裡面有一部份是共產黨員，而最大部份都是非共產黨員，由於八路軍新四軍與人民密切結合，它的兵源是永不枯竭的。

舉山東解放區的例子來說，四五年正月，山東人民踴躍參軍，形成了全省性的人民參軍的熱潮，各地都完成了預定的計劃，有的縣份完成計劃人數的兩倍，其中莒南莒中等縣，幾天內參軍的都

在千人以上，廣饒縣有二千七百人自動參軍，有些村中出現了『一門五英』『一間雙英』的參軍模範家庭，如抗屬傅連才老先生說：抗戰勝利只有依靠共產黨八路軍，所以這次我動員一個兄弟，兩個兒子，一個侄子，一個外甥參加八路軍。（解放日報四五年三月七日）參軍的人，幾乎百分之百是樸素的農民，他們都經過村、區、縣和部隊幾次審查合格，方准入伍，如濱海區報名參軍者爲一萬三千〇二十九人，因成份和身體不合格，而被精減了三千六百六十三人。沂中縣各階層參軍比較爲工人佔百分之五。五，貧農佔百分之七十八，中農佔百分之十四，富農地主佔百分之二。五，莒南參軍者民兵佔總數百分之七十，造成這種轟轟烈烈的人民參軍熱潮，首先是有不斷的戰爭勝利和減租勝利的基礎，八路軍在保衛人民利益上，盡到了極大的努力，獲得了很大的勝利，使人民相信只有依靠共產黨八路軍才能勝利反攻，打走鬼子，減租政策的徹底實行，使得翻了身的農民，更踴躍的參軍。莒南某莊魏大娘，在擁軍檢討會上說：『過去年年要做，俄的走不動，八路軍來了俺翻了身，八路軍真是救命恩人！』她當場動員她的兒子參加主力，在參軍運動中，黨政軍民，一齊下手，進行深入普遍的思想教育，秧歌宣傳，組織主力參觀團，對抗屬作物質的保證，『優抗糧』一般的在三百斤左右，各地都製出光榮牌，光榮燈，光榮旗等，用秧歌隊奏着樂，送到每個家屬的家中，又在群眾的互助下，解決了貧苦的抗屬問題，使他們都能過着中農的生活，這樣戰士們都得到鼓勵和安慰，如山東渤海區廣饒縣，北墮村開明士紳陶中元先生，自動捐出土地七十二畝給抗屬，（地權爲原主所有，）博興縣

糧軍委員張敬堂先生，號召村民幫助貧苦抗屬並且自己捐地二十三畝，分糧食一石，另有十人，也捐出糧食三石，土地八十一畝六分，民兵則幫助抗屬打水、擔柴，並經常保證抗屬水滿缸，柴不缺；三月間起，民兵已開始幫助抗屬春耕，抗屬自己也組織起來，加強生產，婦女幹部在保證新戰士安心發動反扯腿運動，如萬南某村幹部允許未婚夫幾個條件：動員了未婚夫去參軍，動員後，開熱烈隆重的歡送大會，騎馬帶花，放鞭炮，敲鑼打鼓，由各救國會及姊妹團表演秧歌、高蹺，熱烈的歡送參軍的戰士，得到人民的無上光榮的尊敬和愛戴，到了駐地，部隊列隊在營門迎接並熱烈招待陪送來的抗屬，舉行會餐，組織晚會，新戰士獲得極大的興奮，老戰士親切關照和幫助使他們感覺到部隊和他的家一樣。

第五節 兩種不同的養兵方法

在養兵方法上，國民黨的軍隊，是以剝削人民，剝削士兵出發，他們以國家養兵爲名，來向人民索取軍費，國內搜括不足，用國家名義借外債，籌得軍費，於是貪污舞弊，尅扣軍餉，吃空額，想出種種辦法，自私自肥，層層剝削，一層吃一層，官職愈高，吃得愈多，所以儘管軍費龐大，而士兵却不得一飽，面黃飢瘦，衣不蔽體，軍費是一團漆黑的爛賬，從這裡，國民黨內的反動派不知把好大一

筆錢變成了私產，茲略摘數段材料看看，……

重慶時事新報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社論上寫道：……目前排長須保留若干名額以孝敬連長，連長同樣要保留若干名額以孝敬營長，乃至於營長，團長，師長，軍長，層層吃空，層層尅扣，已是公開秘密……。

邊區周圍國民黨部隊內幕中寫道：四三年三月間，軍政部派人到贛二十五師去點名，但空額過多，如師軍醫處應有名額一百三十人，實際上只有八人，於是官長們妙想天開調二團的六個連來頂師直屬隊，調三團去頂一團的空名，三團又連夜趕回原防又調一團去頂三團的空名，一場忙碌之後，總算應付過去了。官長們依然坐吃空額，朋比分肥，而小兵們却星夜奔馳，苦煞了兩條腿。

士兵的食糧和茶金都一樣要受到官長的尅扣，雲南日報記者曾報導如下事實，「……我們由宿東到老河口在七百多里的崇山峻嶺中，遇見很多來自豫東，皖北身軀高大的士兵，他們每人却只能挑動三四十斤的擔子，追問底細，才知他們經常吃小米粥，包米糊，有時每人每餐還受限制，到現在，他們愈過愈苦，經常吃的是雜有石子、穀子、秕子的粗飯，和無油無鹽的小菜，有時爲了搶飯或多吃一碗，就被官長打罵，穿的是破爛得不堪，有些士兵夏天穿棉襖，冬天穿單衣，……」

國民黨陸軍經理雜誌五卷三期上同樣說道「士兵吃的米，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三是穀稗子和一些砂石……」「難怪一疊疊的醫官所填的死亡證書上，都寫着：心臟麻痺、心臟衰弱、貧血、虛脫」之類

的名詞，因爲營養不足，疾病叢生，大量死亡，至於其他腸胃病虐疾、疥瘡、眼病、爛腳，更是普遍的現象。

第十八師是國民黨最精銳部隊之一據某記者調查：「民國三十年，該師全部沒有作戰駐在後方，因爲士兵吃飯不飽，更說不上營養，全年中疾病，死亡，逃走，合計損失六千零六個人，全師官兵，總數爲一萬一千餘，損失半數以上。」

士兵的肚子餓透了，長官的腰包，却飽滿起來，士兵的生活，那樣壞，長官的生活，却是荒淫無恥，比如賭風非常盛行，打麻雀更是家常便飯，就是連長們，往往一場牌打下來，都是五六千元的輸贏，紙烟錢就要化五六百元，其次逃私娼，嫖妓女，是下級軍官普遍的現象，團長以上的軍官，便是三妻四妾，小老婆一大群，吃好的，耍盡的，住在漂亮的公館裡，揮霍無度，荒淫無恥，吸取人民的血汗，吸取士兵的血汗。

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一批一批的大員帶領一幫人員來到敵佔的地區，所謂接收敵僞物資，搶劫搜括，漁肉人民，使廣大貧苦人民，無依無靠，無法爲生，物價飛漲，搜括所得，全供他們揮霍無度，荒淫無恥的生活，如吉琴從瀋陽歸來「中寫道：『想起前幾天在瀋陽時，所看到的大不同了，在那邊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擴大內戰，人民沒有電燈使用了，自來水不來了，電車不通了，煤炭少了，工廠難開了，糧食也不斷的漲價了，我親眼看到一群小孩子在野外拾二三寸的草根樹枝作柴燒，加上

捐稅很多，人民生活更困難，富的變貧，貧的餓肚；瀋陽與撫順間一些貧民正在找柳葉來充飢呢。現在許多人走到城外住，據說瀋陽市人口減少了一半；這不是瀋陽市蕭條了麼，不是的，還有繁榮的一面，首先是鞋店生意旺盛，因為文武官員增多，需要貴重的皮鞋呢，瀋市有許多省政府、縣政府、公安局，接收委員之類，機關堆積了許多要人，游手好閒，希望內戰的勝利去各省「接收」壓迫人民呢！要員多了，糜爛總少不了，今天你請我客，明天我請你，於是酒店增加了，老爺們，將軍們吃飽了，還要研究原子炸彈，（指麻將的骰子），要跳舞，因此舞場增加了，街道上隨處可以看到「招收藝妓」、「招收舞女」的小廣告，五月六日新開一個國際舞場，精緻極了，許多妓院張燈結彩，貼着「歡迎國軍」的標語，有一家妓院大約是日本妓院吧！有一條日本式的中文標語，貼在一個妓女像旁邊，字句是：「中央軍歡迎」，爲了適應交際場中的需要，化粧品生意興隆，……盜賣「接收」資產，從桌子，板凳到房屋機器……現在拍賣場中交易在擁擠，由於分贓不均，要員們引起了衝突，真有傷國體，……」（東北日報五月十四日通訊）

但是，他們士兵生活呢？遼渡重洋，從印度緬甸開來東北，據說無棉衣，每個士兵只穿一條短褲，吃高粱米拉肚子，國民參政會暴露：二等兵薪餉每月只九百元，不够買一盒香煙，說是抗戰勝利，開到北方來遊歷，結果是叫打內戰，士兵才知是受騙了。

解放區軍隊的士兵生活，是儼然不同的，他們是豐衣足食、戰鬥、生產、學習，幫助人民過着健

全幸福的蓬勃向上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

第一、是在盡量減輕人民負擔的原則之下，訂定部隊人員的待遇，軍官以身作則，與士兵共甘苦，在連隊有士兵選舉之經濟委員，協同管理賬目，計劃經費使用，按期公佈賬目，這樣就在軍隊中絕滅了吃空額與剝削士兵的惡習，開創了中國軍隊歷史的新紀元。

第二、在戰鬥和訓練的間隙，實行軍隊自己生產，解決軍隊自身物質需要，減輕人民的負擔，如無戰鬥任務的部隊，甚至作到完全不要人民供給，還幫助人民生產，還向政府繳納公糧。

如四三年一年中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共開荒三十萬六千畝，超過各旅原訂計劃最低百分之十，最高一百五十六，如三五九旅，共開荒十萬畝，收細糧二萬石，做到全部自給，除農業生產外，還發展了各種副業，如運輸，手工業，牧畜業等，部隊不僅豐衣足食，而且建立了大規模的農田，開拓了大量的土地，使駐軍所在地的廣大幅圖（南泥灣）變成了『陝北江南的稱譽』，建立了龐大的革命的家務，創造了幾十萬人民的幸福，所以老百姓個個稱頌『八路軍又能打仗，又能生產，又能與人民打成一片，從古到今，那裡還有過這樣好的軍隊啊！』四四年三月三五九旅每人生產任務是六石一斗，其中除吃、穿、用外，還一石交公，兩石歸私，可以存錢自用，或寄回家去，他們吃的每頓兩三斤菜，蔬菜豬肉，充分具備，一月會餐一次，更為豐富，衣服供給，同樣充足，夏天的單衣襯衣，冬天的棉衣大衣，無論官長士兵勤務人員，冬天每人都有毛衣服、毛手套、毛襪子各一套，不僅他們自己豐

肉足食，而且還幫助人民同樣豐衣足食，幫助從河南逃難來邊區的人民安家立業，建立家務，過好生活，群眾無限的愛戴他們，擁護他們，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解放日報載：『太行第六軍分區，去年幫助群眾耕地四萬畝。』在戰鬥環境和自己生產的餘暇，爲群眾耕田四萬畝，這是一個可驚的數字，是對人民的極巨大的幫助。在邊區我們的部隊不吃老百姓的一頓飯，爲老百姓耕地，鋤草收割，而且要做得比老百姓自己更細法更迅速，在前方，天災人禍變重的威脅老百姓的生活，我們的軍隊節衣縮食，盡一切力量來加以救濟，最動人的是太行一帶的救災運動，上自總司令，下至每一個士兵，普遍地節約了飲食，作爲救濟災民之用，身患胃病的彭副總司令也和士兵一起共大灶的伙食連個人僅供零用的稿費也捐出來了……『去年淮北大水，我四師部隊由彭師長鄧政委親自督促，搶築堰堤，奮不顧身，幾遭水淹。』……他們在練兵習武中是英雄主義的，出了不少的英雄模範，他們在戰鬥中是英雄主義的，出了不少的英雄模範，同樣在生產勞動中間，他們亦是英雄主義的，出了不少的英雄模範，如團長陳宗堯開荒中打了滿手的血泡，終不休息，政治委員左齊，在抗日戰鬥中已失去右手，不能拿鋤頭生產，就親自給戰士做飯燒水，士兵們把他們當如親同骨肉的弟兄，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

美國的名記者愛金生氏從陝甘寧邊區回去以後，他寫道：

『訪問中國共產黨區域的領導中心延安的第一批外國記者，發現邊區有着對於日本的憎恨，有着

保衛自己的成就，使不受一切干涉的決心。

『我們也看到陝北從前是不毛之地，自從十八世紀六十六年代，（即一七六〇年——一七〇年）回民大動亂以後，經過多次大動亂，土地荒蕪，人煙極少，而日本進攻中國以前達到了頂點，但，現在已經變成積極耕作，大規模畜牧和手工業發達的區域了。』

『邊區已爲八路軍的部隊創造了足夠的食糧和衣服，而八路軍是記者在中國其他任何地方，所沒有見過的衣食最豐足的軍隊，荒地也很多，懇荒的工作，不僅當地居民在擔任，當地的駐軍也在擔任，駐軍在夏天耕田，冬天操練，現在自己能養活自己，用不着使農民有任何負擔，一旅長王震，穿着比他部下許多兵還來得破爛的制服和草鞋，和我們一起在邊區騎馬走了一百多英里，說明了生產運動和軍事訓練的情形，他把一句話總括說的軍事訓練：「我們研究敵人」，我們目擊到的情形，以及和士兵們的說話，證明了這一點，軍人們說到的關於軍事方面的事情，並不是抽象的，而是有關對日軍所已往做到的，正做的和將來很可能做的事情……。」』

就因爲這樣，軍隊自己生產之後，民衆負擔大爲減輕，軍民更加團結，軍隊生產更加緊張，部隊更加鞏固，訓練更加有效，戰鬥更加積極，並爲養兵的經費開了無窮的源泉。

第六節 兩種不同的軍民關係

國民黨軍隊，不僅要老百姓負擔很重的軍費，還拉夫拉牲口，借東西不還，挖老百姓的菜，砍老百姓的樹，敲詐勒索，強買強賣，常常打罵老百姓，老百姓怕軍隊的淫威，只好忍氣吞聲，不敢反抗，一逢作戰潰敗，這些軍隊，便姦淫擄掠，無所不作，與日寇一樣。

靠近陝甘寧邊區的國民黨部隊，從那裡逃進邊區去的老百姓說國民黨的軍隊是：

當官的只管要，是不顧人民死活的，如民有鄉第三保保長侯金有就將石泉村的一個姓侯的逼的跳井了，他家裡的人，現在已一棵糧也沒有，只好活活的等死了，這個鄉西谷峴村的一個人，每天吃野菜，熬着米湯度日，可是因為保麥不起被關在禁閉室裡，逼得吊死了。

在那裡，軍隊買賣東西，從未按市價給過錢，不是半價給，就是給三分之一，買賣還不自由，吉子視本來是個繁華的市集，現在軍隊更不讓老百姓做買賣，結果市鎮就蕭條了，直至塢台，現在街上的荒蒿，長的滿滿，路上行人斷絕，就是有良民證，也常被拉了去當兵，或搶了錢財，五十三師在洛川時，在石家莊大白天就搶了老百姓，一六五師在紅白兩界也常常攔路搶劫，五十三師有一個營，要在大同鄉裡駐紮，金家原村的金老四，正為父親過周年忌，聽說他們來了趕忙送女客走，却被營長當

住了，金老四被打了一頓，過了兩口大豬，被軍隊吃了，女客全都受了姦污，在營長的指令下，將每家的街門都借去了一扇，名義上說是去支床板用，實際是使他們晚間串門子方便，當地五分之三婦女，就教這個營蹂躪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解放日報載。）

又如最近開來東北進行內戰的國軍，他們給予人民的遭踏。

『國軍』所到之處，如敵偽統治時一樣，到處清查戶口，檢查行人，並向人民索要偽滿時製訂的『國民手帳』，若不帶有此手帳，就押起來叫你找保，而且日夜抓抽勞工，修築碉堡炮台，每組每日去五個勞工，被迫以事十一小時以上的勞役，中午且不許回家吃飯，工廠也被迫停工，工人被趕去運磚修碉堡，每人每日至少搬六塊，走慢了就挨槍托子，婦女兒童也抽了去修路，每人都得幹五六天。

至於『國軍』在撫順的姦淫擄掠，抓鷄宰豬，要大米，要白麵等，胡匪般的行爲，則到處可以遇到，如他們到上章黨屯，劫去百姓的金錢還不算，連劉永全家的一斤白糖也被搶去，駐撫順城的五十二軍二師六團的一個排長，偷去人家拉大車的驢子，以六千元出賣了。官員們爭相做買賣，他們從秦皇島運來大批海洛英、鴉片等，在當地出售，五十二軍二師二團的排長謝有三，並強迫老百姓，以一千五百元一兩的價格買他的煙土，已經有四五個小老婆，將近五十歲的六團團副官，新從熱河霸佔了一個十八歲的民女，近又企圖霸佔撫順北關王某之妻，強逼王之隣居給他說媒，聲言若將該女弄到手，先以萬元爲酬，各級軍官日夜出沒於妓院中，那裡幾乎成了他們的公館。……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

（東北日報）載。

國民黨軍隊的紀律敗壞，擾害人民是到了極點的，因此造成在四三年鄂西戰役，四四年中原戰役中，老百姓都起來自衛，把這些搶掠姦淫的軍隊，大批的殺戮繳械，如湯恩伯、程楷等部，大批的被人民圍殲繳械。

下面便是這段通證：

河南民衆，早有『河南四荒，水旱蝗湯』（湯即湯恩伯）今年，（一九四四年），又遭荒旱，湯恩伯軍隊每保要抽七十名壯丁，而且勒派太兇，苛雜太多，民衆收入還不够繳軍隊，中原一戰，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使河南大部淪於敵手，更使民衆恨入骨髓。七月二十一日，在桐柏南山四十里處，以王川爲首，集合七千餘人，將駐紮天河口（信陽以西約一百里，）一帶之第五戰區，第一游擊隊，何勵生部兵士、機槍連，衛隊等繳械，其部屬王貫五被殺，曹文彬所轄之李大隊士兵亦損失大半。國民黨軍當局聞變，即派六十九軍二十八師前往鎮壓，任意屠殺，凡在十歲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屠殺者達五千餘人，血流成渠，造成抗戰以來軍民相殘的最大慘劇，該地人民，人人自危，除一部份逃去華中解放區，強悍者不約而同，群起反抗，將二十八師全部繳械，師長被殺，現該地農民，已聯合達數萬之衆，遷往四望山吳西家大店、汪奚店、天河口、應家店等山中。各市鎮上所貼的標語，是『反對軍隊勒派壯丁』，『反對不抗日的軍隊』，其旗幟爲白地黃邊，中寫『天一』二

字，譬章爲『農民救國軍』。這些吃老百姓、穿老百姓，而又與老百姓爲敵的軍隊，人民是應該起來消滅他的。

解放區軍民關係是完全不同的，軍隊愛護人民，軍隊到任何地方都要幫助人民作事，軍隊除了自己生產，減輕人民負擔以外，還幫助群眾生產，幫助人民春耕，鋤草秋收，搶收、搶打、搶運、搶裝，並且規定：一、不吃群眾一碗飯，二、糧食自己帶，菜蔬自己運，三、不傷苗，不留草，四、不踏壞一根禾苗，五、愛護群眾工具。此外還幫助群眾修房子，幫助人民砍柴、挑水，給人民義務看病吃藥，八路軍新四軍每一個人都要執行紅軍時代毛主席所手訂光榮的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軍隊不許侵犯群眾絲毫利益，軍政民關係發生糾葛爭執，首先責備軍隊，軍隊進行自我批評、檢討，在軍隊中進行強固的擁政愛民的教育，使他們懂得，愛護人民群眾利益，幫助群眾，擁政愛民，不是單純的紀律要求，而是革命軍隊的政治要求，是區別真正革命軍隊與其他軍隊的主要分界線，在部隊中經常進行，擁政愛民的教育，軍隊從經濟上、文化上，經常幫助人民，從軍事上保護人民，一切軍事佈置都要照顧到當地居民的切身利益，把抗戰的一般利益，與人民當前利益，密切結合起來，在敵後，在群眾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軍隊都需要出動保護，敵人搶糧抓丁，實行三光政策，部隊要爲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而奮鬥，平時整戒，戰時掩護群眾在邊沿區組織聯防，在太岳區，圍圍沁源的蔡團，營，四三年掩護城關群眾麥收中，提出，『群眾生命第一，麥子第二，部隊安全第三，』的口號，去保護群

衆，軍事上幫助人民訓練民兵，帶領民兵作戰，以勞動力幫助群衆生產方面，晉察冀部隊四四年規定農忙時部隊以二分之一的勞動時間幫助人民生產，四四年春，四分區部隊，自種一萬一千餘畝地，開荒中，突擊一星期，幫助了群衆六千個工，麥收中幫助群衆二萬個工，除警戒任務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員及全部馱驢騎馬投入大突擊，幫助人民中嚴格做到秋毫無犯，並且幫助人民建立政權，救濟災荒，發動群衆減租減息，協同地方組織民兵，爲人民興利除弊，進行衛生，創辦學校，消滅文盲等等，這樣在解放區的軍民團結一致，軍民互相幫助合作，親切爲一家人，這樣八路軍，新四軍，貫徹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所以獲得了人民的擁護，雖然無數嚴重的考驗，仍舊能够屹立不動，鍛鍊成了鐵的軍隊，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在抗日戰爭中，成爲民族解放的主力軍，這一切的秘密就在於：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我們是澈底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所以四四年十月，盟國記者團赴晉西北參觀我軍作戰後，福爾曼先生講演說：『這種軍民團結，合作打敵人的動人情況，是中國旁的地方所沒有的，我們在前線所看到的一切，充分證明了我們在延安所聽到的是千真萬確的』。

第七節 兩種不同的帶兵方法

國民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爲了壓迫人民，爲了便於統治兵士和奴役兵士，他們在軍隊裏提倡

目服從的法西斯的愚兵政策，主張『將貴智，兵貴愚』。他們在軍隊裡，廣泛地實施打罵制度，特務監視，甚至暗殺士兵的辦法，不承認部屬和士兵的獨立人格，以黑暗的絕對服從的制度，造成部隊士兵畏懼懾服，以便獨裁者爲所欲爲去使用軍隊。

這樣，在國民黨軍隊中，打罵就成了家常便飯，出操要打，就是做遊戲也同樣要打，新七軍一個士兵說：『去年我們五連一個新兵，出操的身體軟弱，挺不住胸脯，一收操，班長就拿起石頭，對着他的胸脯打，叫他鼓出來，結果把胸打腫了，鼓是鼓出來了，但病後連路都不能走了，後來把他抬到醫院去，從此就沒有再回來。』

逃兵們都是這樣說：不管出操，上課或講話，排長手裡拿着棍子捏着拳頭，士兵們動作慢一點或是講了一句話，棍子拳頭打上來了，甚至在遊戲時間，官長手裏還是拿着木棍，站在木馬，槓子旁邊，誰跳不過木馬或翻不過槓子，粗木棍就無情的落在屁股上，一百六十七師一個逃兵說：『今年八月間，我們連上在耀縣拉了一個賣布的人當兵，有一次出操，把這個賣布的新兵，打得滿口吐血，得了一場大病。』

曹五十二師一團的逃兵說：『班長要是發覺那個兵想逃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一頓，班長說：打幾下賺幾下！』因爲跑了兵，班長是要挨打的，他們的打法是：上等兵打一等兵，一等兵打二等兵，排長打班長，班長打士兵，士兵挨了打罵，背地也不敢講，因爲班上有牒報組（特務），專門

在偵察士兵的行動。

解放區軍隊，則徹底打破了幾千年來軍中的壓迫制度，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軍隊完全相反，帶兵中實行民主集中制，沒有打罵制度，承認官兵人格平等，只有職務的區別，沒有政治上不平等區別，因此我們的官兵在平時都是一樣的革命同志，相互尊重彼此獨立的人格，我們主張極其嚴格的軍事紀律和群眾紀律，這個紀律不是建築在強迫命令而是建築在自覺的基礎之上的。軍官要在各方面起模範作用，以身作則，爲士兵的先鋒，衝鋒在先，退却在後，吃苦在先，享福在後，關心戰士，愛護戰士最好，爲戰士所最尊敬最擁戴的軍官，才是最好的軍官，近年開展尊幹愛兵運動，首先由官長坦白反省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聽取戰士和部屬的批評，然後官兵都來反省檢討自己，和聽取別人的批評，並訂出今後尊幹愛兵的辦法，這樣部隊的團結和戰鬥力更加增強了。這樣我們的軍官自然能够在精神上意志上與戰士完全融成一體，取得戰士的高度的信仰，以致每個戰士都能够將自己的一切完全信任於我們的幹部，因此，我們部隊領導的效能和戰鬥的素質，也就能無比的提高，能够克服一切苦難，創造出歷史奇蹟，勝過古今中外一切名將所統率的軍隊，（一切名將都是看重士兵和愛護士兵的，但歷史上任何名將，都不能有我們這樣完全的群眾觀點——毛主席所指導的群眾觀點，因之也不能有我們這樣密切的官兵一致，）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真正無敵於天下。

第八節 兩種不同的練兵方法

因為有兩種不同的軍隊，所以也有兩種不同的練兵方法，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軍隊的練兵方法，是施行盲目的，強迫的練兵方法，也就不能不是以盲目的強迫的辦法幹，自然根本談不到智力訓練，就是體力和技術也練不好，因為不是自覺的有興趣的，而是強迫的被動的，這種兵是一定練不好的，這種兵即使有了新式武器也沒有用，反而會送給敵人。

國民黨軍隊中的政治教育，主要就是貫輸「反共」的反動思想，說共產黨是「好黨」「破壞統一」，說八路軍是「土匪」，是「好軍」。一個新七軍的逃兵說：我們那邊沒有開會，只是官長講話，當官的不准士兵談政治，提到八路軍，總是說你們要打我們，叫我們提防着，但弟兄們是有眼睛的，總是我們先開出來打你們，沒有見過你們先打我們，還說：「如果你逃到八路軍去，他們就要你作苦工，把你活埋，如果你被八路軍俘虜了，他們就要一刀一刀的割你的肉」，然而兄弟們的心裏却都這樣說：遇到八路軍，一繳槍就可回家了。他們這些話都聽厭了。……

至於他們的文化教育，那就根本談不到的，逃兵們都一致說，當兵當了好幾年，沒有學一個字，許多人不認識自己名字的，甚至有的人過去本來識幾個字，當了幾年兵，反而全忘了。

解放區軍隊的練兵方法，則是用自覺的自動的方法，練兵分三方面：一是智力，二是體力，三是技術。首先是智力，培養智力，首先是提高政治覺悟，政治覺悟不高，不懂得爲什麼打仗，就沒有積極性，練兵也就練不好，沒有政治覺悟的勇敢，只是血氣之勇，有了政治覺悟的自覺的勇敢，乃是大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政治覺悟最高，所以戰鬥力最強，部隊最鞏固，所以是打不敗的，爲了提高政治覺悟和軍事知識，又需要提高文化，近年在智力訓練中，他們創造了許多學習方法，如張有他學習法等，他們平時每連每排出牆報，出黑板報，文化學習政治學習，情緒極爲高漲，甚至行軍還有行軍學習法，每人背一個認字牌，一面行軍一面進行文化學習，除了政治和文化教育之外，又加上生產教育，不僅幫助了生產，而且灌輸了勞動觀念，獲得了生產知識。因此我們的軍人決不會變成『兵痞子』『二流子』，他們都有高度的政治覺悟，軍事知識，同時還具備有生產知識，即是將來戰爭結束，仍是社會上有用的人材。

近年來在練兵習武中的新創造，就是以上下合作的路線，在我們軍隊中，已創造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官教官，以及知識份子與工農互相幫助互相學習的教學相長的新學習方法。一方面尊重軍官和軍事幹部的特殊技能的傳授，同時又使軍官們承認，在他所指揮的幾百幾千人中每人都有特長，行行都有狀元，這是軍官們應虛心去學習的，把軍官高於一切的妄自尊大的態度，改爲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態度，這個練兵的群眾路線一經倡導，就發現在八路軍、新四軍中有不少未曾被發現

的人材，在練兵運動中，每天均有新英雄新技術出現，這樣就豐富了技術，因此在練兵中，造成了學習熱潮，收到很大的成績。但解放區的軍隊，並不因此滿足，他們在今後更要繼續努力去學習，去掌握新的軍事技術。

第九節 兩種不同的用兵方法

這兩種軍隊，不僅在養兵練兵各方面都不同，用兵方法，也是不同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用兵方法是有固定戰規固定格式的，因為他們壓迫人民得不到人民的幫助，又因為他們官兵之間離心離德，作戰時不得不對群眾施以更蠻橫的強迫命令，對他的部屬和士兵，以很多的力量來防止逃亡，他不能依靠部屬和士兵的自動性和積極性，上而下的命令，便往往只有虛報一項，上下互相欺騙，這種軍隊還能打勝仗麼？當將他不討伐，回來還可以作大官，有些艱苦守城將領，反而被槍決，這不是倒行逆施的賞罰制度嗎！如此用兵，焉能不败？四四年國民黨軍隊在河南大敗，有人檢討經驗，認為失敗的原因是由於五不和：即軍與軍不和，軍與政不和，軍與黨不和，軍與民不和。

人民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的用兵方法，則是隨機應變，變化無窮，他們打起仗來，處處得到人民的幫助，軍隊自身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官兵之間，互相了解和團結，因之人人自覺自動，在一個意

圖之下，機動靈活，奮勇殺敵，他們不僅善於進行游擊戰，而且也善於進行運動戰和陣地戰，如抗戰中的陳莊戰鬥，關家驢戰鬥和四平衝圍戰等等，便是成功的運動戰和陣地戰，其他的例子還有很多，八路軍新四軍用兵的主張可以概括爲：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第一句就是根據部隊的武器裝備，第二句話是根據敵情，第三句話是根據時間地形條件種種，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用兵方法，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軍事家在這裡找過勛斗，過去有些犯左傾幼稚病的同志，也都是不懂得這個道理，如內戰中的軍隊和梭標大刀時，我們便即研究這現有條件下去下決心，決定戰法，那時我們對着這樣的軍隊不去高談機械化兵團的戰術，在抗日戰爭裡，而對日本法西斯這個敵人，我們便不固執內戰時的經驗，而是加以必要的改造和提高，充分研究敵情來下決心，來決定戰法，在解放區戰場，我們更定出適合解放區戰場的時間地點的戰法，這幾條用兵通則，還圍繞着軍隊與廣大人民結合的特點，一方面以軍隊的作戰去發動人民的各種鬥爭。另一方面又是用各種人民的鬥爭（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交通的，軍事的，）去配合軍隊作戰，這種軍民全面的配合一直貫徹到戰場上，戰鬥上，戰役上去，這是我們進行人民戰爭的新兵法，也是毛澤東同志的新兵法。

官兵與人民，人人想盡方法去殺敵人，因此八路軍新四軍所下的命令，經常是勝利完成的，有時還有辦不通的過時的命令，因爲下面能够適應情況，斷機專行，也可以避免損失而爭取得勝利，這

是我們戰無不勝的道理。

在軍事理論上，他們是習於搬弄外國軍校的高等頭銜講章，習於引用各國戰史，習講很高的理論，而不喜也不能從中國具體政治經濟各種情況出發來研究軍事理論，因此也就不合乎中國人民的實用，我們主張需要吸收各國軍事理論與經驗，但不機械搬用，不當作一成不變的教條看待。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八年抗日戰爭中，已經產生了吸收各方經驗最合乎中國人民需要的正確的軍事學。既有理論又有實際的軍事學，它表現出擊敗日本侵略者的優秀戰績。毛澤東同志的許多軍事著作，便是這種新軍事學的代表作品。

解放區的部隊，分爲主力軍，地方軍，民兵自衛軍三大類，民兵自衛軍的主要任務是不脫離生產擔任保家自衛，由於群眾發動起來了，人民翻了身，近年民兵發揮和創造了許多戰績，民兵配合正規軍作戰，或者獨立作戰，他們的武器有：步槍，手榴彈和地雷，甚至各種原始武器，以及自製擲彈筒，爲了解決武器困難，他們自己開了軍火田，民兵聯防作戰，逐漸向着地方軍轉化，同時還擔任生產使戰鬥與生產結合。使殺敵自衛獲得更緊密的配合與保障。

據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五月統計，晉察冀北岳區民兵參戰次數達一萬〇六百四十九次，斃傷敵僞一千五百一十七人，俘虜敵僞三百六十八人，鋤奸一千六百五十八人，繳獲武器軍用品及破壞道路橋梁封鎖溝牆等戰績，不計其數，冀中區同時期，民兵參戰人數達一百四十三萬四千八百六十九人，

斃傷俘敵僞六千餘人，民兵幹部隊員英勇犧牲者亦達一千六百餘人。

又據晉綏邊區一九四四至四五年一年中，該地民兵單獨作戰達三千四百四十二次，爆炸地雷六百八十一顆，斃傷俘敵僞二千八百人，我與敵之傷亡爲一比二一·五，敵人被炸死者，佔其死亡數的百分之八十六。四四年魯中區之敵我傷比率爲敵三十二對我民兵一。

因之出現了大批的民兵英雄，如四三年秋季三個月反掃蕩中，爆炸英雄李勇和本村十二個人的游擊小隊，不顧犧牲，晝夜奮鬥，殺傷敵人將近四百以上，山東的地雷英雄李念林，單獨炸死了七十六個日軍，還教會了七百個地雷學生，晉綏民兵勞動英雄張初元等創造了武力與勞力結合的典型，開闢了『全民皆兵』的道路。

在戰術上，民兵創造出了『麻雀戰』，『地道戰』，『窟洞戰』，和『地雷戰』，近年在地雷戰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創造了『地雷和步槍相結合』的戰術，而且把地雷戰從保衛村鎮發展到單獨或配合主力圍困敵人的堡壘、據點、和城市，被我克服過來。

地方軍在主力與民兵之間，它擔任一縣或數縣的保衛任務，它不僅擔任反『掃蕩』的較大的軍事任務，而且還爲保護人民日常利益而戰鬥，如掩護收割，耕耘，搶救水火災荒之類，根據他們的鄉土熱情，加強他們去完成保護地方的責任，他們組織了許多在軍事、政治、民運各方面都有良好訓練的健全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後之敵後，去打擊敵人，發動人民，藉以配合正面解放區各戰線的作戰，獲

得優良的成績。

主力軍尋找有利的時機，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殲滅敵人，他與地方軍，與民兵自衛軍，三者互相密切的結合，密切的聯系，相互配合。在比較嚴重的情況下，可以實施主力地方化，群眾化，以達到有利的分散，相反的，如在情況便利發展的時候，民兵和地方軍又可以集結起來，配合主力或轉化爲主力，根據這種辦法，我們知道強大的八路軍新四軍，已有二百萬以上的民兵，作爲自己的助手，作爲自己的後備，是他們經得起持久抗戰的原因之一。

第十節 兩種不同的政治工作

國民黨反動派他們的軍隊政治工作，其目的在使官兵愚蠢，否則，如果官兵有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便不能任所欲爲了，所以國民黨反動派，他們在軍隊中不是進行抗日教育，而是進行反共教育，不叫官兵去爭取民主，而是叫官兵盲目服從，國民黨反動派在軍隊中努力進行特務化的政策，凡是官兵中有民主思想的人，都被認爲危險份子，而被監視開除，逮捕或暗殺，國民黨反動派那種黑暗殘暴的特務化政策，是在於麻痺士兵的政治覺悟和自覺性，養成士兵盲目性，是在於監視和絞殺有民主思想的官佐和士兵，是在於使軍隊與人民脫離，成爲他統治，剝削，壓迫人民的工具。國民黨反動派在

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的神髓便在這裡。因此反動派軍隊政治工作的首腦賀衷寒，便成爲臭名昭著的特務派系之一的『政工系』的頭子。

人民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中的政治工作，完全與此相反，我們的政治工作，第一，在於提高官兵的政治覺悟，發揚他們的愛國愛人民和爲人民服務的自覺認識。第二，在於團結本軍與友軍，第三，在於團結軍隊與人民，提高人民保衛祖國和民主主義的政治覺悟，幫助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第四，是在於從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敵軍，使之喪失戰鬥力，第五，是在於鞏固和提高軍隊本身的戰鬥力，保證命令的執行，深入政治，軍事，文化，生產各方面的學習。我們的軍隊之所以是人民的軍隊，所以能達到官兵團結，軍民團結，我們進行的戰爭之所以是人民的戰爭，所以能進行人民的戰略戰術，所以能打勝仗，都是與這種政治工作分不開的。

第十一節 兩種不同的俘虜政策

解放區軍隊有一個正確的爭取敵僞軍與處理俘虜的政策，能够以深入的政治工作去動搖瓦解敵軍軍心，爭取僞軍，凡屬投誠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後願意參加反對共同敵人的敵僞軍人，一律表示歡迎，並給予適當的教育，不許殺害虐待或侮辱，每一個俘虜。到四四年八月止，八路軍新四軍俘虜日

軍與日軍投誠的數目，已有三千〇二十二名，包括三九年在冀東俘虜的日本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隨員。

關於送回日軍去，不加殺害，給予兄弟般的待遇，聽其自願去留，不疲倦地對他們進行反法西斯的政治教育，大膽的放他們回去，這對於削弱敵軍的戰鬥意志上，起極大作用。在這個政策下，俘虜和投誠的日軍數量，年有增加。

這項敵軍工作，我們的日本戰友，首先是日本人民的領袖岡野進同志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到四四年八月止，留在華北，華中解放區內的日軍俘虜數目有三百二十二名，其中日人解放聯盟的盟員有二百八十九人，他們中有很多是在延安日本工農學習過或當時還在學習着的，在瓦解敵軍工作中，他們採取了巧妙的打電話，送宣傳品，送慰問袋，火線上喊話，交朋友等辦法，冒着很大的危險，向敵軍進行反法西斯戰爭的宣傳，收到很大的效果，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國的回國，有的還留在解放區工作，他們已成了日本革命的優秀幹部。

在瓦解和爭取偽軍反正的工作中，更表現了偉大的成績，特別在日本投降前一二年內，如四五年山東偽軍莫正民部數千人反正，南京偽軍警備師兩個師全部向我新四軍反正其他小的例子，就舉不勝舉了。

解放區的軍隊，我們的裝備並不十分好，而且毫無接濟，但能獲得這樣的成績，而國民黨有大量

的軍隊，又得有盟邦大量金錢武器的接濟，在整個抗戰期間，俘虜敵人的數目都比解放區要少，他們沒有敵軍工作，更沒有將俘虜送回去的事，他們繳獲敵軍槍砲的數目和俘敵軍的數目，均少於解放區軍隊。教育俘虜變成反對敵人的戰士，則實際上完全沒有，相反的，他們却大量的被敵人俘虜，大量的投降敵人變成偽軍。

第十二節 結 語

在國民黨統治區軍民脫節，軍政脫節，官兵脫節，軍與軍脫節，互相矛盾，離心離德，前方軍隊吃不飽，穿不暖，後方貪官奸商，魚肉人民，壓迫人民，發國難財，揮霍淫樂，財政經濟危機嚴重，痛苦已極，軍隊喪師失地，而又不許人民武裝起來保衛家鄉，抗日無力，却又積極反共，破壞團結，將精銳大軍包圍與進攻解放區。

在解放區，則軍政民團結合作，一心一德，同甘共苦，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每一個人都積極從事抗敵工作的各個崗位，發揮自己的能力，軍愛民，民擁軍，男女老幼，各司其職，一切爲着戰爭，一切爲着打倒日本侵略者，爲着解放中國人民，這就是解放區全體軍民的總口號總方針。

空白页

第四章 文化

國民黨統治區

第一節 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化上實行愚民政策與統治政策

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爲了保持和加緊他們對中國人民的壓榨剝削，爲了繼續他們法西斯一黨專政專制獨裁的統治，在文化方面也就向人民宣揚與灌輸奴化媚外思想，封建主義的思想，與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想叫人民服服帖帖，受他們奴役，不要起來反抗。我們知道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而又反過來爲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服務的。中國的買辦封建法西斯主義文化正是反動統治集團的買辦封建法西斯主義政治和經濟的反映，並爲反動統治集團用來作爲奴役麻醉欺騙人民以保持其買辦封建法西斯主義的統治的工具。

這些反動統治集團崇拜帝國主義的洋大人，拍洋大人的馬屁，『洋大人什麼都好，中國什麼都不

行」他們也把這種思想向人民中間傳染其影響，要叫人民失去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們對於帝國主義向中國人民的吸血剝削，稱之爲幫助中國經濟建設，開發中國物質資源，以模糊人民的民族意識，還要叫人民感謝洋大人的「幫助」。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用傳教，辦學校，送留學生等方法麻醉與奴化中國人民，培植爲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才的文化侵略，也稱之爲「幫助中國發展文化」。

他們又竭力保留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封建主義思想和統治階級所造成的人民的愚蠢落後，他們提倡復古與尊孔（如到處成立孔學會，報上出特刊，學校裡規定讀經，講話教課中間經常宣揚尊孔復古等等）。把「人壓迫人」「人剝削人」「人吃人」的社會制度認爲是合理的，永久不變的。窮人被剝削被壓迫是命運註定，無法逃避的。要「尊上卑下」對於欺壓你的「官僚大人」或者剝削你的「地主富豪」，要恭恭敬敬，對他盡忠，不能反抗，而他們卑視老百姓與欺壓老百姓則是應該的。租給你地種，給你有活做，使你還沒有餓死，便是他們老爺們的無量恩德，即使餓死逼死了，也只能怪自己命薄，與老爺們無干。照孔子的說法，「上智與下愚不移」，就是說上層統治者是生來聰明的，小民是生成愚蠢的，不能改變，老百姓是沒有頭腦的，因此只應聽憑「大人先生」的擺佈，絕對的服從。「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於是勞動者被騎在他們頭上的剝削階級所統治就是天經地義了。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上竭力推崇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三達德——智仁勇等抽象的超物質空洞的德性，他們掩蓋了「德性也是一定社會政治經濟的產物」這個

真理。這些抽象的神秘的教條，聖潔的格言會爲數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及其御用學者所用來麻醉人民，奴役人民，掩飾其階級剝削的實質的。『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謂忠，『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之謂孝。在具體的歷史意義上來解釋，忠孝云者，不過是國與家的統治者（君，父）對於被統治者（臣，子）的要求的一種階級服從的義務。『仁者愛人』豈不是絕佳的德性，但依孔子解釋；仁者是要『克己復禮』，而禮則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封建秩序。可見任何抽象的道德教條在封建社會裡便有適合於封建秩序的剝削內容。因此對於這些產生於封建社會會作爲封建統治工具的道德教條，只有給予歷史的批判，賦予革命的民主的具體內容，才能成爲合乎當前民族與人民利益的美德。而當前的中國反動統治階級則是利用之作爲壓迫人民的武器，與背叛民族利益的掩體。他們對於民族和人民不忠不孝不仁不愛不信不義不和不平，禮義道喪，寡廉鮮恥，却要人民忠孝於他，仁愛於他，信義於他，和平於他，一句話，馴馴服服的做一個綿羊讓他們宰割就是了。再以智仁勇而論，儒家言語不過是聰明，仁愛，勇敢而已，任何人也不會反對聰明，仁愛與勇敢，但他們所提倡的智是用之於壓迫人民、欺騙人民、殺害人民的智，他們所提倡的仁是施於漢奸日特和投敵變國的『黨軍大員』的仁，他們所提倡的勇是用在於進攻民主的解放區和人民軍隊殺害人民的勇，而不是用於打垮法西斯強盜爲人民大眾謀幸福之智，施於困苦流離的千萬萬同胞的仁，和表現於對付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勇。

他們不僅激頭激尾的擁護着封建文化（所謂『中國固有文化』），而且對於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所謂『固有的社會組織』）也致以心嚮神往的讚美把它描寫成一個很美麗的幻景（中國之命運六一、六二頁），完全掩蓋了歷史上農民遭受殘酷的剝削，與不絕言的饑饉歉荒，無數次的農民起義及統治者血腥的屠殺等真實情況，完全隱諱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醜惡，如一切專制淫威，窮奢極慾，焚書坑儒，男盜女娼，父子兄弟妻妾相砍殺等等，特別是把殘酷壓迫中國人民二百七十年的滿清統治，歌頌爲極樂世界，稱爲最完備的制度，如『中國之命運』裡說『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猶能繼漢唐的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爲元代所不及……』等等，因爲滿清的保甲、連坐、中央集權、專政、科舉、八股、文字獄等愚民制度及愚民政策，正合蔣介石法西斯專制獨裁的心意吧了。由此，幫助滿清統治屠殺漢人最殘酷的大漢奸會國藩，便成爲蔣介石個人推崇備至，『身體力行』的靈魂了，就被稱爲『卓絕的政治家』了。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裡還說『國家建設的基層在鄉社，因此我們中國體雖久爲君主，而民本民治的精神實貫於民間。』（頁一五六）原來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社會的人民已經得到廣泛的民主（普及鄉社不可不謂廣泛矣），孫中山先生還要鬧什麼民權主義，豈不成爲無理取鬧。

落沒的反動統治階級，最害怕歷史前進，最害怕人民覺悟，所以他們儘量的開倒車，復古後退，叫人民特別是青年們向後看，不要向前看。迷信、馴服、愚昧、安分是專制政治下人民最好的德性，

而『舊的一套』就是專制政治下最好的文化，這就是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者所以高唱『中國固有文化』的基本原因。

他們又竭力鼓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他們把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全部再版地在中國宣傳，而且更裝璜些所謂『中國固有的文化』，『固有的道德』等等，用以誘騙中國的人民和中國青年，當墨索里尼、希特勒未倒台以前，他們不斷地稱頌希墨是如何英雄如何才幹，稱爲世界六大領袖之二和蔣介石一起。他們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主張盲目的崇拜領袖，絕對的服從領袖，領袖怎樣說，就要認爲是怎樣對。提倡所謂『力的政治』（即法西斯獨裁恐怖統治），他們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反對十八、九世紀歐洲所提倡的民主政治和民主主義，反對盧梭的民權思想，反對中國五四運動所倡導的科學與民主運動，對五四以來的各種新文化，極盡其謾罵的能事，他們宣傳民族血統論，種族論（這本來是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這類怪論去作爲進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見中國之命運）漢族將融和其他滿、蒙、回、藏、苗、僮、獠、夷、羅羅等各民族，不承認國內各少數民族爲民族。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捏造這種單一民族論，其目的就在於提倡大漢族主義，欺壓國內弱小民族。這種中國式的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理論的總結性的書籍，便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蔣介石這本書出版以後，規定爲國民黨統治區每個大

中學生所必讀，把『種族論』『血統論』，及其他關於中國歷史的歪曲，編入歷史教科書，並把全書分段選爲中學生課文，報紙雜誌更是大肆宣傳。如中央周刊，三民主義半月刊，民族文學等雜誌，都是公開宣傳法西斯主義的刊物。

總之，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在文化一方面實行愚民政策，想種種辦法來蒙蔽歪曲真理唯恐老百姓聰明起來，認識到真理，起來要求取消他們這種黑暗統治。另一方面，他們學秦始皇焚書坑儒，偶語棄市及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恐怖統治的辦法，實行統制政策，統制人民之思想和言論，到處佈特務，用非法逮捕，暗殺，活埋等恐怖手段，不給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等自由。

第二節 國民黨統治區的教育

一 黨化教育統制思想與學校特務機關化

國民黨統治區的學校，除了要叫學生讀四書五經和『中國之命運』，灌輸奴化媚外思想和封建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反人民思想毒化青年的頭腦，叫學生盲目的信仰以外，還在學校裡（公私立各大學

院）設立國民黨直屬區黨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直屬分團部，處於最高行政機構之上，無異於學校的太上皇，將學校嚴密掌握在他們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以實施其反動的黨化教育，並實行特務統治，嚴格統制思想，即所謂『學校特務化』。各大中學校實行導師制，每學生五人至十五人聘請導師一人，（導師制綱要第二條），導師一律爲國民黨員，都是國民黨反動派所認爲可靠的爪牙，他們經常訓導學生以法西斯思想，對學生的思想，言行，經常作嚴格的考察監視，如檢查日記，檢查信件……等等。全校上下，滿佈特務，以致教員不能自由講課，學生不能自由討論，出牆報刊物要經過審查或被取締，開會要經過批准，課後一切政治活動，則更被嚴厲禁止，教員和學生不僅沒有學術思想的自由，並且人身自由也無保障。請看四四年美國的副總統華來士來華時，成都各大學學生聯名寫給華來士的一封信淚信，內稱：『遠自一九四〇年起「黨化教育」便被積極施行於中國。國民黨黨員，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及負責軍事訓練的軍官及秘密特工人員就被成千地派往全國各大學、專門學校及中學裏去。他們奉命獲取每個學校的絕對控制權。他們奉命密切監視與嚴格限制教授和學生的學術研究和課餘活動。學術雜誌和學生的私人信件被無情的檢查和扣留。贊成學術研究自由的教授們被以卑鄙無恥的辦法革職或驅逐，懷有正義感的學生不被開除便被逮捕，同時被授以上述任務的人們則公開的帶着手槍，力圖以恐怖主義鎮壓一切自由主義者。學生常常直接在圖書館中被捕或在黑夜中從他們的床上被綁架而去。例如，重慶，西安等地附近的集中營（他們把它叫做『勞動營』）即充滿着數量不

斷增加在所謂「思想不純」的罪名下被捕的學生。」（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解放日報）

成都華西日報也這樣說：「學校上下層中佈滿許多奇異人物，甚至連校工也有許多是假裝的。於是圖書無理由的被翻檢，信件無理由的被查閱，三人同坐談話便被窺伺，常常外出，行動便被偵察。進步教員無故解聘，學生無故開除，甚至平白失蹤不見，鬧的學校裡，陰風慘慘，鬼氣騰騰」（四四年九月十日華西日報）、「論今日中國的大學教育」（成都一大學先修班兩個學生，因向其他同學講述十月間成都學生所舉行的「國事座談會」情形而立即失蹤，該大學校長，還在紀念週中，無恥的警告大家，「勸你們還是休談國事爲妙，一定不聽我的話，先修班兩失蹤同學，就是例子。」（四四年十二月九日解放日報重慶通訊）

這種人人痛恨的「特務學生」和「特務教職員」每人都帶有手槍，爲特務機關所派來，領取特務機關的津貼，在學校中有特殊的地位，橫行不法，貪污腐化，欺辱同學，玩弄女生，歐辱師長，（如著名的復旦大學洪深教授之被特務學生毆打），而學校當局對這些人則是縱容鼓勵，引爲心腹，如四川大學有一個「特殊職員」名劉和甫，無理的撕毀了圖書館前的壁報，隨後又持槍到學生宿舍尋事，同學們却忍無可忍，聯名請求校方給該員以處罰，但結果校方置之不理。（四五年四月十五日重慶「大學新聞」）

四四年九月十日在國民黨政府的國民參政會上，參政員揭露了一些令人吃驚的事實，例如鄧飛黃

間，湖南大學發生風潮，學生被開除了三百人，被拘捕在長江地方的有四五十人之多，到底如何發落？又另一參政員問重慶大學某三個學生在學校內設立秘密電台的真相國民黨當局竟避而不答。（西曆四年十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西三年教育委員會各省教育廳續飭中等以上學校，凡有不遵學校規及「思想不純潔」的學生，無須開除，應交青年訓練團（即勞動營之別名），施以特別訓練等，公發補訓處充當壯丁。（西三年五月三十日新中國日報）這就是說，國民黨反動派對於不願受其法西斯思想統制而表示反抗並擁護和主張真理的進步青年，公開明令規定，把他們抓到勞動營裡去，就差沒有明令規定可以暗殺活埋，秘密處死，但實際上却是這樣鬼惡恐怖的在殘殺着進步青年，試問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青年們的各種自由連身體在內，還有什麼保障，純潔的青年們處在法西斯的魔爪下，不被騙，就被壓，其災難和不幸是多麼的深重！

這種學校特務化政策的結果是「學術不能自由研討，思想不能自由發表，時時刻刻，總覺得身後有一個看不見的人影跟蹤」（西四年十一月廿一日新華日報一篇大後方學生寫的匿名稿），「把清靜的學府弄得陰森森充滿鬼氣，」「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便成了警句，純潔的青年男女，因此不敢說自己親說的話。（西四年四月十五日大專新聞社評）大批學生被開除，被送入「集中營」或被暗殺，西三年西四年又會有大批著名教授如全國聞名的西南聯大進步教授聞一多等被解聘，

一時成爲大後方各方輿論反對的中心，還有如浙大教授費葦，被特務逮去，不知下落，新疆學院院長杜重遠，被秘密逮捕慘遭暗殺。

下面兩段評論可以代表國民黨統治區內人民對這種學校特務化及思想統制的不滿情形：『最近本報迭獲學生讀者的來信，都說他們的學校當局以特工方式對待他們，有些學校對學生所出壁報勵行檢查制度，甚至有與文字獄者……學校特務機關化，豈不是教育界不可雲洗的污點嗎？社會一切無聊可怕的事件，一一演出於神聖的學府，這樣學生人人自危，老師痛苦已極，還談什麼教育效果，說什麼培植人林』（桂林力報西四年四月九日短評）

『我們認爲思想統制政策，不特在教育上爲妄想，而在社會上亦屬荒唐，且爲絕對不可能之事，因此，甚望朝野人士對於新學風之樹立不要做思想統制夢，對社會風氣之轉移，也不要捧着自己所讀的「聖經」來強迫人「教信」，而忘記了人家有信仰自由』（華西日報西四年四月四日社論）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勢力到了那裡，它的特務統治，思想統治也就到了那裡，並且還比過去表現得更發達更無人性了。學校也是如此。北平、上海等地大中學校內特務橫行，南通、徐州等地國民黨當局派軍警大批捕殺學生，在南通是秘密處死拋屍江面，在徐州是機關槍掃射，其兇惡與殘酷的程度爲民國以來任何軍閥所不及。

二 學校當局貪污盛行

在國民黨反動派這種學校黨化特務化的政策之下，學校裡正直優秀份子就被排擠得站不住腳了，壞人則把持大權到處橫行。於是聖潔的學府也就變成貪污腐化的場所，特別是官辦學校貪污盛行，從最下層的國民小學到國立最高學府，幾乎無不如此。例如重慶一群市立小學教員會向新華日報投書，要求校長規矩一點，不要隨便剋扣他們的薪水飲食等等，四川白沙紅豆樹附中校長吳某去職時，竟售賣學生食米百石，而該校學生平時却三餐不飽，北碚兼善中學學生自治會揭發該校校長不僅貪污與包庇貪污，而且在被揭露後，突然下令捕人，而中央大學學生的食米，也經常被該校「合作社」剋扣，據該校學生自治會揭露，過去三年中，被剋扣的食米價款已在一千萬元以上（解放日報四四年十二月九日重慶通訊）。又如「廣西大學校長李運華扣用學生食米費八十萬元，並且挪用學校五、六、七、三個月的經費中三百萬元，去做囤積布疋的生意，因此教授和職員的薪水，就被拖欠了。」（四四年十月重慶新華日報「免登」稿）

三 教授學生生活困苦

由於國民黨反動集團對教授學生待遇的苛薄及其在經濟上壟斷統制發國難財所造成之民生凋蔽，

物價飛漲的影響，加上學校當局的貪污剝削，國民黨統治區內教授和學生的生活就非常困苦，請看四三年五月二十日貴陽中央日報載『大學生生活急待救濟』一文所稱，『現在在後方求學的大學生（按：很多是從戰區隨校轉移之學生），生活上的困苦，恐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于萬一』，如『中央工校學生因飯不夠吃，搶風甚盛，近改爲分飯制，但每日三頓不能獲得一飽』（見『學生之友』二卷六期）『我們的生活實在苦得難以形容，吃飯總覺得很難一飽』（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洪江西南日報）成都學生致華萊士的信中也說：『中國政府機構中，現所盛行的腐敗也到達我們的學校了。在中國，學校當局榨取學生的米貼。此對學生已在水準下的營養物的剝削，構成爲引起現在各個學校常常發生騷動與鬧事的原因之一。幾乎每次事件，都被開除學生或逮捕學生所壓制下去』。自然那些達官富豪們的子弟則是華衣美食，絕無困苦的。

再以教授來說，武漢大學教授有出售舊衣舊書過活者，據云某教授爲節省起見，家中不舉炊，每餐即購營養個充饑（新華日報四四年四月十四日）。許多教授忙碌終日，耗盡心血，猶不能養活一家人口，子女無法升學，本人既要擔任講授，回家還要親自磨洗衣服洗滌飯食烹調諸事。勞病至死者，亦屬不少，如岑詩壽教授，尙仲衣教授等。

在抗戰勝利後的上海，教授們也陷於深刻的痛苦中。據上海時代日報稱：『國立交通大學教授會以教授目前每月所獲，尚不及國家銀行工役三分之一，特向當局呼籲改善待遇，俾使目前入不敷出，

不可終日之狀況，有所解決，否則，惟有放棄教學，另易他業了。」上海各大學教授聯合會：於招待記者會上，申訴着他們生活的苦痛。教了十九年書的老教授潘建卿說，「我的月薪平均只能用一個禮拜。」在這種生活重擔之下，如何能使教授們安心生活，安心教書呢？據大公報、正言報等載稱，目前已有百分之三十的國立大學教授，因無法生活而改了行，教授們曾發動了一萬個國立大學的教授來參加搶救教授的運動，聲言如果政府不作圓滿的答覆，他們要採取全體教授總辭職，總改行。四川大學教授就以罷教七天來響應，臨時大學教務長兼交大電機系主任鍾兆琳老教授激昂的表示：「這樣摧殘文化，摧殘教育的政府，容不下我們，我們只好到可以容納我們的地方去。」

四 學風敗壞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結果，由於這種學校黨化特務化政策的結果，抗戰以來，國民黨統治區內學校貪污腐敗，壞人當道，教授學生生活困難，教授改行，進步優秀教授更被排擠得站不住腳，造成師資缺乏，學生程度普遍下降，學風敗壞也到了空前的程度，如四四年官辦學校考試中的舞弊，最初是江西教育廳試題被盜賣，接着廈門大學學校的試題也以十多萬元的鉅款賣出，而七月間重慶各大學招考前夕，竟有試題「市場」，普通零售每題價一萬二萬元不等。有人以二五〇萬元買得試題後，零星出售，結果除本錢外，還賺了幾百萬元，因此中央大學教授們閱卷時發現很多好得出人意外的試

卷，另外還有兩個大學因試題事先泄露，其中有一個考卷在九十分以上的達四百餘份，此外考試中的『頂替』『護航』『對換字號號碼』等怪現象更層出不窮，有一個小姐入試場，『護航』者有三十餘人，一個公子在考試前幾天，整日酒樓餐館招待一群『護航』者，甚至還有請男人塗脂抹粉，假髮大衫，化裝了女學生去替某女士考試的，（見『群衆』九卷十八期，重慶出版）還有在某大學試卷中發現考生附有法幣賄賂看卷子的人，東北大學（九一八後移至關內的原東北大學）第七考場的監考員說：『該校重慶考場原有考生一千五百人，後來因作弊而被請出者太多，考完最後一場，只剩九百二十八人。』即作弊者佔考生總數百分之四十。這些都是中國教育史上從未有過的醜事，當然那些作弊多端的份子，絕大多數是那些達官富豪的子弟們，他們仗着父兄的錢勢，平日看戲打麻將跳舞追女人，不務正經，視讀書爲作戲，只求混得一紙文憑就行了，學校對他們也放之任之，不加管束，他們只是學生中的一小部份，當然不能代表一般，一般青年學生在反動派的統治下則是常處於苦悶、消沉、悲觀、不滿、憤恨的境況中，但他們有正義感，有救國的熱情，他們對新事物最敏感，也最易接受真理，一旦爆發起來，就形成爲轟轟烈烈的愛國與民主運動，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起其偉大的作用。

五 極大多數人民和兒童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

在國民黨統治區，除了學校教育被黨化特務化統制得如此反動腐敗，如此不自由外，極大多數的

青年和學齡兒童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制下，還都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在這樣的社會裡，受教育只是有錢人的特權，窮人是『沒有福分』的。在中國，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這種情形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十九年來並未改變，因為在他們愚民、統制的文化政策下，人民的愚蠢沒有文化正是適合於他們的統制利益的。儘管這些年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如全國聞名的陶行知先生等，抱着滿腔熱忱，從事普及文化普及國民教育的工作，但國民黨反動派却加以仇視、壓迫、破壞，以至封閉學校，捕捉那些教育工作者，反動統制階級『惟恐人民聰明』，這還表現得不够明顯嗎？

第三節 國民黨統制區的文化出版新聞事業

國民黨反動派對於人民的文化新聞出版事業也加以嚴厲的統制，摧殘和壓迫，其目的是要使人民變成精神上的瞎子聾子和瞎子，馴順如羔羊，以便於他們的奴役和驅策。一二八上海戰爭後，封閉了上海生活週刊，該刊為全國聞名的鄒韜奮先生所主編，當時宣傳救亡，激發民族意識，獲得各界人民的熱烈歡迎，銷行極廣，尤以青年知識份子小職員，店員，幾乎人手一冊，但被對外屈辱退讓，對內鎮壓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派視作眼中釘，他們接連公佈了『宣傳品審查標準』，『圖書雜誌審查辦法』。凡批評國民黨當局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者，被認為是『危害中華民國』須依『危害民國緊急

治罪法。治罪，凡出版書籍要向內政部登記，出版雜誌要向上海圖書審查委員會送審，繼這些公佈之後，即有一百四十九種文藝書籍和七十六種雜誌奉令查禁。一九三五年杜重遠辦的衛生週刊，因為登了一篇閑話皇帝，「冒犯」了日本天皇，結果杜重遠繫獄，衛生停刊，蔣介石出賣民族國家，對日本帝國主義卑躬屈節的面目，乃更大白於天下。一二九學生運動以後，鄒韜奮先生主編的大眾生活，繼生活週刊之後，而為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救亡運動的號角，但又被禁止。繼之永生、國民二刊，同樣遭到封禁，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讀書生活、中流、作家、新認識、生活星期刊、通俗文化、漫畫家等十種著名刊物，均奉令禁止，並全部焚燬，而漢奸刊物「社會新聞」却不被取締，反而得到國民黨當局的津貼資助。

抗戰之初，國民黨當局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被迫而倉促應戰，一時忙於搬運家，對文化出版事業的摧殘，會稍微放鬆。但自武漢失守以後，在反動派採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下，文化出版事業又受到嚴厲的統制和摧殘，各種進步書報大都遭到沒收或燒燬，如四〇年一年，國民黨統治區報章雜誌被封禁者即達五百種之多，各地進步書店，如生活書店，新知書店等等，大部被無理封閉。任何報紙雜誌書籍的出版，都要經過國民黨政府審查機關的嚴厲審查，經其允許，不然就要被扣留，禁止或查封。他們還派出大批檢查員和特務到各書店，各印刷所監視和搜查，凡是進步的，主張民主的，或者是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政策提出批評的言論，就會遭到刪削或檢扣。

例如抗戰中國民黨統治區內的各報紙（國民黨反動派所辦的除外）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些稿件遭到無理的扣留和刪削，而其內容則不外乎主張民主與團結的建議和評論，他們動輒得咎，毫無言論自由，被強迫登載『中央社』製的各類電訊以充塞篇幅。再看雜誌書籍，例如『中國農村』雜誌五卷一期是農村民主專號，原稿有三分之二被扣，甚至其中有一篇吳漢溪教授所寫的『蘇聯農村改造理論的發展』無一字涉及中國也被扣留，又如民主週刊四五年三月三日出版的一期中，三篇社評，一、讓人民說話，二、參政會增加名額，三、舊金山會議代表人選，及一篇『海外十家僑報呼籲民主』的通訊全部被扣，以致前兩頁幾乎全部開了天窗，外國記者到延安以後，寫給美國的通訊，不准登載，亦不准發出。四五年七月，還宣佈禁止若干美國記者來華，引起外國記者紛紛反對，趙超構先生所寫的，『延安一月』，在重慶新民報逐日登載，都經檢査通過，出書時又經檢査一次，但不料銷路太好，又被禁售了。抗戰勝利後，在上海不僅把『世界知識』『大眾哲學』等等書刊，列入禁書，並把中蘇友好協會所出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也盡數沒收。

他們統制文化竟嚴厲到『欽定』名詞，規定『抗戰時期宣傳名詞』（見國民黨廣西省黨部『黨訊』六卷六、七期）其中『抗日政權』『爭取民主』，『新文字』等二十一名詞，爲『謬誤名詞』，『應予一律禁用』，『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階層的人民』，『三民主義爲今日中國所必需』等五十三名詞，爲『謬誤名詞應改正者』，又，『解放』二字亦在忌諱之列，以致某報

有一天戲有『婦女解放』一語，就被檢查所改正爲『婦女復興』，荒謬滑稽，可謂已極。

下面引四四年五月重慶文化界郭沫若、洪深、孫伏園、老舍、茅盾、曹禺等七十八人，要求言論出版等自由的宣言一段，內稱：『……言論出版學術研究戲劇公演等所受之限制，實至繁且苛，數年以來，禁止著作及禁演戲劇不可勝計，許多翻譯名著，學術專著，以及描寫戰時現實或過去歷史之文學作品，雖絕無違背『抗戰建國綱領』及妨礙國家民族利益之處，亦均在『不合國情』『不合國策』，或『不合抗戰要求』等等籠統批駁之下，遭受禁止出版，並扣留原稿，致使作家深感動輒觸禁之苦。』

這種日益嚴厲的對言論的壓迫，引起了各方的不滿和憤怒，甚至孫中山先生不肖子孫科也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憤激的抗議道：『現在號稱民國，爲什麼國事人民不能講，不能曉得，也不能發表意見，我們變成法西斯政府了』（四五年四月三日在重慶青年會的演講，見四五年四月五日華西日報）

除了這種嚴密檢查，關扣的辦法外，國民黨反動派還採取所謂『以量勝質』的政策，成立壟斷性的出版業托辣斯（爲C.C.派大官僚資本集團所掌握）大批出版反共反人民的書刊如中央週刊、民意、血路、戰國、抗戰與文化、中國之命運、新生活運動等等，充斥於書肆，大肆擴充其C.C.，復興掌握下的反動報紙，大量遍設反動書店於各地，以和一些進步或較進步的書刊報紙作競爭，想以其數量的

絕對優勢來壓倒質量。

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對於這些辦法還感覺不夠，近些年來更用縱火焚燒、非法沒收、逮捕、暗殺、搗毀等辦法，來對付進步的出版界，和文化界，如華西日報館被特務搗毀，華西晚報館被搗毀後又被強迫接收，新蜀報被從內部篡奪，政協會議時蔣介石雖曾親自宣佈四項諾言，但接着便又是特務搗毀重慶新華日報社和民主同盟的機關報民主週刊社，以後又有逮捕北平新華社及解放報全體人員之『四三事件』，特務縱火焚燒西安秦風工商日報事件，捕殺西安民衆導報主筆李敦仁，非法封閉經合法登記的北平七十七家報刊通訊社，在上海停閉建國日報（即前救亡日報）等十一家報紙，非法沒收民主週刊、民主星期刊、人言週刊等等事件，在國民黨統治區，除了一些不學無術卑鄙無恥的流氓文人和國民黨反動派所訓練出來的文化特務（如特務記者）受到反動派的驅使保護與鼓勵以外，進步的學者，進步的作家則毫無自由到處受到迫害，生活亦極困難，作家貧病交迫劇人呻吟嘆息，這些年來中國的文化工作者，青年作家被國民黨反動派摧殘而死，和慘遭毒刑的，亦頗不少，最近文化界知名人士抗戰前曾以『救國有罪』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的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和昆明大學的進步教授全國聞名的聞一多又被蔣介石驅使特務暗殺了。國民黨反動派殺言論，摧殘文化一至於此，一切民主書刊，幾將封閉殆盡，一切草鄙野蠻殘暴的手段，也幾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各地學生界文化界的民主運動却在不斷地愈加高漲着，如六月間上海文化界又發表宣言，學生市民又舉行十餘萬人的大規模遊行

示威，推派代表赴京請願等（詳見本書第一章政治第五節）這些反動的黑暗勢力，在民主的時代潮流中間，終將要被衝毀被淹沒的。

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

第四節 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政策

解放區的人民已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獲了解放，政權是屬於人民大眾的，經濟也是代表人民利益，使人民生活不斷向上的，反映在文化上，也產生了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反對奴化的，封建的與法西斯主義的文化，也即是無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反過來又推動這個社會形態的繼續前進。

在抗日戰爭中，文教工作是解放區人民三大任務之一，首先是戰爭，其次是生產，然後就是文化，沒有生產，就要挨餓，就沒有豐衣足食，沒有文化，就是愚蟲，而愚蟲的人民和軍隊就不能戰勝

日寇，樹立民主政治，和建設工業化的新中國，所以我們必須有文化。恰恰相反，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是要人民愚蠢，不要懂得真理，以便受他們統治，而解放區政府的政策却是要人民聰明起來，懂得真理，以求得人民自身的解放和幸福，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是要統治人民思想和言論，用高壓手段，不給人民以思想和說話的自由，而解放區政府的政策却是給人民以思想、言論、出版等等自由，並獎勵自由研究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尊重知識份子，歡迎各地科學藝術人材來參加解放區的建設工作，積極消滅文盲，普及國民教育，總之是獎勵和幫助人民自由的追求真理，從愚蠢，迷信，黑暗的舊思想舊文化中解放出來，自覺的爲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事業而奮鬥。

解放區的文化，有其進步的方面與落後的方面，解放區有作爲領導方面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但也有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廣大落後的封建遺產，如陝甘寧邊區過去就有百分之九十的文盲，百分之六十的嬰孩死亡率和百分之三的成人死亡率，大量的牲畜死亡，兩千個巫神，封建迷信的思想，經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影響着邊區的群眾。毛主席會說：『反對群眾腦子裏的這個敵人，甚至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困難。』因此需要告訴人民自己起來和自己的封建、迷信、文盲、不衛生等舊思想舊習慣作鬥爭。

爲了進行這個困難的鬥爭，解放區就建立起廣泛的文教統一戰線，如在教育方面，即不但有集中的大中小學，而且有普遍分散的村學，讀報識字組，不但有新內容的民辦學校，而且利用和改造舊的

村塾。在藝術方面，不但有話劇電影，而且有新的平劇，梆子、秦腔、大鼓書、秧歌，並且利用和改造舊戲班，特別充舊秧歌，在醫藥衛生方面，不但有西醫，而且還聯合和改造中醫和舊式獸醫，這是新形式與舊形式的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兩原則第一是團結，第二是批評或教育改造，不投降舊形式，亦不排斥與鄙棄舊形式，而是聯合一切可使用的舊形式舊人，而幫助感化與改造他們。

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新文化亦是如此。對於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舊形式，在解放區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是經過了改造，被加進了新內容的，因此也就變成革命的爲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解放區的文化第一是爲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爲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爲武裝起來了的工農即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爲小資產階級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是能够長期地和無產階級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份，就是最廣大的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四種人裏面，工農兵又是主要的，小資產階級人數較少，革命堅決性較小，也比工農兵較有文化教養。所以解放區的文化第一是工農兵，第二才是爲小資產階級。

解放區的知識份子，文化工作者，在毛主席的號召之下，具有高度的爲人民大眾服務的熱誠，面向工農兵，深入工農兵，與工農兵相結合。近年出現了很多的模範文教工作者，如延安楊家灣小學的

陶端予就是一個知識份子與群眾結合的典型。

在這種總的方針與政策之下，近年來解放區的文教工作，不論在教育，衛生出版文藝各方面，都已有了很大的進步。

第五節 解放區的教育

在解放區的學校內，學生可以自由思想，自由研究，可以自由的閱讀各種書報雜誌，可以學到最進步的近代科學思想，可以自由出版自己的刊物和牆報，一切宣傳抗日和民主的歌曲，戲劇，可以由編製出演，可以自由組織座談會，討論會或辯論會，組織抗日救亡或民主運動的團體，他們有到任何一個軍事、政治、藝術、科學的學校和其他中小學，師範免費讀書之便利，他們享有民主自治的權利，有自己的學生會組織，他們過着自由，光明，活潑，愉快的生活。

教職員是和同學打成一片的，教員一方面教學生，另一方面學生又是教員的先生，教員教學生並非『自以為是』的硬灌，而是輔導啓發學生，使學生自由思考，自覺的自動的去追求探討真理，反對盲從，學生可以自由的向教員提出各種問題研究和討論，也可以向教員隨時提出授課的意見，請教員解釋或改正，却絕不引起隔閡與誤會，也並不損傷教員的尊嚴，相反的這種真誠的互相研究的態度更

促進師生之間親密關係。他們在自覺的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下，根本不同於舊社會金錢僱傭性質的教員，他們的工作情緒極高，勤勤懇懇，誨人不倦，除了講課以外，還在課後，到學生宿舍指導學生自習，由於教員與學生共同努力，他們在文化學習上的進步較解放區以外的學校要快得多，至於正確的政治思想的學習則更是在解放區以外的學校所不可能學習到的。

在物質生活上，因爲戰爭的頻繁，日寇的燒殺破壞，國民黨的封鎖包圍，所有的學校和部隊，機關的一切工作人員一樣，不僅要盡量減輕人民的負擔，而且自身還要盡力利用時間生產，幫助人民解決困難，因之自己的生活，一般的是艱苦的，他們每一個人，都很明白中國人民的疾苦，他們絕不願意在加重人民負擔的基礎上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所以任何生活的艱苦，他們都能够忍受不辭。自一九四三年大生產運動以後，依靠自己和學校更大的生產成績，這樣，生活獲得了改善，尤其是陝甘寧邊區，達到了豐衣足食，如延安師範的學生自述道：我們吃的，穿的，用的，住的，都是由學校供給的，不但不要自己掏出半文錢，而且每月還有三十塊錢津貼，所謂用的，包括學習上的課本和文具，今年豐衣足食，我們吃的比以前更豐富了。由於我們學校種了許多蔬菜，養了幾口肥豬，過去難得吃到的西紅柿，茼子白，芹菜等，（註：這幾種菜在當地會是很少的。）也成了家常便菜，平時中餐一菜一湯，隔天能吃一頓肉，每月還有一次豐足的會餐，現在我們的飲食至少比過去提高了三倍，我們穿的除每年照領單衣棉衣各一套外，又加發襯衣一套，毛巾三條，每月肥皂一塊，由於我們

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用自己操心，所以我們都能專心致志去學習，學校又鼓勵大家大膽提問題，敢於懷疑，自由討論，教員又能和我們生活在一塊，沒有絲毫的隔閡。所以我們的學生生活便更加愉快活躍。如果生病的時候，可以免費住醫院，出院之後經醫生證明，又可再到學生療養院免費休養，那裏除了醫生看護照管之外，吃的是根據各個學生的需要，給予各種食品，而其生活標準，則等於一個健康人的三倍，這種生活，真是大後方青年所夢想不到的。

陝甘寧邊區學校盛況

在陝甘寧邊區，抗戰以來曾有過和現在有的高等學校，計有：中央研究院，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中國女子大學，自然科學研究院，魯迅文學藝術學院，醫科大學，延安大學，行政學院，軍政學院，軍事學院，俄文學院，民族學院，日本工農學校，朝鮮軍政學校，砲兵學校等等。在其他各解放區，有『抗大』各個分校，華北有聯合大學，魯迅文學藝術學院，各種幹部學校及其他各種專門技術學校等等。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國內外幾萬個進步青年，其中包括社會各階層，他們離開了家庭，拋棄了優裕的物質生活，經過千山萬水，長途跋涉，也還有坐飛機來陝北學習，接受進步的國防教育，

像朝山進香似的，多的時候每天都有一二百人，當時那種熱烈的盛況，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以後則因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嚴密封鎖和阻擋，更大批的青年就想來而不能來了。他們學習以後，都參加了各種抗日工作，分佈在華北，華中，華南各個抗日根據地，在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也有好幾萬個青年從四處到根據地的學校來學習，這八年多來，他們中許多人已經在民族解放戰爭中光榮的犧牲了，許多人已經鍛鍊成爲堅強的爲人民服務的戰士，在各種戰線上爲人民利益而奮鬥着。這些人材的造就，對於中國抗戰的勝利及今後的民主建設事業是起着重大的作用的。

這裏介紹一下世界聞名的『抗大』（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的簡稱。）

同學們來自各個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職業，不同的階層，有學生，教員，職員，工人，文學家，戲劇家，音樂家，電影明星，新聞記者，科學家，工程師等等，也還有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和國民黨軍隊中將軍們的兒女，他們的目的就是一個抗日救國。

『這裏（抗大）有共產黨員，有國民黨員，有信基督教的，也有信佛教的，這些教可以在我們這裏，我們不能硬要非共產黨員來信仰共產主義，當然共產黨員是不信宗教的，並且還要宣傳共產黨的理論，』『這裏有思想的自由，只要是抗日的。漢奸的說話在這裏是沒有自由的。』（毛主席在抗大的演說）

『團結緊張、活潑嚴肅、艱苦奮鬥，英勇犧牲』便是這個學校的校訓和作風。

『抗大』的前身，是內戰時代的『紅大』（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抗戰開始後不久。才改爲『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一、二期的學生，都是以後八路軍，新四軍著名的中級和高級將領，如林彪，徐向前，蕭克，徐海東，羅炳輝，羅瑞卿等。那時的教員便是毛主席，洛甫等。毛主席講授辯證法唯物論，洛甫講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三期開始，大批的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從全國各地到來，學校才不得不猛烈的擴大，那時的校長就是林彪將軍，副校長是羅瑞卿將軍，那時著名的教授如張如心（前紅大教授，三〇年即著有哲學概論），何思敬（前廣東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張慶孚（即張琴撫，前上海大學，暨南大學教授，曾任上海社會科學聯盟書記，二九、三〇年即著有國際政治經濟原理，社會問題大綱等書），徐懋庸（著名文學家，社會科學家），陳唯實（著名哲學家），任白戈（社會科學家），及其他許多新的教授等。毛主席、洛甫、王明、博古等中共中央負責同志，仍經常來學校作政治報告和講演，而且毛主席還經常關心，親自領導着這個學校。

一九三九年七月，抗大總校爲了更密切的支持前方抗戰，從延安移到敵後抗日根據地區，在戰鬥環境之下進行學習，把學習與戰鬥結合起來了。敵寇曾宣佈，寧以犧牲日軍二十人的代價，來換取抗大學員一人，這也就可證明抗大同學在爲國家民族的解放事業而英勇奮鬥中所起作用的巨大了。

抗大總校及其各分校，八年來已爲國家民族培養了二十多萬個優秀的抗日軍政幹部。它的種子今天已佈遍全中國以及南洋，馬來亞，爪哇各地。還有現時在日本朝鮮國內許多優秀的爲建設民主日本

及民主朝鮮而奮鬥的戰士，許多都是抗大的學生。

在解放區除了高等教育以外，中小學也有大量的發展。近年來在國民教育方面政府積極推行普及運動，並提出了學校與家庭，生產和社會相結合的方針，清算了不適當的『正規化』和機械搬用中國資產階級抄襲外國的脫離中國實際的學與用不一致的舊教育制度的傾向，為適應抗戰時期戰爭與分散農村環境，為按照群眾的需要與自願的原則，採取了與群眾實際生活相聯系的教學內容，建立了靈活的學制，和多樣形式的學校。在小學方面，則採取『民辦公助』為主的方針，使小學教育大量普及起來；教材方面增加生產、衛生、政治、常識等內容，學制方面，靈活規定，有的以學到能寫會算就畢業，學得快的快畢業，學得慢的慢畢業；學校形式有全日學校、半日學校、輪迴學校，分組教學等等；農忙時則都放假；教學方法上採取啟發式和生動有趣的歌曲故事等方式，使兒童易於接受。總之以適合民便，為人民大眾服務，使佔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子弟均有求學機會並進步最快最合實際需要為目的。在這種方針和具體辦法之下，解放區的國民教育就大大的普及起來，並適合於群眾的實際需要。

在解放區除了高等教育以外，中小學亦在大量的發展，抗戰勝利後，各解放區高等及初等教育事業更澎湃發展着，以在中國文學界，著作界有二十餘年歷史的權威學者成仿吾為校長的張家口華北大學，歷史學家范文瀾為校長之邢台北方大學，山東臨沂之山東大學，華中的建國大學，東北的東北大學都紛紛建立，此等大學之教授，多為全國知名學者與專家，教育方針是共同研究，學生思想自由，

學術研究自由。至於中等教育，除恢復者外，亦盡量成立學校，如蘇皖解放區一處，已有中學九十多所。

爲了提高工農大眾的文化，使他們從愚昧落後中解放出來，解放區的社會教育亦正在大量普及，採取民教民爲主的辦法，展開了大規模的識字運動，組織了大批的讀報識字組，夜校，早班，半日學校，成人補習學校等等，由小學教員，政府工作人員，識字的農民，商人和小學生當教員，進行免費的教育，還有農民在變工隊裏辦識字，婦女在婦紡小組辦識字，其他家庭裏父母子女夫妻兄弟進行識字，還有小學生做小先生，教自己的家人或其他兒童，並經過這些兒童再教他們的家人，如陝甘寧邊區綏德實小學生劉佩珍的識字組，首先從家庭做起，然後走到街頭，利用兒童好玩的心裏，團結他們，進行教學，還有的小學生領導兒童團識字組，領導攔羊娃識字組，總之利用多種多樣的組織形式，展開了大規模的群眾識字運動，夫教妻，妻教夫，兒子教媽媽，孫子教祖母，大人教小孩，小孩教大人，小孩教小孩，大人教大人，工作旁邊放識字牌，門箱櫥櫃上石板上各處崖上都寫滿了歪斜的字跡，趕牲口的把他認的字貼在驢鞍子上，人跟在後面經常看認，攔羊娃識了字便到處寫，攔羊時爬在地上練習，這樣，當他們回來，羊吃飽了，學的字也學會了，這種熱烈的情況是群眾在政治經濟上翻身以後，對文化的迫切需要的反映，是新民主主義政權領導的結果，在國民黨統治區則絕對不可能有的。

第六節 解放區的出版文藝與醫藥衛生事業

在解放區，文化團體和出版事業，在民主政府的保護和幫助下，都是欣欣向榮的，就舉延安一地的例子來說，文化團體就有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全國青年記者學會延安分會，中蘇文化協會延安分會，全國世界語協會延安分會，中國新文字運動委員會，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蒙古文化促進會，全國戲劇協會，美術協會，音樂協會的分會，戰歌社，山脈文學社，新詩歌會，劇團有魯藝文工團，西北文工團，青年劇院，平劇院，民衆劇團，及其他業餘劇團，圖書館有中山圖書館，魯迅圖書館，及各種機關學校圖書館，書店著名者有新華書店，華北書店（現改爲韜奮書店），抗敵書店等，此外還有各種學術研究會的組織，如西北研究會，文化教育研究會，新哲學研究會，自然科學研究會，政治經濟學研究會，馬列主義研究會，三民主義研究會，時事問題研究會，魯迅文學研究會等，領導者均爲國內著名學者，如艾思奇（哲學）、王明（馬列主義）、范文瀾（歷史）、陳伯達（三民主義）、王學文（經濟學）等。此外，中央研究院中國歷史研究室已經出版了中國第一部正確的『中國通史簡編』上中下三冊，時事問題研究會已出版了『抗戰中的中國叢書』五部，每部均在三十萬言以上，都是總結抗戰經驗的寶貴作品，中國政治研究室，敵偽研究室亦

出版有書籍多種。

延安的出版事業，除了出版大批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文化等書籍及群眾的精神食糧，識字課本以外，還出版過很多報紙雜誌，計有『解放』，『中國文化』，『八路軍軍政雜誌』，『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大眾文藝』，『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團結』，『大眾習作』，『邊區群眾報』，『前線畫報』，『國防衛生』，『敵國彙報』，『文摘』，『新文字報』，『解放日報』，還有不少油印刊物，如『通訊』，『延安世界語者』，『新詩歌』，『通訊戰士』，『青年工作者』等等，此外尚有街頭的詩歌，牆報，畫報，文化棚，報紙方面，除了印刷的報紙以外，還普遍建立了大眾黑板報，『這是現條件下群眾辦報的最好形式，群眾因此實際上享受了出版自由的权利』，識字不多，可以用紙條或『捎話』通訊的方式，在黑板報上發表言論，這可說是新聞學上的新創造，此外還大批的發展了報紙的工農通訊員。

在文藝活動方面，自從毛主席提出文藝主要應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提出文教統一戰線的方針以後，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大批下鄉工作，深入工農兵群眾，改造了舊形式，其中以戲劇活動中改造了舊形式以後的新秧歌，宣傳生產勞動，軍民關係，自衛防奸，敵後鬥爭等，最受群眾歡迎，群眾稱為『鬥爭秧歌』。同時提高了群眾的藝術水平，湧現了不少的工農藝術家，他們自己寫劇本，自己演出，甚至比戲劇工作者，還更生動活潑而有力。並又改造了舊劇，舊秧歌。這種秧歌劇，在解放區已

經成爲表現群眾生活教育群眾的最廣泛最適合的一種戲劇形式。

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周揚同志對這種新秧歌的評價說：

新的秧歌從形式上看是舊的秧歌的繼續和發展。但在實質上已是和舊的秧歌完全不同的東西了，現在的秧歌雖仍然是農民的藝術，仍然是農村條件之下的產物，但却是解放了的，而且開始集體化了的新的農民的藝術，是已經消滅了或至少削弱了封建剝削的新的農村條件之下的產物，我們要保持農民的特色，但却是新的農民的特色，新的秧歌必須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群眾對於新的秧歌已經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已經不只把它當作簡單的娛樂來接受，而且當作一種自己的生活和鬥爭的表現，一種自我教育的手段來接受了。

戲曲活動方面，另外也還有話劇，平劇，和秦腔，梆子等。

醫藥衛生方面，以陝甘寧邊區爲例，開展了群眾的衛生運動，組織了巡迴醫療隊，疫病流行時，組織大批醫生下鄉，機關部隊的醫院給群眾免費治病，開辦助產訓練班，訓練大批助產員下民間接生，建立不少醫藥社與衛生合作社（群眾稱爲救命合作社），改造巫神，破除迷信，實行中西醫合作，成立醫藥研究會，四四年一年內撲滅了數萬人數千牛的死亡危險，這種情形在國民黨統治區也是不能有的，在那裏，看病吃藥都得要錢，窮人是看不起吃不起的。

文化人在解放區，除了有思想，研究，寫作，出版等自由以外，衣食住一切生活條件也獲得政府

的保障與優待。在國民黨統治區，全國著名的學者，文化人，由於遭受到國民黨反動法西斯統治的種種迫害，紛紛從國民黨統治區越過封鎖來到延安和各解放區，如歷史學家呂振羽、范文瀾（前北平女師大校長），法學家何思敬（前廣州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著名詩人艾青，文學家蕭軍、丁玲、羅烽、劉白羽、何其芳、舒群、曹葆華、立波、社會科學家張仲實、錢俊瑞、經濟學家薛暮橋、黃松齡、哲學家艾思奇、陳唯實、戲劇家塞克、音樂家冼星海（已病逝），賀綠汀。木刻家馬達、力群、古元。文化界領袖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已病逝），柳湜，著名新聞記者范長江，醫學家何穆，科學家沈鴻、錢志道。教育家張宗麟，電影明星陳波兒、袁牧之等等。還有其他許多服務於文藝、戲劇、音樂、及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方面的工作者。今天他們都在積極的參加着解放區的偉大建設工作，在思想和文化戰線上為澈底打倒中國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的文化而奮鬥着，為建設新中國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新文化而奮鬥着。

陝甘寧邊區四四年時已提出這樣的任務，在生產第一與繼續發展生產的基礎之上，五年到十年之內堅決消滅嚴重的人畜死亡現象與男子四十歲以下，婦女三十五歲以下的文盲，普及衛生習慣，普及新民主主義文化，消滅封建迷信思想在群眾文化生活中的優勢，使群眾從愚蠢落後的境況中超脫出來，走向於聰明和有智慧，以推進新民主主義政治和經濟的更迅速的發展。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呵！